

中国 文化 人 学 信仰 修养 丛 书

巨人落地

抓把沙

——从中医易理象数看
中国文化的理性

曾 罡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前言

——来自民间的另类思考

一、趁着和平思考我们的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100 多年不谓不短暂。但在其间，汉民族服饰改变得面目全非；建筑西化；汉字简化；西医普及，中医退化；社会在发展，民俗却在淡化；经济富裕，科学发达，却有 20 世纪末“邪教”猖獗；21 世纪初中医被“打”；更有趁改革开放之机，西方宗教势力轻易渗透中国民间，且少有国人关注；即便说到“革命”，100 多年来，不管哪种“革命者”，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本土可以产生正确的救国思想；更有那“有奶便是娘”的文人，以现实社会的成败或

是非为标准，对历史哲学的民族信仰，对我汉民族传统文化，横加指责，大肆污蔑！

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情况说明，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节奏”总是不同步的，即政治发展的“节奏”区间多在10~100年；而文化发展的“节奏”区间多在100~1000年。中国社会虽然在近百多年来完成了多个阶段的政治发展；但从当今中国的文化现象看，民族文化的发展还远没有完成“后封建时代”的“节奏”。用江泽民的话说，我们迫切需要建设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诸如哲学观、历史观、文化观、人格观、社会观、行为观等等方面的新时代文化体系，中华民族都还没有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的追求或期待！

试想，我们怎么能够否认当今中国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延续；据此，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成功，从逻辑上说又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文化问题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此我们不能不对中国文化的理性，不能不对中华汉民族信仰，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不妨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

谁能说清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动力？谁能说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兼容？谁能说清我们当今中央集权制度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官本社会没有传统的关系？谁能说清“从农村包围城市”以及农村的武装割据，与中国古代的大小上千次的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没有关系？谁能说清“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观与中国几千年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官史学没有历史传统关系？谁能说清当今文人在民

族文化方面的“政治情结”与古代的“劳心者治人”没有历史传统关系？谁能说清中国上世纪的革命成功，甚至包括现在的“和谐社会”，没有吃着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本？

对于以上问题，不管是有多少说法或没有说法，我们都不能回避或忽视。经历了 100 多年的社会剧变，特别是中华民族从生死存亡和极度贫困中冲出来的今天，我们总应该静下心来，趁着难得的和平环境，思考我们的民族。特别是要抛开现实社会的成败观或是非观，从历史文明的角度，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观点出发，去重新消化我们的历史，去审视我们的人格，去自省我们的民族意识，去重温我们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特质，去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观！同时，作为炎黄子孙，作为龙的传人，也应当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民族修养？！

特别是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内地有一个声音：汉民族没有宗教不行。言外之意是以本土宗教抵制外来宗教。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汉族人应当警惕或思考的！

二、反传统文化是没有历史依据和哲学观依据的

全世界各民族只有两种民族信仰，即宗教信仰和非宗教的人学信仰。

宗教信仰是“造物主”信仰，是着眼于“前世”、“来世”的信仰。非宗教人学信仰不相信有“造物主”；而相信今生人世是“天意”，相信“天人合一”、“天人同理”，认为人活着就要说人话，做人事，不为非人生的“前世”、“来世”所迷惑。

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人学信仰同属哲学范畴。

每一宗教的道理只能对信奉本宗教的人说，而对信奉其他宗

教或非宗教人学信仰的人说是没有用的。全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而各自信仰的道理是不能相互间“通用”的。而且，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发生过以一种哲学的道理去直接推翻或消灭另一种哲学的事例。即使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科学的兴起，并创造了今天欧洲灿烂的物质文明，但是至今并没有改变欧洲社会的基督教文明这一事实。

只要全世界各民族间还有竞争，那么在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传统的问题上各民族只能“各扫门前雪”。

首先是不不要指望别人的善意。在美国“9·11”后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欧洲媒体登载一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抱着伊拉克儿童以示爱心的图片。从这一图片可以看出，欧洲社会对其他哲学信仰的民族的善意，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对待《鲁宾逊漂流记》中“星期五”的态度。他不会与你平等。

再就是不要指望别人的东西比你自己的更好。试问，哪个宗教的东西能够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在全中国人民中起到凝聚力的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充分的理由为本民族的信仰叫好，为本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叫好。反过来说，不管以什么理由或道理去反对一个民族的信仰，或去反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或文化，这都是没有历史依据和没有哲学观依据的，也是十分可笑的！

饱受了 100 多年历史灾难的中华民族，更是没有理由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叫好；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一切“崇洋媚外”的言行，一切反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和文化的言行，都是没有历史依据，都是没有哲学观依据的！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需要后人去延续，而中国文化人

学信仰更需要我们维护和弘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华各民族人民对各宗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但是，如果你的儿女信奉了西洋教，回家吃饭时，首先不是敬重父母长辈，而是感恩上帝，那么你是什么心情？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有望子成龙的传统。但是，如果你的儿女在社会上不慎而又轻易地滑向“邪教”，那么你是不是心痛？

中华民族历来十分尊重全世界及国内各正统宗教的布道自由。但是，如果有宗教势力把中华民族看作是未开垦的“处女地”，那么你的心里是什么滋味？特别是外国宗教势力渗透中国民间，要求你拒绝历史悠久的清明节、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而改为欢度西洋教节日，那么你是不是无动于衷？

我们的民族记忆告诉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第一个来中国的宗教布道者利玛窦，是在中国布道无门的情况下，才把西方科学（包括西医）第一次带到中国的。

我们的民族记忆还告诉我们，早在 1000 多年前，中华民族就已经创造了震惊世界，而且领先世界的非宗教文明。正因为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精神传统和惊人的创造力，所以 1917 年苏俄的“一声炮响”才引发中华民族的本原性爆发力。

当今时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强化我们的民族记忆，强化我们的民族精神，强化中华民族的非宗教文明人学信仰！但是，显然我们还不具备成熟的民族观和宗教观。记得“文革”期间有“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理论，今天我们总不会再以政治观代替民族观了吧！

三、 我们的人格观还在哪里

长期以来，也许是因为在复杂而严峻的世界环境里，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或现实利益的冲突中太久太久了，以至我们在思想上没有或不能及时辨清世界开放时代的文明冲突或竞争；甚至我们太久没有从民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甚至我们不能排除现实利益观而以纯粹的文化角度去思考问题！

新时代的思想来自新时代的人格。正值太平盛世的今天，我们趁着难得的和平首先反省：与 100 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时代相比，我们的人格观至今走了有多远？

试想，如果你见到有人以凌驾于人之上的口吻讲着哪怕是最正确的道理，那么你会有什么感受？

试想，如果有人在庄重的场合宣讲最理性的话题之时，总是提高声调，以示掌声，那么你觉得这个气氛还有几分理性？

试想，如果有人以“统治欲”的姿态来谈论“文化创新”，哪怕其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兴奋起来？

试想，如果有人以“历史是理论的”的逻辑，或以“思想是以道理构成的”的逻辑，而与你讨论历史或文化，那么你觉得这里还是不是说话的地方？

本作者从来不拒绝这个世界或现实，但本作者从来读书或看文章，首先关注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首先关注语气所表现的人格观和文化观。文章中表现语气多在标点符号——即首先关注“标点符号”。你知道了那是怎样的人格观和文化观，那么这个逻辑产生的文章的价值或内容也就知道大概了。所以，“尽管寄上标点符号，诗的内容由我给你填上”，这个故事看来不是笑话！

本作者对“称孤道寡”的人格观从来就恶心；同时又难免想走捷径，想从学院派的治学方法那里“吃现成”。但没有办法，主流治学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使作者感兴趣的东西。为此，作者在苦苦治学几十年中，为了进行自己的有效思考，为了追求自己满意的思想天空，在人格的自我修养上，在治学的立足点和方法等方面，从来不拘泥于主流，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对本作者来说，在当今时代对我中华文明人学信仰的研究和修养，非另类的思考不足以真实，不足以有效！

本作者不惜打破人们熟悉的“道理观”，理直气壮地肯定“思想决不是由道理构成的”！

试想，高智商的聪明人是不是都应该喜欢或追求最好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最好的道理了吧；但为什么建国前反动资本家和反动地主之流要反对这个道理，难道他们的智商或聪明程度还不如缺乏文化的广大劳苦大众？

如果我们确认“思想不是由道理构成的”，那么不同宗教或民族，在信仰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道理”的。历史和现实从来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由此可见，不同思想或思想不成熟的人，以自己的“道理”去反对别人的“道理”是多么地可笑！

本丛书不属于学院派主流思维方法，而是企图立足于民族发展的立场，力求于纯粹文化的思考以及对人格的深层次的探讨。

四、加强中华民族非宗教人学文化信仰修养

思想稍为成熟的人似乎都不能否认：“思想的终极依据是信仰。”根据这一逻辑当然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不懂得宗教信仰或

民族信仰及其在民族发展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那么就从根本上不足以认识一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因此，扬振宁先生在“2004 年文化高峰论坛”上，以共同的道理构成不同民族信仰的逻辑，去批判中华汉民族信仰依据的《易经》哲学思想，是多么的令人不敢苟同。

世界上许多学者把全世界划分为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先不说这种划分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汉代以前就已奠定的汉民族中国文化与任何宗教无关，所以说世界上唯有中华汉民族文明是非宗教文明。

一个民族文化的终极依据是信仰。信仰问题属哲学范畴。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

在宗教那里，认为包括人本身在内，世界万物是由造物主创造的，造物主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即使当今西方科学家，信仰宗教的不乏其人，其典型的解释是“我们研究的事物是上帝创造的事物”。

世人有这样的误解，认为信仰是宗教的事，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没有信仰。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古代《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客观世界的现象或部分，人与客观世界同一根本规律，客观世界之外别无他物。“天人合一”就是“天人同理”，就是“天人同大”。这也就界定了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这就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根据这一思想，进一步推论出人的聪明智慧应当来自于对客观自然规律性质的概括和把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观或方法论。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对这一智慧观或方法论最简约、最直接、最生动的概括。由此可见，中国汉民族文化信仰和智慧，不仅有其悠久

的历史，而且与宗教信仰截然不同。

那么中国汉民族文化的信仰怎样表述呢？

我们知道宗教是造物主信仰，而中国汉民族文化没有造物主。我们从《易经》和《道德经》的“天人合一”和“天人同理”的思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理直气壮的结论：汉民族文化的信仰是“人学信仰”！再从孔子《论语》里“子不语怪、力、乱、神”、“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看到毫不迷惑、毫不犹豫的强大的人生定力，这简直就是感天动地的人学信仰宣言！

我们毫不忌讳地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信仰在历史当初都来自于“图腾崇拜”之类的迷信或迷信色彩。即使当今的中国汉民族，民间也还有仰拜“妈祖”、“土地”、“关公”等功利神的现象，这种迷信方式都是对“图腾时代的历史记忆”。但是这类“迷信”或“迷信色彩”的现象不能与造物主宗教信仰同日而语。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文明在历史上从当初共同的类似“图腾崇拜”发展到今天已一分为二：即宗教信仰文明和“人学信仰”文明。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造物主”，而不是“迷信”和“迷信色彩”。当今中国有人把严格定义的宗教与泛宗教混为一谈，这是不负责任的。

民族信仰是要解决人生定力问题，生存观问题，生命观问题，人生观问题、价值观问题；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智慧观、实践观、成败观等等。

文化信仰，即是坚定的思想过程，也是人生的过程。有宗教把这个过程叫做修道；中华民族人学信仰者习惯上称为“修养”。本作者的中华民族文化人学信仰修养，崇尚《易经》、中医、武术、内功等四大结构。

作者的感想是，中国文化人学信仰的修养过程，首先，必须

是快乐的、真实的、自省的、有效的、超越自我的，最终要达到的是内心强大并且善于生存的人生境界。其有效性很重要的有如下几点：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打破中国自古以来封建文人的“政治情结”，排除实用主义的观点，进行纯粹文化的思考，决不能以现实社会的利益观去看待哲学信仰问题；另外，要从我们的精神传统里寻找出最根本的人生哲学依据；寻找出最强大、最古老的人生定力；寻找出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且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实而奇妙的智慧，从而发扬光大。同时要反省和摒弃旧时代的“称孤道寡”的人格观和文化观。

其次，是《易经》的学习。不懂《易经》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化的终极依据，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智慧观、实践观；也就不能彻底认识中国文化的历史，也就无从深刻认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

其三，是中医的学习。这里说的中医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医术而医术的学习。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这句话实际上也在说明另一层意思：真正明了中医医理，就可以知《易》。作者的观点是，在当今现代文明环境里，要学好《易经》，就必须寻找出举世公认的最高级的证据来证实《易经》思想及智慧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这个最好的证据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体现易经思想的中医。即以《易》解医，以医证《易》。这不仅仅是认识自我生命和学中医最好的路子，而且也是学习《易经》最真实、最有效的路子。学习《易经》和学习中医，都是作为中国文化人学信仰修养的手段和方法，其乐无穷，而且有现实意义。

以上权作本丛书前言。

作者

2009年1月12日于广州

目 录

自序 时代篇

一 “边缘人”的怪圈 / 007

一个人有身心健康的问题，一个民族也存在身心健康的问题。病态的民族心理和落后的民族文化观是没有自觉成功的历史依据的！

二 西方科学、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生态的产物 / 011

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始料不及，但又是真实的问题：没有西方的宗教历史文化，能有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吗？！

三 巨人落地抓把沙 / 017

俄罗斯人在前苏联解体后，仍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信心
的原因和动力，是来自于俄罗斯历史宗教的精神力量！

四 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 / 020

这一思想实际上没有为造物主留下任何位置。所以说，一部《易经》注定了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

五 “科学”与“民族信仰” / 026

作为美籍华人的杨振宁先生，既然会用“科学”来谈文化，那么他会用“科学”向美国人质疑“造物主”吗？

六 “科学”及其话语大观 / 029

或者说“只有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七 生存意识是文化的本质内涵 / 037

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或最喜庆、最悲哀的时刻，都在表现着最彻底、最深沉的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而其他“半截子”的花俏事才是文人的事。

八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深层思考 / 041

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么中国上世纪的革命历程实际上是不是在吃着我们历史文明的老本？！

九 民族心理的脆弱性和文化的血性 / 045

清政府从来没有动员全民族抗战，而是“私下里”代表全民族投降了。屈辱的结果留给了中华民族。即使这样也就罢了，但是从此以后的中华民族心中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十 “时代消化不良”是我们最大的腐败 / 054

“时代消化不良”，使我们不能及时正视现实，不能及时提起精神面对新的凶险和挑战，甚至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实事求是，更模糊了我们的文化理性。

十一 缺乏“国家文化”是“内耗”的根本原因 / 059

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十二 文明史观和“文化安全”的思考 / 066

即使再有什么紧要关头，千万不要再指望哪里“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什么。我们应当具有本原性的民族“爆发力”！

理性篇

一 易经、老子、孔子三合一 儒道与释两码事 / 077

在历史上没有看到佛教参与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和智慧
的构建，相反，看到的是佛教在汉传入中国以后的
汉化。

二 不该失传的文化 / 083

因此，《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文
化三坟”不该失传。因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在那里。

三 中国文化从这里谈起 / 088

中国文化从“天人合一”谈起，实际上是从《易经》
的理性观谈起，从《易经》的智慧观谈起，从《易经》
体现的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谈起。

四 “玩”易 / 096

（我）就不信中医实践证明真实有用的《易经》不
能为今人所学，不能为今人所用！就不信不能把
《易经》从学者的“古董架”上拿下来，成为大众
思维科学和思维健康的话题！

五 生命八卦是学易的捷径 / 103

原创性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又所以说学有捷径。

六 勇敢、宗教、死亡教育 / 109

所以撰写《易大传》，为注解和宣扬《易经》作出重大贡献的孔子，从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并且掷地有声地作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学宣言！

七 “四柱八字”的哲学内涵 / 113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把人的存在本质与宇宙时空的物质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八 气功不能创造规律 / 120

“气功”理所当然属于文化的范畴。然而在 20 世纪后二十年的气功热里，不少“气功师”不提“文化”二字，不愿讲文化，不愿讲历史，甚至不愿讲人学。

智慧篇

一 中国文化理性依据的最后一个阵地 / 129

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的“法自然”是思想方法，那么就等于承认中医不是“古代经验”那么简单！对中医的排斥实际上是对一种哲学和智慧的排斥。

二 中医求真难上难 / 133

如果中医继续这么退化下去——即继续西医化的趋势，恐怕真有中国人要到日本学中医的那一天！

三 中医忧患是中国哲学忧患 / 137

人们常常说“中医特色”，这个说法有问题，容易被理解成使用中药就是中医的特色。为了振兴中医，应当把“中医特色”郑重表述为“中医思想特色”！

四 中医也有“边缘人” / 142

中医为什么要进行现代意义的“量化”？这是中医思想特色发展临床技术的需要，还是特定医生群体的需要？

五 对人类基因研究和抗衰老话题的易理思

考 / 146

抗衰老的研究和实践也决非一元论事——客观上更是多元论事。未来的人类基因研究成果，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看也绝不会是万能的。

六 对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历史文化思考 / 154

难道人类今后都要按照这个逻辑模式去面对瘟疫“新病”。

七 杨振宁先生的“归纳法”质疑 / 162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证明，《易经》阴阳思想、象数思维和中医五行生克规律，事实上在起着定理性和原则性的思想指导作用。

八 自学中医的价值和捷径 / 166

中医不仅有自学自助的历史传统，而且自古就不乏自学成才的范例。

自序

.....

古代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造就了中国文化人的“政治情结”。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时候，也首先要看透中国文化人的“政治情结”，这样才能不至于把文化和社会现实利益搅在一起而模糊我们的视野，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纯粹文化含义的思考。

从 20 世纪的历史来看，“政治第一”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会出现这样的畸形逻辑：今天说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过去的一切不在话下；明天又提出“更好”的，把今天给否定了；后天又提出“更更好的”，把明天给否定了……还美其言，说这是历史的进步。一代一代的

不同功利，一代一代对历史的质疑，这样必然会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导致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缺失。

2005年和2006年间，中国大陆出现的“唯科学热”、反传统文化热、反中医热等等，本质上就是民族意识缺失或民族精神缺失的产物。显然，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将导致人们的时代观、人格观、智慧观、科学观、行为观、现实观等等出现错位。这是非常要命的！

前苏联解体，俄罗斯一夜之间举起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东正教旗帜，这一令人震撼的现象不禁令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曾经给世界带来新气象的前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一夜间不见了踪影？——毕竟是70年的历史啊！

我们可以在想象中把战斗英雄黄继光与孝敬父母和清明祭祖联系起来；但我们在想象中又怎么能够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与东正教徒联系起来呢？！

历史就是真相，历史绝不会荒唐；在历史面前，只有人的认识才可能荒唐。

俄罗斯现象是不是在文化观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答案：文化应当是民族的，而不是现实利益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如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一样，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是“民族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什么都可以骂？是不是应当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谁来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

中国文化人既然有“政治情结”，而又必须从“政治情结”中跳出来，这就还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首先看透自己的“政治情结”！比如说，文化人首先应当反思自己的人格观，即为什么对“政治”这样有瘾？为什么总是把“忧国忧民”、“关心政治”

搞到人格高人一等上面去？

作者是这样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

作 者

2007 年 6 月 15 日于香港



时代篇



.....

一个人有身心健康的问题，一个民族也存在身心健康的问题。病态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落后的民族文化观是没有自觉成功的历史依据的！

.....

.....

一 “边缘人”的怪圈

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一个重要的文学刊物登载了一篇长篇小说《边缘人》。小说描写了一位英籍华人变态的文化心理。他在洋人面前喜欢大侃中华几千年文明，但面对欧洲的现代文明，自己的心理却在发虚。他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喜欢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的英式教养，但同时觉得自己心里虚伪和无聊。他两头不讨好，两头都表现得极其虚伪。他的自尊心极力挣扎在感情和理性矛盾的痛苦之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游弋于中西文化“边缘”的孤魂，一

个现代“假洋鬼子”。这是一种失败的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我在生活中也碰到过这类事情。

一位来国内投资的海外华人对我说：“回来十几年，钱也赚了；国内人情好，政策好，也曾回祖地寻根问祖；但就是没有‘回到家’的感觉。”我问他：“你认为‘回到家’的感觉应当是怎样的？”他只是笑笑，也答不出来。我百思不得其解，许久才严肃地问他：“在内心里，你能以自己是个中国人为荣吗？”他思考好一会，才有难言之隐似的回答说：“这是个问题……但我是爱国的……”这时，我的脑海里“轰”地一下豁然明白——又一个“边缘人”！

在全世界谁也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的今天，“边缘人”可悲之处的深层原因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竞争，还要看到文化冲击，看到中西两个文明竞争的严峻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否健康？病态的民族文化观能在未来的民族发展道路上走多远？

也许回顾历史会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一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近代史的各时期屡屡出现过类似以迷信“刀枪不入”的愚昧行为来抵抗外来文化或武装侵略的事情。这是一种落后的或病态的文化心理表现。近百多年来，中国每一次被动或主动地打开国门，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先进商品或外来文化等等，总会有人出来宣扬民族文化，但其中不乏以愚昧的行为去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以寻回自己的失落的事例。这都是落后的文化行为，是没有文化理性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20年出现的“文化复古热”和“伪气功热”现象，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个毫无文化理性的旧时代的产

物。只是当今时代不是“破坏旧世界”而是“建设新世界”的新时代，所以显得尤其落后。

有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对此有人解释说，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没有科学。科学确实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科学也是战胜封建愚昧强有力的法宝。科学也确实战胜了中国 20 世纪末的伪气功歪风和反科学思潮。但是，事情远没有完——旧时代的思想观念只能把“科学”看作是神，或者看作功利，这就又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

2006 年中国的 GDP 上升到世界的第四位，按说应当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年，应当是大大唤醒民族自豪感的一年。但恰恰相反，这一年成了反传统文化最突出的一年。其中有人挥舞着“科学”的大棒，狠追猛打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恨不得让中医一夜消失。有学者以“科学标准”的名义，棍打一大片，大有另立一套所谓“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势，否定古代中国的所有学问，说中华民族是“无学的民族”；更可笑的是，有著名文人以“科学量化”为标准，指责《孙子兵法》为缺乏实证量化而“靠近巫术”。还有不少学者以“科学”和“民主”的名义，对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狠泼脏水，大肆污蔑。甚至还有学者将已深入人心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大作调侃以为能事……

太不可思议了！过去穷，固然可以把问题推到“因为穷”那里去；富裕了，还不能高兴。如果说富了就要往更高要求看，哪怕是“民主”问题，那无非是有话就说，去发表各自的言论，这不是好事吗？一代人干好一代人的事，干嘛要去骂几千年前的祖宗！

现实情况说明，当今中国人不缺乏学问，不缺乏文化；但缺乏学问观，缺乏思想，缺乏文化的文化——即文化观和历史观。也就是说缺乏健康的文化心理，缺乏正确看待知识和财富的时代观。不



知道如何面对富裕，不知道怎样看待历史和现实，这就必然会在人格观、科学观、历史观、现实观等方面落伍于时代，谈何“崛起”！

一个人有身心健康的问题，一个民族也有“身心健康”的问题，病态的民族文化和落后的民族文化观是没有自觉成功的历史依据的！历史证明，经济落后固然要挨打，但民族精神颓丧、民族意识缺失或文化观落后更是要挨打。

中国内地一些极富正气的学者已经看到“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不同文明的竞争，是更为深层的竞争”，“在所有的侵略中，最彻底、也是最隐蔽的侵略，莫过于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传统的破坏和扭曲”！

中国人应当树立民族文明竞争意识，应当使自己成为民族文明竞争的自觉者和成熟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思考前人没有思考的问题，在民族文化的建设上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举时不我待！

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始料不及，但又是真实的问题：没有西方的宗教历史文化，能有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吗？！

二 西方科学、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生态的产物

在当今时代，当我们在思考或评论中国文化时，实际上在心里已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这个方法虽无可厚非，但“机械”地比较决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结论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当是寻找新的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智慧。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民智没有西方人开化，所以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具有宗教意识；或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最发达最集中的地方，所以认为在那

里宗教神学最没有市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而且大有讽刺的意味。

2005年6月6日《中国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题目是《民调显示四成美国民众支持宗教干预政治》。消息说：“美国社会正在日益趋向右翼保守。宗教势力在重新崛起。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宗教，他们甚至愿意将宗教信条与政治结合起来……根据美联社与IPSOS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宗教对他们很重要，而且有4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导人应该影响政策制定者。”

本作者手上还有这样一个信息。

2003年9月9日晚，我在香港电视台看到由美国媒体制作的专题片《进化新纪元》，其中讲述了这样的事件：在美国的杰佛逊中学，有60%以上的中学生抵触科学的进化论课程，聚众向校方请愿，和校方谈判，要求上进化论课时要与基督教的“特创论”一起讲授，或者在自然科学课堂另设“特创论”的课目。

不可思议吧！当今中国科学远不如欧美发达，但不能设想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想到，欧美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创造了当今如此发达的科学物质文明，但它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可变的是政治和经济，但他的文化和精神是不变的。

为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国内的那些反中国传统文化或者那些崇洋媚外的人，不禁作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他们不是想把我们带到基督教那里去，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幼稚！

西方不少学者把世界划分为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先不说这么划分是否太简单，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世界影响力大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是非宗教的

文明——是人学信仰的文明。

我曾对一些文化问题很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西方人可以从来不注意人生命题的思考和修养；而我们中国人却要对人生和自身修养苦苦思索？为什么西方立足于宗教神学的文化居然可以善于创建科学和发展科学；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琢磨人”上，而不是琢磨物——即琢磨科学上？为什么西方宗教神学背景的社会环境，可以很好地发展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而我们中国的封建迷信却是科学和民主的障碍？为什么西方的宗教神学可以与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谐共存；而人学文化信仰背景的近代中国，人与人之间称孤道寡，不能平等而不能科学和民主？当这些问题经过苦思冥想被弄明白之后，心里觉得很滑稽——没想到其中的道理和原因是那么的简单！

西方人把人生命题的思考和修养交给了上帝。他们都是造物主的儿子，死后都由牧师送他们到天堂，他们活着可以尽情地生活在神学理据的精神背景之中。

西方人可以在信仰宗教的同时搞科学，《进化新纪元》说伽利略不是不信宗教才搞科学，更不是为反宗教才搞科学。至今欧洲有不少科学家说自己“把宗教神学看成为人生意义的依据，而我们研究的科学是神所创造的事物”。这个现象令人震撼和深思。他们可以在信仰宗教的前提下相信科学和研究科学。在他们那里，认为科学不能解释人生和说明人生，科学也不能成为人生意义的归宿。在他们那里，思想上，宗教和科学不在一个层次上；而是把宗教放在最高处，把科学和自然客观现象放在从属的地位。再看看美国杰佛逊中学 60% 的中学生抵触进化论课程，要求校方在设立自然科学课堂的同时设立“创世论”课目，这也正是宗教、科学两不误，而思想上又不把宗教和科学放在同一层次上的事例。

这些事例都是西方文化真实世界与宗教神学妥协的真实写照。把一切真实的科学和真实的政治形态看作是“神所创造的事物”，那么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也就可以不违背宗教精神，宗教和科学、民主就可以和谐共存了！

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之所以实行得这样有效而不会内耗，这是因为上帝赐给他们的。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用孙中山的话说：“四万万人都想争做皇帝。”而在西方则不同。西方有了造物主和救世主，不需要进行人生立命的思考和修养，也不需要人上人或个人崇拜，平民和总统都是上帝的儿子，父母长辈也不在话下。你看他们吃饭的时候，饭前首先感谢主的恩赐，而不是敬重父母，长此以往，今天即使有人不做饭前感恩了，也就无需重新生造敬重父母的规矩了。只有上帝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人与人之间，包括总统，都不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了。那么人与人之间剩下的是什么？那就是利益，就是物，当然也还有不具神圣性的感情。也就是说，除了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之外，在“神创造的事物”的范围内，人人都有权去创造，去争夺，几乎没有什么不敢干的。这就是西方社会大胆创造科学，大胆弱肉强食，大胆 180 度转弯的政治、法制或妥协。所以，西方社会近几百年的文明，是一个集科学、民主而又富于掠夺性、无常性、自私性于一体的宗教文明。西方世界近几百年来所作所为都在反映着这种德性。

事实就是这样的简单，简单得不可思议。

事实是客观的，“道理”是主观的。事实不需要“道理”，而我们人却需要“道理”。但是，“道理”永远追不上事实。

我们需要“道理”，这是因为不想让事实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但事实本身往往出乎意料得令人瞠目结舌。

对于信仰同一宗教的群体或社会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此之外，一切社会制度、科学认识、人的地位等等都是可变的，或者说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这个事实或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连我们自己都始料不及、但又是真实的问题：没有西方的宗教历史文化，能有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吗？！

也许有人觉得我这么说很荒唐。

我们试想想，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以民族的形式来实现这个道理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与此同理，为什么我们在认识或探讨西方科学、民主的时候，就可以不去想想西方是以什么样的民族形式来实现科学、民主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科学不也是民族化的东西吗？再想想看，欧洲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最早提出“人权”，是向谁要“人权”——教科书不是说得很清楚，是向神权要“人权”吗？！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再怎么千变万化，而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是不变的。试想，西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什么？不就是来自于基督教文明吗？

西方的科学、民主发生和发展在基督教文明的生态中；或者说，西方的科学、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生态的产物！

早期基督教创始于公元1世纪，是罗马帝国奴隶制崩溃时期要求解放的奴隶和贫民的宗教，反映了当时奴隶和贫民的反抗精神，强调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主张平等博爱；同时又认为人们受奴役和贫困如在“今世”无法解脱，就应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西方基督教这一“性格”特征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方科学、民主的“基因”。再看看伊斯兰教，“伊斯兰”的原意就是“顺从”。顾名思义就很不一样。

我们的主流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但从欧美的现实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从一些科学家所说的“我们研究的是神所创造的事物”来看，西方基督教似乎又有新的变化，或者说西方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又“与时俱进”了。历史上基督教就曾多次改革或变化。

我并不是在否认中国需要科学和民主，而是说，在思考科学和民主时，首先要认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然后才谈得上我们以怎样的民族形式去实现。我严肃地认为，不懂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不深刻认识宗教，或者不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人学信仰，那就不足以在文化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俄罗斯人在前苏联解体后，仍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信心的原因和动力，是来自于俄罗斯历史宗教的精神力量！

三 巨人落地抓把沙

在 20 世纪末，我曾在一媒体资料了解到，俄罗斯有一民间组织叫“天体乐团”，这个组织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活跃了十多年。所谓“天体乐团”实际上是一个以裸体暴露为荣的组织。这个组织经常几十人或几百人到海边或小岛上活动，众多的男女老少赤裸裸地一起消闲玩耍或进行其他活动。但活动并不是崇尚性开放的，只是表达他们憎恶一切传统和规范。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民族文明失败的迹象；如果是这样，那么俄罗斯的前景真令人担忧。

后来在 2000 年一个偶然机会，在电视媒体上看到俄罗斯人民生活非常艰难的报道。莫斯科市民在购买每天每人限量少得可怜的面包。当我看到买面包的市民们排着好几百米的长队而秩序井然，无一人争先恐后时，我心里肃然起敬，感觉到俄罗斯民族无疑会重新崛起。

但是，有一点我不很明白。对于前苏联 70 多年的意识形态作出了否定，而现在这个民族的凝聚力靠什么精神来支撑？要知道，一个国家靠一时的运气，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经济上富裕起来，这样的例子不难找；但一个民族的运气跌到最低谷，短时间内要在精神上重新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后来才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了解到，俄罗斯民族精神与宗教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内地有学者在香港凤凰卫视台介绍说，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国歌是一首古老的宗教歌曲，其歌名是《俄罗斯是上帝赐与我们的国家》；当今俄罗斯的国旗由白、蓝、红三种颜色组成：白色象征着沙皇，蓝色象征着东正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红色象征着俄罗斯民族。受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人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拯救。西方哲学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俄罗斯人认为存在的都不是合理的，合理的永远在于美好未来。

俄罗斯民族在前苏联解体后所以仍然具有凝聚力，其动力来自于公元 998 年创立的东正教。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前苏联解体后仍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信心的原因和动力，是来自于俄罗斯历史宗教的精神力量！

这不禁使我想起广东民间武术的一句谚语：“落地抓把沙。”意思是说，当自己不慎被敌方击倒在地，要本能地在地上抓把沙往敌方的眼睛打去，以减缓敌方的连续进攻的速度，为自己尽快站起来重新组织进攻争取时间和机会。

同一个道理，一个民族难免一时的成败，但必须永远具有内心自豪的精神，这样才能永远勇敢地面对新的成与败，才能永远具有竞争的资格和成功的机会。

我们知道了巨人俄罗斯“落地”之时抓的是历史宗教那把沙……我们不难想见，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那把沙”。只是我们在想象中能够把战斗英雄黄继光与清明祭祖等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但我们又怎么能够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保尔·柯察金与东正教徒联系起来？



.....
这一思想实际上没有为造物主留下任何位置。所以说，一部《易经》注定了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
.....

四 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

有西方学者把世界文明划分为三大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也许这样划分不是很准确，因为全世界有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且作为宗教国家的印度就有 10 亿人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全世界影响较大的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人学文明——非宗教文明。为了讨论问题的效率，在这里只是有针对性地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作比较。又因为“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在内，所以为了讨论问题的准确

性和以免犯忌，还是提“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为妥。

历史上，伊斯兰教和佛教在汉以前没有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在汉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

注意，有学者把历史上拜神现象看作是宗教，这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的“土地神”、“妈祖”、“财神”、“关公”等等诸神都是功利神，远远不是宗教神。什么是宗教？宗教的明显标志首先是对世界的生成和本源都归到“造物主”那里，对人生前死后的灵魂状况等等都有系统的理论和解说，同时还有严格的组织和理论。而在这点上，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

诸子百家活跃在 2000 多年前。在所有宗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医学、文学、艺术风格及美学等等就已经形成。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做着挖掘和继承上的事。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依靠一种哲学思想来支撑。那么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我赞成一个观点，那就是“道家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

早在 1994 年，国内杂志《哲学研究》当年第一期就发表了学者陈鼓应的关于这个观点的文章。

陈鼓应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发展及比较哲学这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他说从时间上看，老子之学先于孔子。从老子哲学本身来看，它的全面与深刻是许多同时及后代的哲学所不及的。老子哲学既有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又有对社会人生的洞察；既有系统的认识学说，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老子以自然无为之道来贯通天、地、人，视宇宙为一整体，根本否定了人格性的上帝或天的存在。作为先秦诸子中

第一人，老子的学说对先秦诸子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纵观中国哲学思想史，大部分形而上学概念、范畴，如“道”、“德”、“有”、“无”、“理”、“气”、“太极”、“无极”、“心”、“性”等等都为道家所创，而它们正是各阶段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概念。自战国中后期始，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每一重大阶段或学派莫不受道家学说影响，这种情形更能说明道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主干。

陈鼓应还在文章中说，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老子的“道”无疑是对宇宙人生的“普遍性解释”，而其“法自然”的观念中与“自然主义”之旨相通，这都符合西方哲学史家对哲学的规定。同时，从西方哲学史看，其主流一直是形而上学知识论，政治伦理学只是枝节，从西方哲学（主要是从思辨哲学的观点）来看，道家也被视为真正的哲学，并被认作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干。

说到道家，我们要知道道家崇尚的主要两部经典是《易经》和《道德经》。陈鼓应谈道家拿出的是老子及其《道德经》。在陈鼓应那里也许是反映了当今主流学者治学的缺陷。我们知道，在老子《道德经》那里，核心内容是“自然无为之道”和“法自然”，而这些思想和法则来自早于老子很久很久以前的《易经》。我在这里不得不沉重地说，我们把《易经》冷落或忽略了太久太久了！

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人合一”的人天观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化最底下的那块基石就是人天观思想，而那块基石是在《易经》那里就奠定了。

《易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成书。我们不否认《易经》最早是一本占卜的书，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易经》表达了一种哲学思想。在《易经》那里，人被物化了，把人归结到大自然的一部分，认为天地宇宙之外再无他物，所以天人同理，最根本的道理来自于“天意”和“物以类聚”。也由此可见老子的“法自然”思想

是来自《易经》。

当今有西方人提出“自然主义”思想，中国也有人提出“返回大自然”，这些都是反思现代文明的产物，与《易经》的人天观思想根本就是两码事。因为在《易经》和老子那里，“天意”、“物以类聚”和“法自然”，那是天人同理的智慧观，属于思想方法的范畴。

《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的现象之一，自然宇宙之外再无他物。这一思想实际上界定了人的宇宙地位和人的宇宙价值。这一思想实际上没有为造物主留下任何位置。所以说，一部《易经》注定了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

在中国，自古以来皇帝称孤道寡，政治体制从来就与宗教无关。那是因为，既然自然宇宙之外无他物，更无造物主，那么皇帝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人之“王”。在中国文化里，既然无造物主，那么所敬畏的就只有人之“王”和人之“祖”。所以中国古代对皇帝的“忠”和对长辈或祖先“孝”、“敬”，也就顺理成章。这也是中华民族有孝敬老老人美德的根本原因，而西方就没有这一说。

在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里，几乎都有军人间称呼“兄弟”的现象。在中国，天人同理就是天人同大，在没有造物主的民族里，人与人之间以父母为尊，平辈都是“兄弟”。“兄弟”称呼的背后，是没有造物主的人生宇宙价值观，所以“兄弟”称呼尤其神圣。自古以来，中国人一杯酒，一声“兄弟”，可以无畏赴汤蹈火。而在西方，“兄弟”称呼就没有这个意义，或者人家会笑你傻。

《易经》思想界定了天人同理、天人同大的人的宇宙地位和人的宇宙价值，那么最高的道德或人生境界，也就像客观宇宙那样自

然而毫无自私动机了。所以老子《道德经》向宇宙深沉地低吟“上德不德”的中国文化的立命观。这是何等的无私，何等的胸怀宽大！孔子继承了这一立命观去思考人生，认为人生寿短何足惜，人生万岁不死又何足贵，他掷地有声而又毫不犹豫的喊出了中国文化的人学宣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不同的文化信仰有不同的活法，也有不同的死法。广东韶关有个书法家叫朱玉醒，已于2006年10月间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极力背诵唐代古诗。临死的时候不是想到“上帝”，想到“天国”，想到“来世”；而是仍然肯定着天地间的人的价值。这就是龙的传人！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人！

我们要庆幸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神学的文化——而是人学信仰的文化。

人学信仰文化的历史不会产生宗教极端主义，不会卷入几百年甚至千年不解的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中。在世界历史上，宗教国家的长期宗教战争的例子有目共睹。在现实中，宗教国家以其宗教的原因，诸如不能实行计划生育或千百年不解的宗教纠纷等事例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文明竞争剧烈的当今世界，中国大陆竟然有名人发出这样的声音，认为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行的，试图以“本土”宗教抵制外来宗教。中华民族对此应当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千万不能落入“屋漏又逢连夜雨”的境地！

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保持人学信仰文化的可塑性优势，继承《易经》善变、适变的“变易”思想，不为一时的成败所迷惑。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能力，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明的厚重去看到中国文化的光明，去相信我们其实具有最好的传统文化，以自觉和成熟的文明竞争者的姿态去创造和挑战未来！

中国文化在上没有造物主和救世主，在下不畏惧“怪力乱神”

或地狱。唯有中国文化是不依靠神的顶天立地的人学文化。中国文化既雍容华贵又不失血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千百年稚童的唱读声在历史的天空悠然回响！



作为美籍华人的杨振宁先生，既然会用“科学”来谈文化，那么他会用“科学”向美国人质疑“造物主”吗？

五 “科学”与“民族信仰”

作为非宗教文明的中华人学文化体系，确实不具备现代科学意义的实证和推理方法，所以，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与狭义科学是不沾边的。为此，许多学者不能理直气壮。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已经成为许多思考者的思想障碍。

2005年2月26日《广州日报》A5版报道说：

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先生作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发言，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

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杨振宁说：“我关注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演绎法了，中国把归纳法认为是唯一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个致命伤。我指出这点是许多人不喜欢的。”

先不说杨振宁先生能不能以“归纳法”去解释中医经络学和中医的五行生克理论，仅就其言论的目的就很值得玩味。

杨振宁先生是在批评当今中国科学落后？显然不是。是在批评当今中国还没有“演绎法”？显然也不是。

在“文化高峰论坛”当然不是为了谈“科学”，而是要谈“文化”，而且明知要得罪很多人，也要批判《易经》。这是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美籍华人的杨振宁先生，既然会用“科学”来谈文化，那么他会用“科学”向美国人质疑“造物主”吗？他知道《易经》是世界上唯一影响大的非宗教文明的基石吗？他知道他的言论客观上伤害了非宗教文明的中华汉民族的精神传统吗？如果这些问题他都不明白，那么他会是个懂文化的人吗？

杨振宁先生也只能在非宗教历史文明的中国以科学质疑民族文化信仰，否则他到科学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宗教历史文明的欧洲国家试试看！

在中国总是有这样的人，以他们对“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有限认识，认为凡“科学”和“唯物主义”暂时不能解释的一切东西都是危险的东西，都应该否定，哪怕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否定过头也在所不惜。这种文化观或历史观与做买卖有什么区别？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是多么的悲哀！

常识告诉我们，一切政治主张都应当以民族的形式来实现。那

种为了一时的功利而不惜伤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做法只能是饮鸩止渴。

现代意义的狭义“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而当今全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信仰几乎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且除中华汉民族的人学信仰外，几乎都是宗教信仰。这一事实说明，当今所有民族信仰与“科学”无关，甚至至今“科学”并没有成为哪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信仰或精神传统。这一事实足以向杨振宁先生提出这样的质疑：“科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对等吗——或者说，能以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民族信仰或民族精神传统吗？！

但是，杨振宁先生毕竟代表了好一些人，而且，在中国的 100 多年的历史，像杨振宁先生那样以科学质疑或反对中国文化的不乏其人。以此看来，是到了认真思考“科学”的时候了。

或者说“只有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六 “科学”及其话语大观

世界就是这么滑稽，科学最发达的西方欧美是宗教文明；科学远不如西方欧美发达的中华汉民族却是非宗教的人学文明。

“精神”是对人而言的。显然，宗教是不可能以“科学”待人的，在宗教那里，“精神”只能是宗教的。相反，按理说，人学文明才有可能以“科学”待人，非宗教文明的中华汉民族应当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先天”性质，而且，华夏曾是文明古国，即使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曾领先西方欧美上千年。

但是，100多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都缺乏“科学”，缺乏“科学精神”。不管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深层思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化人学信仰修养的必须。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但实际上并不简单。

2001年4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论科学精神》（王大珩、于光远主编），里面有大量著名学者的论述。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这也许对我们认识“科学”和“科学精神”会有帮助。

北京机械化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开逊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中，对“科学”的定义是这么说的：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想给科学下个定义，现在这种努力还在继续。可是，大家发现每一个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渐渐感觉到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下定义的，往往不下定义比下定义好……不直接定义什么是科学，而是说科学到底包含哪些本质特征。当然，这些罗列出的本质特征在不同的时期有的退出了这个行列，有的又加进新的内容，它在不断变化。”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孙小礼在《多元化理解科学精神》论文中说：

“为了发扬科学精神，好像首先要给科学精神下个定义。我想不太容易做到，也不必寻求一种众所公认的定义，实际上不大可能有这么一个定义……我想如果查一查科学精神的定义也不下几十种……就好像现代物理学、数学、化学等一些学科都没有找到一个统一定义……”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在《科学精神不是1+1=2》中

这样说：

“我不太赞同把‘科学精神’当作一个名词或术语去定义……这种概念游戏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都很难严格定义，又如何严格定义‘科学精神’呢？所以我认为‘科学精神’是一个既模糊又现实的概念。说它模糊，是不能给出严格的为各界人士认同的定义，说它现实，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认识或决策，其正确与否就判断了是否符合科学精神。”

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中说，“科学”和“技术”不应混为一谈，并对“科学”、“技术”、“科技”、“科学精神”等话语的使用和变化作了说明和探讨：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前几年说过一句话：中国创用‘科技’这个概念是最大的不幸。它对基础科学、理论科学的发展很不利。我认为他的话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我是赞成的，只是觉得他说的‘创用’两个字不怎么符合事实。1956年我们开始搞全国1956~1967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第二年制定规划的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国家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中南海办公，聂荣臻是主任，我是一个既管自然科学、又管社会科学的副秘书长。1958年，这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黄敬为主任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合并以后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研究以后就用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称。‘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名词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一次连在一起用。用得多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名词就简化成一个名词‘科技’开始用了……‘科技’当然仅仅是语言上的‘简称’，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科技’成了一个名词之后，时间长了，加上有些人喜欢用‘科技’两字，

不那么喜欢用‘科学’两字，在该用‘科学’的时候也用‘科技’。许多人的头脑中，就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概念，似乎‘科技’可以代替‘科学’……在‘科技’这个名词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问题了。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这样的语言很少说了。世界有没有‘科技精神’、‘科技方法’、‘科技态度’的说法？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听说过……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只讲‘科技’，不怎么讲‘科学’，使得‘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这些概念也不讲了。近年来为了反对伪科学才把它们强调出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在《坚持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中，强调仅仅进行科学知识的宣传是不够的：

“……首先，像光远同志谈的，科学和技术不应混为一谈……简单地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知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手段……怎么法轮功会蔓延得那么快、那么猖狂？我们意识到做科普工作的，过去只着重科学事实的宣传，是现象的宣传，而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方面的宣传注意不够……我记得中学时有教师跟我讲，什么叫科学？你看那‘科’字怎么写，一边是个‘禾’，一边是个‘斗’字，意思是用斗量米，这恐怕是最原始的一种科学方法 and 精神了……说科学精神要谈创新，这是最主要的，首先要有科学思想，要知道实践的过程是怎么来的，有了这个就不会作出误判……”

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凯在《科学精神与“包治百病”》中，介绍了中国早期的“科学精神”，并对比了当今的一些客观现象：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早在1922年的一次演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就谈到了科学精神。他说，有一些名为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

生结果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就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学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50年前便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他因而将‘科学精神’是什么，作了最广义的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还长期形成的老一套做法，就是以宣传灌输党在某一时期的政策代替思想教育和素质提高的全部。这就养成相当多的人不思考问题、也不会思考问题的素质缺陷。我们曾经以为那才是理想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李申，在论文《科学精神：如何求真、怎样创新》里，将科学精神纳入哲学范畴，提出了“思维健康”的问题：

“在一定条件下，科学精神甚至比知识更重要……没有这种精神，有了好的方法也未必就能产生出合格的知识……所谓‘迷信科学’之类的说法，指的就是对科学成果的迷信，而不是对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定……当我们对一般哲学反感的时候，就是错误的哲学主张入侵的开始。所以我们提倡‘科学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哲学主张，培养正确的思维习惯……它本身不创造财富，却是创造、保护财富的前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田松，在《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一文中，对于科学精神及其社会价值作了非常精彩的思

考，他说：

“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自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把诸如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同时把野蛮这个坏词给排除出去，尽管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的，人所共见的，但他们说那不是正常现象，是偶然的、非主流的、将会绝迹的，所以不是精神，不予考虑……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希望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在这种观念下，我下意识地就会论证且能论证……但是，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科学精神’，它是否真的已经具有那些我喜欢的性质？”

“‘是’怎样和‘应当’怎样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答，是希望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在几年前，我们倡导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我们倡导的东西叫科学精神，因为我们发现科学不‘精神’了……于是，又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要倡导‘科学’的精神？我想这是与中国长期的唯科学语境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个大词，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在这种语境中，科学具有神的意味……因而在我看来，许多人是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科学是他们迷信的对象……几乎所有想要证明自己正确、高明、有效的东西都曾打过科学神的招牌。比如某某功、某某工程、某某营养液，我甚至还吃过科学烤鸡，号称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包装纸上赫然印着含各种氨基酸多少多少。这时，我回想我以前谈的科学精神，就有了某种警惕。我是否也在假科学之名宣扬某种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宽容是东西，所以我就证明科学具有宽容精神……把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竟发现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社会出现了一些

毛病，诊断的结果是缺少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倡导科学精神；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单单科学精神这味药并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对于以上著名学者的言论，人们大可见仁见智。而我认为有两条非常重要：

一是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的“科学”和“技术”不能混为一谈，语言的正确使用很重要。

二是觉得现实中真正明白什么是“科学”的人确实不多；甚至，正如田松先生所说，很多人都是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即把科学神化了。

很多人在讨论问题时都有一个通病——甚至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毛病，即讨论一个问题上升到学术的层次时，就不能随便使用俗语，而应当把俗语提炼为学术语言，这才有可能进行正常的学术思考和讨论。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青年界为讨论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热闹了好一阵子，实际上这句俗语如果用学术语言表达应为“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这就是很常识性的问题，没有什么讨论价值了。

思考和讨论“科学”问题也是这样，首先应当净化“科学”话语。恰恰在这方面，不少媒体和学者都不能做好，更别说普罗大众了。

正如田松先生所说的，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这里先不说大众语境对“科学”的迷信神化含义，单从语言学角度看就混乱不清。其实大众对“科学”话语的含义何止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根据我对媒体和生活的观察，发现还意味着“学问”、“理智”、“理性”、“理论”、“道理”等等含义。比如说，一个村里的小农经济的粗犷经营也讲“科学”管理，显然这里的“科学”一词已成了俗语。如果

说这也不成问题，那么说“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只有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从民族文明的角度去看问题，其实“科学”或“科学精神”的问题也许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科学发达的西方欧美显然很有“科学精神”，但这并没有改变其宗教文明的民族精神。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得出几乎是现成的结论：科学技术可以日新月异，但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民族精神是不变的。如果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又如果提倡“科学精神”是为了针对邪教的话，那么我们不如用更多的热情去关注我们的人学信仰和民族精神!

.....

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或最喜庆、
最悲哀的时刻，都在表现着最彻底、
最深沉的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而其
他“半截子”的花俏事才是文人的事。

.....

七 生存意识是文化的本质内涵

“文化”这个概念，古今中外都下了很多的定义，似乎都不能统一到唯一的解释。普罗大众会觉得“文化”是文化人的事，而且觉得高不可攀。我认为“文化”属于精神范畴。对“文化”最深沉、最彻底的认识来自于对生死的思考和理解；换一句话说，人的精神来自于生存的自我状态及其认识。所以，我认为，普罗大众才是最深沉、最彻底的文化的体现者，在这一点上，最“高级”的文化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青年男女结婚，是家族的莫大喜事（与神无关），族人、亲戚或好友一起到最能欢聚的场所（而不是到教堂）共同庆祝。再比如说，新生儿合家欢庆，或者“做满月”告知族人，至今还有许多农村还保留着这样的古老传统，即把新生儿的姓名及生辰八字用红纸贴到宗族的祠堂里，而不是宗教的“洗礼”。再比如说，升大学或升官发财，大都告知乡亲父老，普族同庆，引以为豪。再比如说，遇有丧事，家族操办；临终的人最希望是看到自己的亲人和好友，而不是找牧师……

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或最喜庆、最悲哀的时刻，都在表现着最彻底、最深沉的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而其他“半截子”的花俏事才是文化人的事。为此，我们似乎可以给“文化”下这样的定义：“文化”是人的生存意识的总和。

让我们试着分析这样的社会现象。

在本世纪初，中国大地时兴着这样的时装文化。男青年穿着裤裆垂至几乎到膝的牛仔裤，裤脚卷起一大团，这种穿着来自美国街头的滑板青年，裤裆垂至几乎到膝，是为了预防滑板不慎打到阴部。女青年穿着裤头下至露出大半部分平滑的小腹，以示自己正值青春。男女都喜欢穿着打皱的上衣。有的男青年还喜欢穿着打皱的西服，里面的衬衣有意不掖到裤腰里面，甚至有意让衬衣的长度超出外面的西服。

这种穿着可以说已经不能从服装的审美去评论。这种穿着实际上是直接表现其生命阶段和生活态度。它在告诉你，他（她）现在的人生是“玩”的阶段，他（她）青春，他（她）没有正经的责任，什么成家立业不是他（她）的事，他（她）玩得起。

看来文化的思考也是如此的现实和简单。

再让我们对以下这个例子去思考文化问题。2006年7月间，

江西卫视《传奇人生》栏目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说的是江南某市有个王某人，有“江南神偷”、“江南大盗”之称，大半辈子干着行窃偷盗的违法犯罪之事，蹲监狱三进三出。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他觉得是该干点好事的时候了。为此他把自己大半辈子偷盗行窃的技巧和绝招公之于众，并主动与当地警察配合，提高捉拿盗窃违法分子的能力。他因此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他总算是做了一件造福于社会的好事。

这个故事使我感触良多。我在想，如果王某人最后一次从监狱里出来是一个血气方刚、年轻力壮之人，而不是一个年近花甲的人，即使这两种情况的思想境界是一样的，那他还会不会浪子回头？又如果一个人可以万岁不死的话，他又会不会浪子回头？或者再设想，如果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可以使年轻力壮的王某人浪子回头，甚至可以使他一辈子都不会危害社会，那么唯心主义的教育可不可以照样使他一辈子不危害社会？现实的回答是“可以”，宗教思想一样可以使人一辈子不做犯罪之事。

请注意，我这里根本没有诋毁王某人之意，我和大家一样，非常认可他的浪子回头的诚意和贡献。我只不过是想说出这样一个看法：别看一个人的思想、言行，这有道理，或那没道理，其内心世界最根本的支撑点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观；同样道理，众多民族的宗教、信仰，精神和性格，别看他们千姿百态，使人眼花缭乱，其实最底下的那块基石都是对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只不过是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两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不同而已（请注意：其结论有可能一样。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以上思考无非是想说明，抓住生命观的问题，并以此为起点去进行思考，文化的问题就“赤裸裸”了，就会觉得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而且，认识宗教也就不难了，也就可以去更进一步地思考和

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了。

总之，文化的思考是大众的事，广大民众完全有能力和资格去思考和探讨文化问题，也只有大众的自觉思考才能使中国的文化创新有实质性的进展和进步；或者说，如果广大民众放弃自己思想的尊严，让那些名人或精英们代替自己的思考，再一次地让旧时代的精神奴隶的心态作怪，那么这肯定不是文化的进步！

.....
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么中国
上世纪的革命历程实际上是不是在吃
着我们历史文明的老本?!

八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 深层思考

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宗教文明社会的氛围里，作为无神论学说，它是一种民族文化还是一个政治主张或理想呢？俄罗斯现象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还不是民族性的文化。前苏联的解体，在俄罗斯实行了 70 年的马列学说的社会，居然一夜间似乎从没发生过，一个民族文化是不可能这样消失的。而俄罗斯一夜间重新亮出古老的东正教的旗帜却又是那样的从容和自然，这正是民族文化的

力量。这一事实也似乎说明，苏俄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及其后来的社会主义历程，其动力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利益（阶级斗争），即社会政治使然。俄罗斯作为宗教文明的国度，对于实行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上来说是缺乏民族文化的动力的。

“俄罗斯现象”还引发我们作出这样的思考：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决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

我们似乎有理由去作这样的思考：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无神论的学说，放在非宗教文明的民族纷围里实行是不是更有可能或更具有合理性？当今还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等都是非宗教文明或官本社会历史国度的国家。如果这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国家大多可以以改革开放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历史文明的角度看问题也许更能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选择，不仅具有社会现实利益的动力，而且还具有非宗教文明的民族文化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成功！这恐怕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最有分量的历史文明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已被历史证明的真理似乎可以启发我们大胆地做出这样的思考。上世纪的中国革命历程，假如抛开政治术语还能怎样表述呢？无非大体上是说，具有反抗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同时又具有反抗和斗争智慧的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从苏俄的“十月革命”找到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榜样，并实行了适合自己反抗和斗争的生存之路。

国际上也有类似的事例。

尼泊尔有个“毛派共产党”（媒体语言），它成立之时正是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初。这个政党崇拜毛泽东，崇拜中国的社会主义。但这个政党并非真的了解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国的社

会主义，而是看到全世界只有社会主义中国不怕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只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敢于和帝国主义对抗，特别是在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那里看到了敢于和能够不怕强大敌人的精神和军事方法。为此这个政党模仿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而组织了军事力量，由两条枪开始发展到有政治地位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诸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都不是他们首先要搞清楚的。

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当时的中华民族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恐怕也是近似直观的榜样的作用，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被压迫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历史上难道不是经过多次的“路线斗争”，多次教条主义的沉重代价才最终明白“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道理吗？等到真正明白革命必须民族化时，实际上不就是又一次的“民族创造”吗？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或者说是政治斗争的学说，这一思想的历史学观点当然是政治史学观。我们当今的主流历史学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史学观——再看看我们古代的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官本历史”学，这不正是政治史学观的历史学吗？我们今天很有必要去认真思考这一现象是不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中国上世纪的革命历程实际上是不是在吃着我们历史文明的老本？！同样道理，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中国特色”不就是民族性吗！

如果可以这样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就会明白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多么宝贵，同时我们完全能够把政治与民族文化进行全新的定位，完全明白我们应当思考点什么或干点什么，特别是我们应当敬畏什么或者说绝对不能损害什么。比如说，不管什么政治主张或社会理

想，都必须民族化，除此之外都不可能实现；反过来说，一切损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行为都是失败的行为或错误的行为。

中华民族在上世纪的文明历程绝不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中华民族不可能像俄罗斯民族那样，巨人落地之时可以抓起宗教历史那把沙。作为人学信仰的历史文明的国度，不会也不可能把问题交给“上帝”或“真主”，而传统文化本身注定了中华民族对自己的行为和历史从来就不会健忘，而且充满“感情”和执著。中华民族上世纪的历程定会为我们以及后人留下宝贵的文明遗产。比如说毛泽东的精神已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刚强的一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和骄傲。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文明史观的态度和方法，把毛泽东的精神价值丰富到我们的民族文化上来！

早在上世纪末临近本世纪的时候起，中国大陆民间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普遍热衷于张贴毛泽东的像，南方不少的士司机还在驾驶室挂起毛泽东像。他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祈求“上帝保佑”，而是用我们的历史去“驱邪护身”。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带头，谁都没有这个力量——政治也没有这个力量，唯有民族文化有这个力量！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存在“阶级压迫”了，那么我们更应该学会从民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清政府从来没有动员全民族抗战，而是“私下里”代表全民族投降了。屈辱的结果留给了中华民族。即使这样也就罢了，但是从此以后的中华民族心中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九 民族心理的脆弱性和文化的血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危机，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奋斗和创新。如果指望自己的祖辈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这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可以说这是腐败无能的一代。

骂自己的祖宗，骂传统文化那是“二世祖”吃现成的德性。就像一个人要到社会上创一番事业之前，首先骂一轮列祖列宗一样的可笑。恰恰相反，正直的中国人，有作为的中国人，要闯一番事业之前，或出远门创天下之前，往往

首先从列祖列宗那里吸取奋斗的精神力量……

腐败和落后是一代人的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而且，恰恰相反的是，民族传统观念之所以可以历史悠久，这就说明了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比如说古代的父母包办婚姻和男尊女卑观念就是这样。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的父系农业社会，人们维系生命的财产是耕地。耕地比个人的生命还要重要。那时的青年男女早婚，大多十五六岁就已生孩子，而自己的父母这时也才三十岁左右。青年男女结婚时根本不可能有经济独立能力，而且结婚所需的房子及大笔费用都是由父母提供，再者自己今后的生活还指望继承父辈的耕地和房产。在这种情况下，父辈当然要考虑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自己的耕地、房屋等财产怎样才能安全。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父母包办婚姻和男尊女卑观念是符合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

当然，当社会发展到近代工业社会和近代商品经济社会时，这种包办婚姻和男尊女卑观念就格格不入了。但只能是这一代人怎么改变的事，而不是古人有什么错。

再比如说，古代“仁、义、道、德”及宗族制度也是这样。

在古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里，各地农村“山高皇帝远”，人们的社会生活以耕地农务为核心，各势力范围的耕地所有权依靠宗族来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秩序也只能由各宗族制度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仁、义、道、德”价值观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的思想准则，同时也形成了行为准则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治”的现实原因。从两千多年封建农业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来看，说明了它的历史现实的合理性。

同样，当社会发展到近代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社会生活要冲

出土地的束缚，冲出宗族生活的管制范围，这时社会的法制就必需了。但建立法制社会是这一代人的事，法制的空缺并不是古人的错。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现在的“社会现象”与古代的“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更不能以社会现象作为否定一个民族文化的依据。因而得出“长寿”文化的“腐败”和“落后”的结论。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分优劣，那么这个逻辑就已接近了“法西斯”的民族逻辑。再说，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长寿文化”的话，西方基督教传统文化何尝不是“长寿文化”？言论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即使言论充分自由的西方，也是不允许随便污蔑基督教的。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说三道四的人，你能在西方人面前说基督教传统文化的不是吗？

2005 年和 2006 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甚至有的“精英”还以骂中国传统文化而得名得利。由于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里，唯有我中华文明不是宗教神学文明，所以那些骂我中华文明的“文化精英”，其行为尤其不能让所有正直的人所接受。

问题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诋毁中国文化总是可以大行其道？我看这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屈辱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屈辱的历史成了人们的心头之病！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敬畏！

自中国近代史以来，中华民族表现了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强悍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表现了一旦失败难以振作的脆弱性，甚至连起码的理智和精神都丧失了！

请看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区区 4000 人军队，舰船 40 艘，而且还没有后方，先打广州打不下来，再去打厦门也打不下

来，可见英军并非有多强大，反而应当是弱小。但后来英军攻下定门后，又北上到天津海面……清朝道光皇帝就认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当时的英军连广州和厦门都打不下来，而且英军在广州郊区还被自发抗英的三元里人民打得落花流水，接着附近各县 400 余乡几万人自发前来助战，迫使英军退回海上。这样的军队居然成了胜利者，真不可思议！

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也是这样，皇帝甚至没有下诏军民抵抗，更没有制定反抗谋略，就弃都逃到避暑山庄，而且还照样歌舞升平。以往的文学作品总是把八国联军描写得如何的强大，事实也并非如此。八国联军人数约 1.5 万人，而清朝抵抗官兵有 3 万人，而且八国联军的武器并不比清朝军队先进。八国联军打到天津时，缴获了天津的一个清朝军火库，其武器数量足以武装整个八国联军，而且枪炮比八国联军的还要先进……多么儿戏的结局！

清朝政府多次重复着这样的无能和败局，重复着割地赔款的屈辱！面对列强的侵略，由于害怕人民的原因，清政府从来没有动员全民族抗战。而是“私下”里代表全民族投降了。屈辱的结果留给了中华民族。即使这样也就罢了，但是从此以后的中华民族心目中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心理上把那些没有民族动员和主动参与的战败结局承担了下来。

战争作为过程是要全民族主动参与和经历的，哪怕是真正的战败，那么全民族也会找到正义战争的感觉，这样民族精神就不会倒，就可防止民族心理的脆弱性。特别是在官本社会国度的中国，战争的决策或结局由一个最高统治者私下操纵而丧权辱国，那么整个民族由于找不到主动参与正义战争的感觉而封杀了民族文化血性

的一面，这样一百年也难以抬起头来。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从孙中山算起，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不相信中国可以产生可行的救国思想，最后只能指望他国的“一声炮响”作为榜样，才启动了中华民族强悍本性的一面。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据此，想想伟人毛泽东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其意义之重大可以说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2005年，我国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在我看来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这部法律的精神，如果可以理解为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国家，那么也应当可以理解为任何人没有丧权辱国的代表权，即任何人没有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权。否定任何丧权辱国代表权，这有助于防止像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或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再次出现；同时也有助于保障和体现民族正义战争的权利，特别是有助于防止民族精神一百年抬不起头来。

有人把中华民族的屈辱史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的证据，这不仅不符合世界历史的事实，而且这种观念本身就来自于前面所说的民族心理的脆弱性。

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上，众多的强国也曾有丧权辱国的经历。例如，强大的古罗马帝国曾被游牧蛮族灭亡过两次；能征善战的老牌殖民地国家西班牙也曾丧权辱国，曾被北非摩尔人的7000人的军队所征服，并统治了700年之久；英国也被丹麦人征服过，被海盗征服过，而且一样地进贡黄金，割地求和。这总不会归罪于文化的劣根性吧？！

同时从这里也能说明，全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德性，都有出现民族心理脆弱的可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上百年的屈辱史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主动参与生死存亡的正义战争拼搏，就会产生民族心

理的脆弱性，也就会封杀掉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性，而且很难自拔。

这种沉重的历史教训远在宋朝就已出现。

2006 年下半年，中国大地兴起了“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很奇怪，我对此怎么也热情不起来。相反，我却对曾经创造经济奇迹和文化奇迹的宋朝为什么会亡国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宋代历史的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宋史热，形成了宋史研究的国际性合作的局面。其中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说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国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宋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发展。一些中外学者这样描述宋的经济奇迹。

1000 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当时 10 世纪的欧洲伦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而中国首都 150 万人，超过 20 万的城市有 6 个，10 万以上人口的有 46 个。1000 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局、漏泽局等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1000 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年产量 125 万吨。1788 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年产量也就才 7.6 万吨。

1000 年前（11 世纪）中国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到了 17 世纪，即 1661 年瑞典才发行纸币。

1000 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的时候占世界的 80%。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1000 年前中国的经济遥遥领先于世界。

有不少学者认为，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构成财政的主体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农业社会已开始走向工商业社会。直到清末才再一次出现工商业税收收入超过农业税。

宋还拥有 160 万军队。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按理说，落后才会挨打，宋总该强盛了吧，不该挨打，更不该亡国了吧。为什么却恰恰相反，经济和军事居世界首位的宋，却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当时宋的敌国有辽、西夏、金、元等。虽然宋不能征服这些敌国，但从力量对比总不至于最终溃不成军且窝窝囊囊地亡国。对于宋富而不强反而走向亡国的原因，众多历史学家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宋朝在边境进行消极防御，而把防范重点放在对付内部可能发生的意在推翻朝廷的农民起义。宋太宗就曾明确了这一态度。他的逻辑是：“国家无内患，必有外扰；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所以，只要哪个地方出现饥荒，朝廷就迅速从京城派军队开到那里驻扎，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由饥民暴动酿成的农民大起义。与此相反的是，在边境对来犯之敌却反应迟缓，完全采取消极守势。历史上把这一政策概括为“守内虚外”。同时，朝廷为了防范军队作反，崇文抑武，文人精英掌控军队，而武将没有军队管理权，以致军队不尚武、无以能战，一触即溃。

第二个说法是社会颓风盛行，高度的富裕不能转化为提高综合国力，而是从上到下沉溺于声色犬马，歌舞升平。

第三个说法是宋朝苟且偷安，以“岁币”与敌国议和，花大把的银两出钱买和平。宋朝与辽、西夏、金、元等邻国普遍实行出钱

买和平，这一政策模糊了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知，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脆弱，最后不经一战而亡国。

多么沉重的教训，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

宋的亡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宋的经济、科技、社会制度、文化等，其先进和强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宋的亡国是不是应当引起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强大”？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落后就要挨打”里的“落后”这一含义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宋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制度等等方面的发达，当然离不开众多的世界一流的文人精英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肯定造就了大批的文人精英。而且宋也走向了文人精英治国，甚至军队也交给了文人精英。但是，为什么一个强悍的民族居然会变成没有血性呢？这与文人精英治国有多大关系呢？

——对于宋史的研究，自古以来在历史观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或错误，甚至在当今主流学者那里，还普遍适用着“拼图式”的方法，忽略了文化的血性。比如说，2007年1月出版了一本《宋史》，“被学术界誉为断代史研究的抗鼎之作”。在对于我强敌弱而签订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作出这样的评价：“澶渊之盟后，宋的北方州县得以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一和平局面维持百年之久。另外，宋开放对辽的榷场贸易，利用经济优势，赚回大批钱物，以补偿对辽的岁币损失——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显然，这种因畏敌而出钱买来的“和平”并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和平。虽然对敌国的“岁币”损失可在加强与敌国贸易中“补偿”，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以商业逻辑来衡量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况澶渊之盟本来仅仅是宋真宗投降情绪或畏敌的结果。这部《宋史》把“澶渊之盟”

评价为“有积极的一面”，掩盖了宋真宗的投降畏敌情绪，而且让人感觉到花钱买和平的国策有可能具有积极意义。我的观点是，对于丧权辱国花钱买来的和平，使敌国认为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行为的结果，这根本不成其为“和平”；而且自己的边民却“不识干戈”，这对民族的前途毫无“积极”可言。我认为，应该把“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改为“宋苟且偷安的澶渊之盟，给宋辽边关的经济带来了畸形繁荣”。这里不能有“和平”和“积极”用语，因为事实上不正是这个“和平”、“积极”酝酿着宋最后的亡国吗？！

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应当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维护民族的健康心理和文化的血性！

“时代消化不良”，使我们不能及时正视现实，不能及时提起精神面对新的凶险和挑战，甚至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实事求是，更模糊了我们的文化理性。

十 “时代消化不良”是我们最大的腐败

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只要是面对现实，就总是要有所作为，总是要面对新的知识和新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知道如何对待知识和成败，那么再有知识，再有成绩，都不会有好结果；也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发展。

一个人“洗脚上田”，机会找上门来，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的“时代消化不良证”也暴发了。平时的谦虚、谨慎、勤俭的精神和作风不知哪去了。在外，目中无人，横行霸道，骄逸淫奢，

起码的自律、自重都没有了；在内不知敬老爱家。最终或生意破败，或违法坐牢，或另求新欢而抛妻弃子。社会上这种“穿着龙袍不像太子”的事例并不少见。

2002年9月10日《广州日报》转载《中国青年报》报道，题目是《京城百万元婚礼穷极奢华》。其中有这样三段值得玩味：

结婚 10 年补办空中婚礼

记者问小姐是否办过豪华空中婚庆？“当然办过。”她兴冲冲地把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一边让记者看，一边介绍：“新郎是实业家，他们结婚已经 10 年了，年轻时穷，没办过婚礼，现在有钱了补办，他们提出办空中婚礼，图的是和新娘比翼双飞。他委托我们租了两架直升机，每架租金 1 万元。一辆 12 米长的林肯、11 辆奔驰、20 人的军乐队……”记者看了录像，那位年纪不轻的“新郎”把“新娘”抱上由玫瑰点缀的林肯，他俩钻出车顶的天窗像检阅似地招摇过市。汽车开到北京昌平十三陵景区的定陵机场。在由 20 人组成的乐队奏起的《婚礼进行曲》中，他俩分别登上了两架贴有大红喜字的红色直升机……

婚礼越办档次越高

一位婚庆公司的总经理说，京城婚礼有规模越办越大、花销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趋势……他们公司曾办过一场婚礼，车队的首车是一辆 12 米长的林肯，其余的 28 辆全部是奔驰，装饰这些车用的鲜花，10 万元都打不住。3800 元一桌的酒席，摆了 18 桌。“我办过一场 30 多万元的豪华婚礼，还不包括租车的费用。”

另一家婚庆公司的总经理也不甘示弱地对记者说，“新郎”租的是京郊的别墅，请来的 200 位亲友，当天都在四星级标准的度假

村，用餐标准是每人每顿 360 元，光两顿饭就花了 15 万元。场地装饰近 5 万元，这场婚礼几乎包括了婚庆公司的所有项目：请了 40 个礼仪小姐；请来武警部队放了一小时焰火；还有舞狮、舞龙、扭秧歌的……

把五星级酒店套间全包了

……她告诉记者：“我主持过一场上百万元的婚礼。新郎是外地的房地产商，他请了 200 多位亲友，很多都是从外地赶来的。他花了几十万元在一座山庄租了两幢别墅和 20 多套房间，又把一家五星级酒店的 50 多套套间全包了……草坪上矗立着几十座用气球搭的门，两幢别墅的门口装饰着气球柱。为给新娘化妆，车接车送请的是电视台的顶级化妆师。接亲仪式花了 4000 多元，租了辆劳斯莱斯，从一幢别墅把新娘接到距离仅几百米外的另一幢别墅。婚礼上请了 10 来个‘腕级’歌星助兴，还放飞了 5000 个氢气球。婚礼后举行了鸡尾酒会，订餐标准每人 300 元，然后又在草坪上举办了化妆舞会，因灯光、音响耗电量大，导致电量不足，还专门租了电视台的发电车。”

腰缠万贯，富极一方，消费奢侈，这是他们的事，无可厚非。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偏要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要奢侈的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方面：他们要别人羡慕、自卑、甘拜下风，即要别人对自己的崇敬和服从。他们在挥霍金钱的同时，以见到别人的“奴性”为己快。他们奢侈的不仅仅是物质，他们更要“奢侈”别人的人格！

我曾对一种社会现象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在中国大陆许多的

文化人不喜欢别人称其为“先生”，而喜欢别人称其为“老师”。即使不是从事教育职业的也喜欢称其为“老师”。弄明白后才知道，原来“先生”是广泛的称谓，不具有人格高人一等的感觉，而“老师”的称谓是“小圈子”的，具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种“人格奢侈”的德性，肯定不足以承受富裕，不足以消化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再看看那些比比皆是的称孤道寡的广告词和商业招牌，不能不令人感受到，我们实际上还处在落后于时代的文明纷围中。“人格奢侈”和“称孤道寡”的精神观和人格观，更是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最大障碍之一。

什么才是最大的“腐败”？我认为应当是思想的障碍，产生智慧的障碍，实事求是的障碍，人生动力或社会活力的障碍。“腐败”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时代的无能。“腐败”往往是人们不以为然的，司空见惯的，甚至是思想上毫无抵触的。所以来得尤其可怕。比如说，以上报道的“人格奢侈”现象就是典型的腐败现象之一。

“人格奢侈”实际上是旧时代人格的产物。人格观问题也正是人们普遍毫不经意的，更是毫无抵触的，但它往往是我们的大是大非的深层的根源！更是我们“时代消化不良证”的深层次的病根。

——今天我们可以对国际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实时报道，并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哪怕是30年前的事情，往往以为还是在是非中而“莫谈国是”。比如说，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直至2006年即事件的30周年纪念才看到全方位的详细的深入的报道。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新闻自由问题——问题就恰恰不是新闻自由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的社会对于客观事实“消化不良”（当然，可喜的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当年我们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而精神振奋，对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战斗英雄大唱赞歌；但对于美军归还我好几万的被俘人员，却不能以兄弟和战友的态度来对待，这是我们对自己民族行为得失的“消化不良”。

——千百年来稚童吟唱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不能以为荣，反而以为耻，并大骂我们的古人。这是我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消化不良”。

——今天说要学雷锋，明天说雷锋是不现实的人；今天说林彪带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去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明天说林彪从没干过什么好事；今天说刘少奇是我们尊敬的国家主席，明天却突然成了恶魔；今天的小学翻开第一课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明天说那是反动的教育。这些事例都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社会行为“消化不良”。

“时代消化不良证”，使我们不能及时正视现实，不能及时提起精神去面对新的凶险和挑战，甚至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实事求是，更模糊了我们的文化的理性。久而久之，使我们变为不善于思考，不敬畏历史，怀疑一切，甚至出现信仰危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时代消化不良”是多么的可怕。上世纪末发生的文化复古热、愚昧神学热，以及本世纪初的“唯科学热”和“反传统文化热”、“反中医热”等等，本质上都是“时代消化不良证”的表现。“时代消化不良证”，使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一次周期性的、心惊肉跳的“恶性消化”。

就“时代消化不良”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先不说诸多的现实问题，仅从思想观念上，我们急需在哲学观、文化观、历史观、科学观、民族观、政治观、人格观等等方面都具有时代性的突破。这实际上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的期待！

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十一 缺乏“国家文化”是“内耗”的根本原因

虽然说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选择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动力；但是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容忍旧时代封建残余的“国家观念”。

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

当今世界，以国家制度为核心的现实社会文明，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国家文化”。

任何现实社会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之中。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定

的民族文化的特色，但在现实中，民族文化必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或在国家文化的氛围里表现出来。或者说，国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现实空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再雄厚也会缺乏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甚至民族文化也会被扭曲。

2006 年间有媒体报道说，一些中国游客到欧洲旅游，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丢杂物，逼挤公交车等等不文明行为，引来当地国家市民的反感。这确实是现代社会公德缺失的不文明现象。据此，中国有文化名人把这一现象评论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说，要建立中国的现代社会公德，就必须“打破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我认为这是小题大作，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在认识上对现实社会和历史文明混淆不清；也就是在把“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混为一谈。

前面说的“浪子回头”中的王某人所在的同一个城市，同样在 2006 年间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市民从乘坐的摩托车上不慎遗失 1.4 万多元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撒得公路上满地都是。当时正下着雨，但有胡金虎等几十个当地市民冒雨把钱收拾在一起，然后交给警察，最后由警察寻找失主，并把钱全部如数交还给失主。这些市民够可爱了吧，够有社会公德了吧，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公德也不会比这更好了吧！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现代国家文化的社会公德，而是沉淀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因为正是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可能会在公众场所喧哗、吐痰、乱丢杂物或逼挤公交车。其实中国人不缺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更不是中国文化有什么“劣性”或不如西方文化，而是人们普遍缺乏现代的国家文化。人们总是以传统道德代替了现代社会公德。

“国家文化”需要建设，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请注意，社会的政治政策不能代替“国家文化”。

如果要问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 1979 年的三十年间干了什么？大多数人会这样数：解放初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是“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大多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国家生活，更不是国家文化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政治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人们只有“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等政治身份意识，而没有公民意识。即使是社会政治，其内容也层出不穷，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的做法，使大众无从确定社会价值观，而把社会生活的主导看在“最高指示”或最新文件上，而不是正常的国家生活或法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夜间被打成“反革命”并作人格侮辱的游街示众。这种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事件，最严重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最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文化的建设，最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

国家文化的缺失，导致人们往往以旧时代“人治”社会的道德是非观念代替了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长期的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机制和国家生活，产生了一种社会是非的个人言论可以直接轰动社会的畸形逻辑，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社会是非暴发户”！

过去极左的年代里，一张“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可以搞倒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一个小学生的“反潮流”行为可以掀起全社会的热潮；一位学生考试交白卷的另类行为，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教育制

度；一位家长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可以使全社会的知识青年下乡热达到高潮……长期的偏离国家制度的“社会政治热”现象，误导了人们个人的社会定位，误导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观，一些想在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才，以为可以避开国家制度或现代文明，以政治运动似的方式来引起社会轰动而实现自己的主张或理想；同时一些居心不良的社会投机分子更是看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他们以“奇货可居”的逻辑行为，不惜以损害人们的利益而躁动。2005~2006年间，一些所谓社会精英打着“现代文明”和“科学”的名义，刮起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反中医热。这些现象莫不是“畸形逻辑”的产物，莫不是“社会是非暴发户”的心理使然。比如说反中医问题吧。先不说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了，就说当前，难道众多中医院校、中医院、中医管理部门等等都是不合法的吗？当然，学术探讨是应当自由的，但难道反中医的人不知道学术的场所和对象在哪里吗？或者说，你认为中医是不合法的，那就应当到法律的场所去反对中医，但为什么又偏偏要在制度外大张旗鼓呢？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上不少人，也包括一些媒体，以政治运动的习惯思维来关注或参与“社会争论热”。他们更关注的是事态的热闹过程和结果，而不是首先反思这些现象本身是不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这种落后的社会现象，简直在令我们的社会蒙羞！

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缺乏国家文化的社会即是缺乏科学思想的社会。或者说，国家文化的建设才是科学思想普及的社会条件！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几十年了，而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还是这样的任重道远。在中国大地，为什么非政治性的东西总是变为政治化？为什么像“科学”、“民主”、“现代文明”等等这些本该让人喜悦的事总是会变味？

我们看看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宗教，甚至世界上很多的邪教中心均设在美国，但为什么人家可以多元共存？

再看看香港，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秩序井然地搭乘公共汽车，就这难得的社会公德，从来没听说之前有过什么心惊肉跳的争论热。

直到现在，在很多人那里，以“理”代替制度，以“人治”代替“法治”，以“治人”和“治于人”代替公民意识，以“道理的是非标准”代替多元的客观存在，以精英代替大众的思考……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人们的社会身份的认知，不利于人们对制度的安全感认知，也就不利于国家文化的建设。

直至 2007 年初的“春运”，中国大陆铁路官方还向全社会宣布，“春运”不涨价是为了“惠民”。这一“父母官”的逻辑现象说明，中国的国家文化建设的艰难。

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由个人的社会行为安全意识所决定。比如说，张三要和李四做生意，但张三知道李四“朝中有人”，即使李四不按合同办事，张三在“制度内”也奈何不了李四。那么张三怎么办？他只能或者不敢冒险和李四做这生意，或者也在“制度外”想想办法。这种情况实际上双方都在作着“制度外”的打算。

显而易见，法律的尊严是建设国家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公德教育的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层出不穷的制度外的政治运动代替了国家制度，阻碍了国家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使我们每认识或面临一个新问题，或者我们的社会每做一个大的举措，不管好事坏事都要战战兢兢，都要心惊肉跳。而且政策都是阶段性的，就此社会公民的眼光不敢往远处看，聪明人不得时常“关心国家大事”，走到哪里是哪里。

长此以往，个人行为空间认知错位，以致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创造性的发挥，甚至给社会投机分子扰乱社会稳定以可乘之机。这也正是弘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重大障碍之一。

由于国家文化的缺失，使一些人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老祖宗。

很早就曾听到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用中国人内耗的现实现象去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这实际上是犯了“现象等同本质”的哲学错误。没想到在2007年初，在某电视媒体上看到一个学者精英在讲日本明治维新时，还拿出这个说法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劣性”。真是令人震惊！试想，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大和民族那样保留和继承中国人学文化那么多内涵的？

日本在古代中国的康乾盛世以前那么崇尚中国文化这又怎么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在适应了历史潮流而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国家文化”，而中国却没有赶上这个历史潮流，这才是内耗文化现象的根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反而应当引起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同是人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可以完成现代“国家文化”的建设。我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考价值应当在这里。否则，说我们的落后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劣性本质所决定的，那就根本不是探讨和思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是不是劣等民族的问题。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使中华民族从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中冲了出来。国之不国，何来文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对中华民族贡献可想而知。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这一代革命家们难免以革命斗争的思维用在治国上……对此我们不应向后看；相反，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先辈不仅为我们结束了民族屈辱史，而且留下的建国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是非常宝贵的。但

是，在当今时代里，如果我们还不着重建设我们的国家文化，那就真不知道任何的思考还能有什么价值或必要！

即使再有什么紧要关头，千万不要再指望哪里“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什么。我们应当具有本原性的民族“爆发力”！

十二 文明史观和“文化安全”的思考

在历史上，虽然不乏政治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积极影响的事例，比如上世纪我国由官方推广普通话和台湾官方推广“国语”就很成功。但是，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极左时期对民族文化的摧残来看，也能说明以政治观去认识和对待民族文化是难以长期可靠的。台湾的情况也一样。2007年初，台湾当局把政治上的“去中国化”和民族的“去中国化”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模糊或损害了自己的民族性，而且在

学术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可见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为了不会因为政治是非或其他社会现实问题而损害文化和精神的民族性，都必须研究和建立全新的文明史观。

那么怎样去思考和研究文明史观？我认为首先要认识到文明史观的最终目的是实事求是地强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原则有下面这么几点的思考。

——列宁曾经说过，实事求是应当是贯穿和体现在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如果仅仅把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某个阶段或部分来说明实事求是，那么这个“实事求是”就连儿戏也不如。这一思想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特定时期的政治观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比如说，1938年有反映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题材的《保卫我们的国土》、《八百壮士》、《四万万人民》等三部电影，当时在国统区放映后引起了全国的轰动，而且对当年鼓舞抗日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大陆从未放映过这三部电影。这一事例就说明现实政治是非观往往使我们不能认识和“消化”历史的全部。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这个事例是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特定政治只能是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利益的民族发展的工具。

——伟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以民族的形式来实现，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证明，正确的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切正确可行的意识形态都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否则我们难以在理论上认识民族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看作中华民族的成

功，那就不足以从根本上认识“三个代表思想”。

——伟人毛泽东说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一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对现实、对历史认识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即要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思想行为方法上完全正确以后才着手进行实践，同样道理，我们不能拿事后诸葛亮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具体历史的思想价值。比如说，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在人民思想迷茫、精神沮丧的时候，鲁迅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唤醒人们民族精神意识的强心剂，这一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丢开当时历史环境来看待鲁迅，那么否定鲁迅的理由怎么说怎么有。

——孔子在解说《易经》的“震”卦时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身。”意思是说，有修养的人被霹雳雷声惊吓之后，不能让恐惧充满自己的意识，而是应当从惊吓中认识到，不应以自己曾经恐惧而自以为耻，反而应当去反思“恐惧意识现象”。这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当面临人力不可抗的凶险之时，既要谨慎行事，而又不会被凶险所吓倒的人。这一思想启发我们，即使在那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里，甚至是那些反面或失败的人物事件里，往往会给予我们不可替代而又令人震撼的感受或认识；往往具有可升华为精神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袁世凯对近代民族工业和近代中国军队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与康有为近似，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人物。然而当历史成就了他当总统的时候，面对治理国家的现实，他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当总统，不懂得怎样建设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最终使他选择了复辟他所熟悉的封建帝制。再看看中国第一个“总统”孙中山，他多次重新解释他的“三民主义”，把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理想，甚至佛教的大慈大悲都包括进去，但就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治国理念也不明确（台湾的李敖说孙中山连议会制

度都不懂，怎么可能懂资本主义民主)，再说历史不能证明当时所有反帝反封建的人当中，有谁具有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治国理念。所以袁世凯在不懂得当总统的情况下，选择当他熟悉的皇帝，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说袁世凯的复辟，应当是我辈“洧雷震”。不应以为耻，而应以之“震撼”！这就是对历史的“敬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宇宙永远有时间”。这一思想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时代都应当是伟大的时代，或者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所谓伟大的时代。既然时代无所谓伟大，或每一时代都伟大，那么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首先就是“时间价值”。记得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中国官方搞了本《新三字经》，当时还要求很多部门或企业、学校等人手一册。其内容不能说水平不高，但情况怎样——今天大多数人还是淡忘了，人们根本就没有当码事；但是历史悠久的老《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人们还保留着庄严的记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历史悠久的《三字经》具有厚重的“时间价值”！再看看西方基督教的圣经故事，或其他宗教的故事，重复一二千年，结果就具有了无以伦比的庄严性。这就是古经的“时间价值”在起作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特别是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现象证明，践踏民族文化的“时间价值”，就是在抹杀民族的记忆，就是在模糊民族的意识，就是在淡化民族的精神。再就是以“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去淡化民俗的庄严性，这也是不敬畏历史，对文化“时间价值”的无知。令人不安的是，这类对民族文化的野蛮行为似乎没有引起国人的警惕！相反的是，2007年4月，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逝世，其葬礼采用了东正教传统仪式，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接着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20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这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从外面“进口”了思想。问题是，从历史上看，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认为中国“本土”可以产生正确的救国思想？今天看来，我们或者可以事后诸葛亮地解释说“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民族创造”；或者还可以用马列学说去解释。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反思我们的民族特质是不是具有本原性的民族“爆发力”？当年“马列”的俄罗斯已经“东正教”了，我们今后的“中国特色”事业是不是还需要从外面“进口”思想？我们自己是否具有生产或创造新思想的能力……一个只能依靠“进口”思想而不能创造新思想的民族还能有多大的前途？

——西方欧洲一本《圣经》神学故事重复了 2000 年，为什么居然比我们注重真实历史“以史为鉴”更管用？！古今中外，哪一个民族的信仰在历史上不是来自类似图腾崇拜的迷信？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历史掐头去尾的话，那么是不是应当承认迷信色彩的历史文化的时间价值？我们是不是应当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以及重新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

历史不是理论的，而理论却是历史的。

那种不把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当码事，而且一代不同一代的历史学价值观，是时候该休止了！那种以人格高人一等姿态的学者掌控文化话语权的时代应该快点结束了！

以上是我对文明史观或历史学思想原则及其依据的思考。我认为以这样的文明史观去认识历史和中国文化，就会觉得遍地是宝，就会觉得思想轻松和精神饱满，就会觉得对历史和对民族文化有足够的“时代消化能力”；同时也会觉得我们完全有办法、有能力，去承受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去挖掘出对我们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民族自豪感是一种精神状态，民族精神的缺失，往往比史学领

域某些史实认知缺失来得更糟糕。要维护和振奋民族精神，就必须认识和发挥民族文化的“时间价值”，哪怕其内容是不“科学”的，哪怕是迷信色彩的。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一些宗教的成熟方法。比如说，对《易经》、《道德经》、孔子等，不妨确定纪念日，要编造一套不变的类似宗教仪式的制度，要造成一种氛围，即如西方不能骂上帝，而我们不能骂祖宗。中小学的体育课不要过于“与国际接轨”，要把中国武术纳入体育课。比如说，在对小学生进行科普教育时，首先告诉学生，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是人学文明，而其他的都是宗教文明，这个方法应当更“科学”。比如说，对16周岁的汉族青少年要举行成年人仪式，其中要告诉他们：你们是龙的传人，也是人学文化信仰文明的传人……

让青少年认识宗教信仰和人学信仰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培养，有利于科学思想的普及；而且有利于不信奉宗教的民族应对那虎视眈眈的宗教侵蚀；还可以加强青少年对邪教的免疫能力。

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民族回归历史悠久的东正教的旗帜下，这一事实令人震撼！试想，难道前苏联七十年轰轰烈烈的政治就没有创造出什么文化吗？俄罗斯现象给人的思考太悲壮了！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一切意识形态的归结点，无非就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千万不要以阶段性的意识形态伤害了民族性。我们不知道也不害怕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凶险，即使再有紧要关头，不要再指望哪里“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什么，我们应当具有本原性的民族爆发力！

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似乎可以用文明史观去这样思考。

为什么西方欧洲在几百年的近代史上可以超越我们中国？对此，虽然诸多学者，诸多理论，有过诸多的解答。但从历史文化角度看问题，也许来得更真实，更直接——西方欧洲宗教文明历史，

加上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应用的自由，即宗教历史加科学，使西方欧洲社会的人格观、文化观、历史观、行为观、科学观、现实观等等，都“歪打正着”地与时代相符或与时代不相妨碍！这才是西方欧洲文明后来居上的真正原因！我在这里所以说“歪打正着”，是因为我不相信……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证明，西方欧洲是在研究透了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之后再进行文艺复兴的；我更不相信——也没有证据证明，西方欧洲是为了日后“崛起”比别人更强大才进行文艺复兴的！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当时迫切要做的事情。

西方欧洲民族并不比我们有智慧；历史的真相也往往被人为地搞复杂了。

2006年中国大陆兴起“大国崛起”的热门话题，对此我怎么都热不起来。如果我们把当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延续，那么就会看到中国历史上自宋以后几乎都不是“主动”发展；而是“被迫”发展。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后使旧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化，中国人民会这样急切地剪去辫子，追求新文化，走向革命吗？如果新中国不是身受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会这样着急地搞“两弹一星”吗？“文革”后，如果不是看到自己的经济太落后，看到“落后就要挨打”，能这样迫切地“改革开放”吗？“被迫”发展的事实，激发了民族的斗志；但是由于“被迫”发展需要他国作“参照物”，所以“被迫”发展的心态也催生了“洋奴哲学”和“好大喜功”。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在没有丝毫的“被迫”发展心态的情况下，都能像汉、唐——乃至先秦那样强劲而主动地发展，那么我们会根治“洋奴哲学”和“好大喜功”，中国也就真正崛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的古训，实际上也是古代中国发展观的概括！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主题先行”，历史上只看到民

族所为的都是眼前迫切之事。解决民族观、人格观、文化观、历史观、哲学观、行为观、现实观、科学观等等时代性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这已是当务之急！这也正是中国百多年来所以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过去近一百多年来的期待！

当我们完成了民族文化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当我们的“时代消化能力”再也没有问题，当我们的“国家文化”发展成熟起来，当我们的新的文明史观形成和成熟起来，我们就再也没有无为的内耗和犹豫，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实质性的进步；我们的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是民族性、时代性、现实性的高度统一。我想，那应当就是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标志了！当然，这有赖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能以正确的姿态和方法争取更多的宝贵的和平时间。

理性篇

在历史上没有看到佛教参与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和智慧的构建，相反，看到的是佛教在汉传入中国以后的汉化。

一 《易经》、老子、孔子三合一 儒道与释两码事

民族文化最根本性的东西莫过于“信仰”和“智慧”。

如果说，我们要保护中国文化，我们要弘扬中国文化，那么我们要保护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什么东西？是那数之不尽的古董？是那众多的民族戏曲？是那书法和国画？是那中医和历法？是那儒家思想？都不是。这些都不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或者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派生物。当然，当反对这些派生物而损害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的时候，损

害了民族精神传统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破坏了中国文化和损害民族利益了。

那么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什么？那就是古代中国汉以前就已构建的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和“法自然”的智慧观！

一说到信仰，许多国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信仰，这不对。政治信仰的本质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宗教信仰或中国文化人学信仰的本质内涵首先是人与宇宙的关系。所以两者远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一个是哲学的概念，一个是现实社会利益的概念。

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基本的起点就是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就是对自我生命与客观宇宙关系的思考，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称其为“民族文化”就必定有信仰。因此，看不到中国文化的人学信仰，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文化没有达到彻底的认识！

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和救世主，没有宗教信仰，但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人学信仰。那么中国文化的人学信仰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内容，又是怎么构建的？就此我们不妨作如下溯源。

众所周知，《易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成书，也是一本占卜的书。我们今天认为占卜是迷信或不甚严肃，但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却是庄严而神圣的。占卜吉凶过程分为起卦和解卦两部分：解卦断吉凶是“讲道理”，这是一部分；起卦方法和所起的卦是“讲道理”的凭据，这是另一部分。既然占卜的意义在于从“未知”到“先知”，那么如果卦是人为搞出来的，就失去了占卜的意义。所以“讲道理”的凭据必定超出“已知”之外，且卦的来源必定是偶然的，人所不能意料的。《周易·系辞》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的蓍草占法，其方法是用四十九根蓍草，一分为二，用其一，经过“十有八变而成卦”。这种起卦方法纯粹来自偶然，来自人的意料之外。

《山海经》也记载有比《周易》年代还要早的唐虞或重黎时代观天象，观动物象占法，其中说到观动物象法是用杀动物的方法来测吉凶，这就出现了动物骨象占、动物血象占、动物胆汁占等等。《论衡》还有用杀鸡等方法来占卜吉凶，其中有血艳、骨鲜、胆汁亮而满为吉兆之说。可见包括《易经》在内的古代中国最早的占卜或起卦方法，都尊崇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偶然或人所意料之外。这个情况非常重要。这里包含了几个思想原则：一是万事万物没有偶然，《易经》不承认偶然；《易经》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同一宇宙里，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人可以认识和掌握这一必然的内在联系；二是对宇宙认识或思考的起点在“人意”之外，人的知识和经验不足以作为思考生命与宇宙关系的起点；三是“偶然”就是“天意”，“天意”是人讲道理的凭据，“天意”是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起点，“天意”是人所信奉的最根本的依据。

如果有人因为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在历史上来自于迷信方式，因而不愿意谈及，这大可不必；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文化的信仰在历史上都来自于迷信方式！

虽然《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其占卜的方法更是充满了迷信色彩，但其哲学内涵或理性观和“信仰”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从中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文化的人学信仰所信奉的是“天意”；二是从“天意”思想可以看到老子《道德经》的“道法自然”的雏形。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信仰和智慧。一个民族文化的终极依据必定来自于人与宇宙关系的思考——必定来自于哲学——必

定来自于信仰和思想方法。中国文化的终极依据，也即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人学信仰，信奉的是“天意”！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是由信奉“天意”而产生的“道法自然”！

——信奉“天意”，“道法自然”，因而有了“天人合一”、“天人同理”之说，亦有“天大、地大、人大”之说。

——信奉“天意”，“道法自然”，因而亦有“天子”之说，“天意不可违”之说，亦有“替天行道”之说。

——信奉“天意”，“道法自然”，因而有祭祖敬老之说，有了对“家”的敬重，有了“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之说。

——信奉“天意”，“道法自然”，因而有了中国的汉字、兵法、武术、气功和中医。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长期以来，主流学者把《易经》、《道德经》和孔子儒学分开来进行七零八碎的研究，即使对《易经》的研究也只关注孔子《易传》对卦象的解释，对于古经里起卦方法的哲学内涵，因其有迷信色彩而不屑一顾（直到2007年初，我在广州、珠海、香港等地的大书店都找不到有著草占卜法记载的《易经》）。我没有看到有主流学者把《易经》、《道德经》和孔子等三者联系起来认识或研究；更没有看到主流学者把中国文化上升到人学信仰的层面上来研究。

1994年初，我有幸在北京白云观与道长震阳子曹信义讨论这个问题。

震阳子说，自古以来道家擅长研究《易经》和《道德经》。在道家的观点看来，《易经》、《道德经》和孔子，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源头和延伸之分，但本质上是一回事。《易经》说的是“天道”，说的是“人”与“天”的合一；《道德经》说的是“道法”之用，是用文字解说《易经》的“道法”和应用；在《易经》和

《道德经》那里，已经确定了人学信仰和“法自然”的智慧，孔子只是据此而解说“人序”、“人道”、“人伦”。《易经》、《道德经》和孔子，三者正好构成“天、地、人”之序。明白了这一点就算明白了中国文化！

震阳子的观点大可看作一家之说，而我对他的这一观点很以为是。也就是说，《易经》、《道德经》和孔子，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系统！

在社会上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说法，说佛教包含了很深厚的中国文化，佛门是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好地方，所以应当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对此我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易经》、《道德经》和孔子儒学，都是战国春秋以前的事，再从大量的出土文物来看，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法等等，在汉以前就已形成，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已形成。在历史上没有看到佛教参与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系统的构建，反而看到的是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以后的汉化（从所有的中国汉族佛学大师那里都能看到汉化的人格）；更何况中国文化是没有造物主的人学文化，与佛教的宗教神学文化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道”、“儒”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部分，人学和宗教根本就是两码事，所以说“道”、“儒”与“释”（佛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古代中国——自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炎黄子孙——信奉“天意”、“道法自然”，从这里应当能够看到人学信仰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应该能够明白我们应当保护什么和继承什么！

曾经遇过宗教人士这样问我：“你就不为‘来世’做点什么吗？”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信奉‘天意’。我所以是人而不是猪狗，这如果是‘前世’努力的结果，那‘前世’不关我的事。我毕

竟是人——这是‘天意’的话，那么‘天意’就是要我立足于人生，做好人生的事情。根据这个逻辑，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不相信今生不按照‘天意’做好一个人，‘来世’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来世’也不关我的事。”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人学信仰来自《易经》“天意”思想的人生立场！

因此，《易经》、《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等“文化三坟”不该失
传。因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在那里。

二 不该失传的文化

1978年夏，一个偶然的机，我结识了广东省韶关市的中医药老前辈郑湘先生（已于1995年去世）。初次见面，他三句不离本行，谈起了中医的历史和趣闻。我向他发问：“中医总说肾主一身之本。为什么不以心、肝、脾、肺为本呢？您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肾主一身之本’呢？”郑湘老先生说：“假如你将黄、白、红、黑、绿五种颜色同等数量的沙粒，一同倒在透明的大瓶里，充分搅匀后，你会看到”黑色“最”抢“眼——颜色的主体是黑的。”我在中学和上山下乡

时看过大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对哲学和思维科学比较敏感。郑湘老先生的话使我震动很大，觉得我们的古人似乎掌握着我们不熟悉、不明白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沉浸在《易经》和中医研究里，一发不可收……

近几十年的积淀，使我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易经》，当今时代最能证实《易经》的原理、最能说明中国文化理性的只有中医。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易经》和中医的哲学思想或思维方式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三部古老经典，自古以来有“文化三坟”之说。随着功利观的强化和时代的变迁，如今人们对这三部经典已渐渐淡忘，甚至著名学者对此也似乎生疏。特别是《易经》，这部古代中国第一本成书，这部影响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主流学者或者将其作训古方面的研究（这是不可缺少的），或者取用其中的名词或语言来装点自己；再有一些自称“大师”的人，大讲“周易预测”，占卜打卦，把《易经》玷污为市井流技。但是，《易经》的哲学思想、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易经》的本质，却很少人问津，更别说《易经》的文化思想价值和思维科学价值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仅仅被理解为“琴、棋、书、画、诗”和“仁、义、道、德”。那些年老离退休的老人们，在家发挥“余热”、写写书法、画画国画、玩玩奇石、唱唱京剧等等休闲的事，往往被媒体郑重其事地当作中国文化的极品来宣传。真不知能有什么理由使我们的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我曾和一位国内著名文化人交谈，他把书法、国画看成是中国文化最高的东西。我问他：“你懂孔子吗？”他回答说：“不懂孔子还能谈中国文化吗？”我再问：“你懂《易经》吗？”他不屑一顾

地说：“那无非是一本占卜的书。”我说：“孟子曾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孔子五十岁起，用他思想最成熟的时期去注解和研究《易经》，当今我们看到的《周易》，有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是孔子及其弟子注解的。不要求你懂《易经》，但孔子在最成熟的思想时期用大力气去研《易》和注《易》，这总应该知其所以然吧？——不懂孔子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行为又怎么能说真正懂孔子呢？”

我对那种把“休闲文化”当作中国文化“极品”来摆弄的行为极为反感，因为那不仅违背事实，而且使我们的年轻一代把中国文化误解为仅仅是一种感情或休闲的东西。

事实上我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而不是“休闲民族”。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各地的中医和中国武术深入人心，即使不懂“琴棋书画、仁义道德”的年轻人，也会知道中医药和李小龙的中国功夫——这些中国文化“硬件”。

现在是应该好好谈谈中国文化理性的时候了。

中国文化从哪里谈起？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其实不简单。中国文化不能从“琴、棋、书、画、诗”和“仁、义、道、德”谈起——中国文化只能从“天人合一”谈起。“天人合一”在《易经》那里。谈《易经》从理论到理论不足为信，而当今最能证实和说明《易经》思想及方法的就是中医。也就是说，当今只有用中医药理论和实践这个硬指标道理来证实和说明《易经》的本质和思想，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才能使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信服，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理性依据。因此，《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文化三坟”不该失传。因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依据在那里，中国文化的理性观在那里；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心理健康问题。

“琴、棋、书、画、戏、曲”等，当然是中国文化，但那只是方式的部分，不能直接代替理性及理性观。对中国文化的理性的认识至关重要——怎样继承传统和开创未来，其文化思想依据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民族文化观最有说服力的硬道理在这里！比如说，你可以不懂中医、不懂《易经》，甚至你是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但当你患了病，中医可治好你的疾患，这就是“硬道理”的客观作用。总之，在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今天，中华文明要经得起外来文明的挑战和自身的创新，单靠感情用事和形式的比较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落后的。最根本的一条应当是从思考中国文化的理性及其依据着手。这样才能使我们冷静，才能使我们丢掉许多不必要的心理负累，才能使我们找到客观可行的文化创新的认识和动力，才能使我们年轻一代认识到中国文化“有东西”，并以良好的心态去继承和创新。

中国文化的理性及其理性观是人生立命的哲学依据和定力，是人学信仰的基石，是最根本性的“中国特色”，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引以为荣的中国文化终极依据，是年轻一代不重复“边缘人”的重要保障之一。

中国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即担心有人以中华文化装神扮鬼，破坏社会的安定。我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我曾历经几十年的民间考察，见过大量的民间“易学大师”、“风水大师”、“算命预测大师”、“气功大师”，以及“各路神仙”等等，从未见过可以进行历史文化或学术思考的人。比如说，阴宅风水如果真实的话，那应该是作用于死人的“灵魂”，即“阴宅风水师”首先应当是一个“阴魂师”。那么请问当今有哪个“阴宅风水师”能说明“阴魂”的存在？几千年中国文化，有哪一本是“阴魂”经典？“阴宅风水师”使用的适用于阳间的“后天八卦”罗盘，为什么也适用于“阴间”？

如果“先天八卦”适用于“阴间”的话，为什么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先天八卦”罗盘？本作者几十年来见过许多海内外大小名气的“阴宅风水师”，从未有人可以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伟人毛泽东说得好，文化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是要占领的。要相信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是正气的，而装神扮鬼在历史文化上是不能对号入座的，更何况如果人民大众能从中国文化人学信仰的角度去认识《易经》，那些装神扮鬼不说人话的人是翻不了大浪的。再说经过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历史文明背景，这是不以人为意志转移而转移。我们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去珍惜作为人学信仰经典《易经》的思想价值，以及其不可替代的“时间价值”。

中国文化从“天人合一”谈起，
实际上是从《易经》的理性观谈起，
从《易经》的智慧观谈起，从《易经》
体现的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谈起。

三 中国文化从这里谈起

许多学者都会说中国文化从“天人合一”谈起。这话说对了。因为天人合一或人天观思想出自《易经》，而《易经》是古代中国的第一本成书——中国文化从古代中国的第一本成书谈起当然顺理成章。但不少人对“天人合一”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人崇拜天，把天神化了，因而把《易经》归于下九流，羞于谈及；或者一知半解地拿《易经》装点自己，以示高深，这都是不可取的。

《易经》里的“天人合一”是把人和

宇宙物化了，认为人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认识论来说，人必须效仿或遵循自然规律。实际上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思考了这个问题：即凭什么去思想，凭什么这样思想；凭什么而说，凭什么这样说。这就是人的思想认识的终极依据的问题，只不过是宗教民族信仰和中华人学信仰各有不同的答案罢了。

孔子在《易经·易大传》中对乾卦的注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是动态的，天动的特点是“健”——“健”就是自强不息，这也是人所追崇的最高的品德。

《易经》中“乾”象征“天”。孔子注解的言论，体现了一种这样的思想：你说了没用，我说也没用，谁说都没用，看看天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天的性质是什么。这里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这个“天”指的是客观性，指的是人的主观依据，有思想源泉、思想依据和思想理性的意义。即“天人合一”有“天人同理”的意思，而与“崇拜天”根本就是两码事！

《论语》里记载了孔子这样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说了什么呢？但春夏秋冬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这里更是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理性观。

或者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去表达：中国人没有看“上帝”或神怎么说；而是看看“天”（自然宇宙）是怎样的。

《易经》的“天人合一”的“天”应理解为客观宇宙。在这里，《易经》没有把“天”神化；恰恰相反，而是把“天”物化了。《易经》把人置于天地间去考察，把“天地”宇宙规律看作是人必须效仿的道理，即“天人同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经》在“八卦”中把人置于“君位”，突出了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三千年前的《道德经》就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正是“天人合一”和“天人同理”的最好注解，也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观的最明了的说明。从这里再一次地看到《易经》并没有神化什么东西！

对“天人合一”、“天人同理”的含义可以作这样的通俗的思考和理解：

我们说人是非常聪明的，但人的聪明哪里来？我们通常会认为人的大脑很发达，人会进行抽象思维，人会运用逻辑推理。但这个答案有“人为”的性质。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就曾对另一个中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这样说：西方人搞出很多数学公理，确认了很多的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公理和概念事实上都是人为的，不是客观世界的，是为了逻辑推理人为造出来的；我们搞数学，应当研究客观世界的“数学”，应当多从数学的“天然”性着手。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根据这一思想去研究中国古代数学，进而开创了国际数学界的全新的研究方向——数学机械化。这是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原创的领域，被国际上称为“吴方法”。吴文俊先生说，中国古代数学跟西方欧几里德的传统公理化的数学道路不一样，没有公理和公理系统，根本不考虑定理，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数学有独特的机械化思想，它能够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再编成程序，输入计算机。吴文俊先生还说中国古代数学“非常简洁”，而且能够解决大问题，他曾经用“两行”字就清楚明了地证明了世界著名数学家惠特尼的数学定理，而惠特尼自己却要非常复杂、艰难地证明自己的数学定理。从这个事例可以联想到中国数学家传承了“天人合一”、“天人同理”的思想基因。

所谓“天人合一”和“天人同理”是说我们的古人认为，人是客观宇宙地球的产物，说人聪明，那么客观宇宙地球更“聪明”；没有地球就没有人，地球不“聪明”，人的聪明又哪里来？所以我

们的古人对聪明的凭据不是去认识人的大脑，而是从人的生存本质——从宇宙时空的物质性或物质运动去寻找人的聪明和智慧。这就是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真实含义，这就是《道德经》的“道法自然”的方法论的真实含义，这就是古代中国为什么把“天文地理”看得这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同理”的理性观、认识观和智慧观的真实含义！

对《易经》的认识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有错！

《易经》的经卦，例如乾卦“☰”或坤卦“☷”都有三条爻。这三个爻位又称“天、地、人”三才。上天，下地，中间一爻为“君”——人。在这里“天、地、人”好像顺理成章地列在一起，很容易被人忽视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当作万物的代表，这有什么客观依据？难道人在天地间，就因此把人当作万物的代表？这不是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吗？

我遇过一个有名气的“易学大师”，喜欢大侃《易经》。我问他：“你认为古人在《易经》里反映了宇宙客观规律了吗？”他说：“是的。”我说：“《易经》经卦三条爻是‘天、地、人’。请问当初地球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易理？有的话，那么易卦是不是只有两条爻？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楚，怎么能说明《易经》不是错误的呢？”……

我们应当这样认识《易经》八卦三爻“天、地、人”的含义。三爻经卦的“天、地、人”的“人”并非仅指自然人。在《易经》后天八卦里，在坤卦位和艮卦位画一直线，这条线就是阴阳界限，艮卦位为“天根”，坤卦位为“地窟”。



下
北



坤、艮两卦属土，古代中医喻为脾胃，脾胃又主忧思，中医对脾胃有“后天”之说。由于天地间对万物最具“忧思”和“评判”能力的就是人，所以就有了“天、地、人”之说。《易经》里的天又为阳，地为阴，“人”指的是阴、阳稳定状态的界定标准或客观界限——这从认识论来说，是事物的“一分为三”论；或者说事物的“合三而一”论，即事物含有阴、阳的两方面以及阴阳稳定状态的界定标准。用今天的话说，事物不仅包括矛盾对立的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而且还包括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客观界限。这才是经卦三爻位“天、地、人”的原意！

或者可以用这样一个通俗事例去说明。

一男一女为一阴一阳，为两个要素，但这并不能成“卦”，并不能构成足够的“夫妻”条件，即阴阳的稳定状态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一男一女间可以毫无关系。要成其为“夫妻”，就必须具有男女间关系稳定状态的界定标准，这里姑且确定为“爱情”。也就是说，“夫妻”是“卦”，是男女两性关系的“阴阳稳定状态”，它由一男一女及爱情等三个要素组成。这里的男为“天”、女为“地”爱情为“人”。

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把《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返璞归真”，似乎为文化的“休闲”找到了依据，从经卦三爻位“天、地、人”的原义来看，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前者是一个纯理性思考的命题；后者是一个感情的倾向，是一个主观倾向的命题。

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从“天人合一”谈起，实际上是从《易经》的理性观谈起，从《易经》的智慧观谈起，从《易经》的人的宇宙地位及宇宙价值谈起！至此我们还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不懂得《易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无从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起点的独特性，注定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智慧和智慧观，独特的知识观和实践观，也因此注定了中医独特的思想和智慧。

西方文化的智慧观、实践观和目的观执著于“手段”、“方法”、“道理”、“知识”、“目的”。以《易经》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化却截然不同。按照《易经》古老的蓍草起卦法，卦从“意外”来，而且任何一卦都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一卦。也就是说，事物的发生和事物发展的结果，什么可能都有，人不可执著于预设的手段、方法和主观意图，而只能根据“爻”变即“卦”变的整体思想，去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性质变化或趋势。即要注重于事物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细节的“吉”、“凶”，注重于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一微妙细节对事物性质影响的判断和把握。“手段”、“方法”、“知识”、“道理”等，为“非常”，为“无数”，为“小”，在实践过程中不可执著，不可预设，但把握事物发展的关键之处正是在于实践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对事物性质影响的可变性。这就是《易经》中“爻”变就是“卦”变的思想意义，这就是《道德经》中“常无欲可名为小”的真正含义。西方文化的“目的观”是要达到预设的主观意图，是“万物归焉而我为主”；恰恰相反，中国文化的“目的观”是“万物归焉而不知主”（《道德经》语），是趋“吉”避“凶”顺势而行，顺“生道”而演绎，避“杀道”而进退，即把注意力放在事物发展的过程如何符合“天理”的“生道”的性质上，而不是具体的主观意图。这就是《周易》里几乎每一卦都有凶险，几乎每一卦都前途光明的含义。这就是《道德经》里“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的真实含义。这也是太极拳“以小胜大，以彼为主”的含义。这也是李小龙中国功夫“立法无法”的技击思想。这也是中医临床“正、邪”观的哲学依据和“治证不治病”的

思想依据。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西医为什么执著于真实病菌，而中医为什么重视“毒”的性质。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阅读古代第一本气功专著《参同契》。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中国文化是把“量变”置于“质变”关系来严格对待的，在这方面是胜于西方文化的；而说中国文化不注重量化是何其的肤浅和幼稚。

西方文化的智慧观、实践观和目的观，注定了它注重于对知识的形式学习，所以西方文化是“学”出来的；同时也注定了它在实践中对知识的预设和机械地套用，西医的临床就很说明了这点。中国文化的智慧观、实践观和目的观，注定它在实践中注重于对细节的性质的思辨力、判断力和把握力；而不注重形式或结论的掌握，在实践中更不注重知识的预设和套用，这在中医临床中“辨证论治”就很能说明这点。所以中国文化更注重人的客观性的素质（中国武术、兵法、中医等都体现了这点），中国文化更应该是“修”出来的。

明白了中国文化的智慧观、实践观和目的观，就算真正懂得了《道德经》中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真实含义了。

.....
(我)就不信中医实践证明真实有用的《易经》不能为今人所学，不能为今人所用！就不信不能把《易经》从学者的“古董架”上拿下来，成为大众思维科学和思维健康的话题！
.....

四 “玩”易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易经》深奥难懂，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有意无意地把《易经》说得神乎其神。我却认为《易经》并不难懂，而且每个人都可“玩”，而且还可“玩”得有趣，“玩”得有用。比如说，什么是卦？可以认为“卦”就是事物的“类”，不同的卦就是不同类的事物，不同类的事物“聚”在不同的方位或地方。比如说，你的拖鞋只会放在地下或鞋柜里，你不会把它放在饭桌上；你的贵重物品会放在秘密的地方，而不会随处乱放；你的床上用品会

放在房间的柜子里或干净而又干燥的地方，你绝不会放在厨房里或潮湿肮脏的地方……不同类的物放在相应类的地方，这就是“卦”。

对于《易经》的研究自古以来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不重视卦及其象数的“义理派”，一个是不重视义理而只重视象数的“象数派”。当今的实际情况似乎略有不同：主流学者重视训古，对卦和卦的象数几乎不涉及，甚至对易理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主要在民间，却用卦的象数应用于所谓占卜算命上，而对《易经》的思想本质的认识却根本不具备驾驭理论的能力。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妥。那些着眼于人性弱点的事不值一谈。研易而不谈卦及其象数，就会脱离《易经》的思想意义，又何来易理。当年孔子注易，其义理几乎都来自对卦爻的玩味。

事实上，《易经》最重要的特点和思想价值就在于卦和卦的象数上。《易经》的八卦都是“象”（有学者说，汉字的造字方法起源于这里），“象”注重于事物的外表，不同的“象”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序数。类于同一卦象的事物有其内在的共性。如下图：

八卦类象例图

乾	坤	震	艮	离	坎	兑	巽
							
天	地	雷	山	火	水	泽	风
健	顺	动	止	丽	陷	悦	入
金	土	木	土	火	水	金	木
父	母	长男	少男	中女	中男	少女	长女
首	腹	足	手	目	耳	口	股
马	牛	龙	狗	雉	豕	羊	鸡

(图三)

斯大林在《语言是思维的唯一材料》里说，只有语言才能作为思维的材料。这一说法已被许多学者否定。事实上画画、音乐、舞蹈等等的创作思维，其材料都不是语言。《易经》思想认为，每一客观事物，其内涵都是不足以用语言表达所能穷尽的。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事例。

我们每天吃的米饭是什么味道？假如用语言表达能清楚地区别于其他食物的味道，你怎么表述。假如你有烧、烫伤的经历，而要向没有这一经历的人说明那特定的痛楚，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能使人代替感受。正如毛泽东的名言，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如果能使没有吃过梨子的人从语言中得到梨子的滋味，那这句名言也就成了废话。

《易经》的思维方式于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兑卦(☱)，为少女，又可为高兴；坎卦(☵)为中男，又为忧愁。“少女”和“高兴”，“中男”和“忧愁”，本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在易经里却可“跨界”相关；同时，“高兴”和“忧愁”本为抽象之事，但在《易经》里却能把无形状的心理意识变为“有形”，如“高兴”可成为有形的“☱”，无形的“忧愁”成为有形的“☵”。更加神奇的是，将抽象无形的东西变为有形之后还可进行“有形的推算”和直观的分析。下面举个例子。

一个人刚才高兴，现在忧愁，可用卦象模拟“推算”其过程并分析其内部关系。例如

刚才高兴用“☱”（兑卦）表示，作下卦；现在忧愁用“☵”（坎卦）表示，作上卦。复卦为上坎下兑的“节”卦：“䷻”。从卦中可以看到，下卦的高兴“☱”与上卦忧愁“☵”互出一个“☳”震卦（为变动、为突然），即是说刚才所以高兴，

是因为事物的突然变化显得对自己有利；现在忧愁的“䷜”坎卦，与下卦的上爻“互”出一个“䷳”艮卦（为停止、为不动），即是说，事物有利的进展或变化又突然停止，高兴的依据又突然消失。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例子倒过来看看，即由“刚才高兴，现在忧愁”改为“刚才忧愁，现在高兴”。

刚才的复卦倒过来：为“䷮”（困卦）。下卦“䷜”的上两爻与上卦“䷳”的下爻“互”出“䷲”（离卦），为火，即是说，刚才忧愁是因为遇上了与水（䷜）、火（䷲）不兼容的性质相反的阻力；再看上卦“䷳”的下两爻与“䷜”的上爻“互”出一个“䷶”巽卦，“巽”为“进退”，为“不果”，即是说，事物的发展“进退”得当，性质相反的阻力终为“不果”，没有造成损害，而转忧为喜。

常言道：“只可意会，不可言明。”《易经》的方法论正善于解决这样的客观问题。正如以上举例，《易经》可用“卦”的形象表示出见不到摸不着的心理意识的构成及其各种要素，并可进行直观的分析 and 推算。

正是因为《易经》具有这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的优点，所以两千多年前的中医，无需现代逻辑学，无需现代系统实验方法，而以《易经》思想及思维方式推算出中医经络，建立了至今西医学不可替代，至今欧洲文明不可理喻的中医学。

《易经》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数学”。例如，古代中医第一本经典《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有：“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葵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葵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泻，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坠，天葵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这部约两千年前的中医第一部经典，用“易数”说明人的生命的兴衰过程。不懂《易经》的人，对这个“七”和“八”是怎么来的是搞不懂的。

用现代数学去看待这个“七”和“八”是会觉得荒唐的；但《黄帝内经》在两千多年来指导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证实了《易经》“数学”的真实性。

现代数学是极限数学，当数达到无穷大时就无法面对，即处理不了哲学所说的量变引起质变的情况。相比之下，《易经》的“数学”却能“坦然”面对，可以说是具有“大将风度”的无穷大数学。举一例子。

小小的一粒沙子儿，用兑卦“☱”表示。数量由小到大——到无穷大：一粒沙、一堆沙、沙滩、沙漠。当我们看到沙漠时，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关心的却不是沙了——而首先让人惊叹的是沙漠上的天空和气候竟然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时，极限数学不仅无法面对，而且是出人意料；但对持无穷数学观的《易经》来说则正大有作为：沙漠的环境非常“单纯”，上天下沙，用“☶”（履卦）表示，其“互”卦为风火《家人》卦“☴”，卦中上有“天”、“风”，下有“金”、“火”，客观情况正是这样。沙漠的“天”常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地”常是酷热难当，或风沙席卷。

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易经》认识论、方法论的独特和优势；聪明人也同时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医不以西方解剖学为基础反而能

擅长内科。真让人拍案叫绝！

最早的古代《易经》固然是一本占卜的书，但正如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所说：“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说得明白些，就是我们不应宣传迷信，只应宣传真理……”客观上最起码一点要看到，以《易经》思想为指导的中医，至今还在以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方式为人类救死扶伤服务。不管你懂不懂，事实证明它是有用的——正因为这样，聪明人更应当想一想：不懂的东西而又有用，这正是我们当今需要从哲学上花大力气去认识的理由！

研习《易经》，自古至今都有离开卦象谈《易经》的“义理派”；再就是不重思想内涵而执著“卦象”的“象数派”。实际上从《易经》包含的认识论、方法论来看，再从《易经》的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看，偏于任何一派都是违反《易经》原意的。试想，不知卦中具有由“外”及“内”的契机及结合点这一思想方法，何来“义理”，更别说你要“义理”干什么；或者不从卦中去体会《易经》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你又如何真正懂“卦”。当然，那些意不在求真，而哗众取宠之举不在此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搞学问的人把《易经》放在“古董”架上，作为高雅和博学的标志，而实际上也只能说说“天人合一”、“君行健”之类以示高深，对《易经》的真实意义却不甚了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惯性”在起作用，不少学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善于“宏观”自居，滥用“定性”，一句“朴素唯物思想”而不屑于谈《易经》和中医。再就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还有一个古怪“脾气”，认为古代学问只有古之圣人的言论值得尊重，当今之人不足为凭。在今天看来，这些文化心态都与时代不相符，不利于我们继承传统和开创未来。

我就不信这个邪！就不信中医实践证明真实有用的《易经》不能为今人所学，不能为今人所用！就不信不能把《易经》从学者的“古董”架上拿下来，成为大众思维科学和思维健康的话题！

原创性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又所以说学有捷径。

五 生命八卦是学易的捷径

学习《易经》当然有捷径。

说有捷径，实际上是没有捷径，或者说更为吃苦方为捷径——这里指的是追求原创性的感受或知识。原创性的知识才是真知识，所以说学有捷径。

为什么要学《易经》呢？学者们有许多知识空白不是照样是学者吗——每一个人不可能集所有知识于一身。如果《易经》仅仅是书本知识，又为什么非要学它不可？你喜欢踢足球，我喜欢下象棋，不是照样可以快乐吗？但是，如果《易经》真的概括了很高的自然规律，那

么我们的身体作为“自然产物”就应当有“易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非学《易经》不可了！而且，也就没有必要把《易经》奉为至上当作神来拜了。也因此，学习《易经》必须具有“观天察地”的气概去追求原创性的知识；必须具有《易经》说的“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的姿态——不是“我去学”而是“在我身上找”。这，也就是学习《易经》的捷径！

学习《易经》不必墨守孔子的儒家解说，只要领会了《易经》的思想和方法，大可联系可靠的客观实际而“参悟”和应用。实际上历史上就有大量的这样的范例。如《黄帝内经·九宫八风》，就直接应用后天八卦图，以说明一年四季“邪风”伤人的不同情况；又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以“兑”卦易数“七”计算女子“天癸”，以“艮”卦易数“八”计算男子“天癸”；明代医家孙一奎和赵养癸，观坎“☵”卦之象，创命门之学；而这些范例就与孔子儒家的注解毫无相关。历史上许多的成功范例足以证实和鼓励我们大可追求我们对《易经》的原创性感受和《易经》的真谛。

下面不妨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原创性的“易经”。

《易经》是以卦象符号来反映世界万物的。每一卦象符号由三个基本单位“爻”来组成。基本单位有阳爻（—）和阴爻（--）两种，阳爻（—）和阴爻（--）代表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相反性质。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在古代历史上都曾经经历过性崇拜的阶段。《易经》的阴爻（--）阳爻（—）似乎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易经》有八个卦象符号，其中有四个阳卦和四个阴卦，可分别表示老男、长男、中男、少男和老女、长女、中女、少女等。下面就以这八个卦象符号来反映男女两性的性兴衰变化过程。

阳卦：

艮卦䷳，少男。指男青年。表示刚强奋进性质的阳爻（—）在最表面，意思是说男青年的生殖器兴奋之时表面坚硬，所以整体是坚硬的。

坎卦䷜，中男，指中年男子。卦象两边阴爻夹着中间一个阳爻，表示生殖器兴奋之时表面不坚硬，仅中间硬，而整体趋于半软半硬。

震卦䷲，长男，指今人所说的更年期后男子。卦象阳爻在“根位”，表示生殖器兴奋时坚硬部分占少部分，性能力低下。

乾卦䷀，老男，指无性能力的男性老年。卦中只有阳爻而无阴爻，表示阴阳不相吸、互不为用；即生殖器无变化、无兴奋，完全没有性能力。

阴卦：

兑卦䷹，少女，指女性青年。阴爻在上，表示女生殖器的表面具有充分的性敏感。

离卦䷄，中年女性。阴爻居中，表示中年女性生殖器表面性敏感已不充分，而在“中途”。

巽卦䷸，长女，指更年期女性。阴爻居底位，表示生殖器的性敏感很少或在“后期”。

坤卦䷁，老女，指无性欲望的老年女性。卦中有阴爻而无阳爻，表示阴阳不相吸、互不为用，即完全不具有性欲。

请别见笑。我并非趣味低级至偏好以人的生殖器性能力去解释《易经》八卦，而是这里有一个符合《易经》精神的认识论立足点问题，即思想理性依据的问题。试想，既然古人认为人是天地间的“万物之灵”，那么人的生命就应当具有“易经”——既然如此，在自己的生命里找“易经”不是最可靠的吗？！这也是古代道家所



说的“谈道不离身，离身不为道”的含义。当今不是提倡原创性人才、原创性知识吗？——追求《易经》的原创性知识，最好的方法不是以自己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工具吗？更何况在当今人们淡忘《易经》的情况下，《易经》思想最擅长的不是指导着举世公认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吗？所以对《易经》的学习和研究，不应放下自我生命这个最佳“工具”而去空谈什么《易经》的本质，或寻找什么“天机”！更何况，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感受都不能确定的话，那么身外的一切还有什么可靠的呢？！很明显，这些问题的思考已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终极依据的问题，即理性的立足点——理性观的问题。这些问题思考的本身就能使我们感受到古人认识世界的立足点，就能感受到中国文化对理性依据要求的根本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也正是《易经》学习方法的首要问题。

对《易经》的学习捷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我们不妨继续乘兴试着用“卦”分析不同肤色人种的“命理”：

白种人

白种人，西方“金”，“木”极而生。“☰”乾卦之象。“金”属肺，肺为魄，魄为力。以“金”为用，所以胸肺发达，鼻（肺窍）高直而壮。身体先天优势在肺、肝。肺为魄，为力；肝属木，为直，为动；其性耿直而迅速，善作大力而短促运动，例如铅球、标枪、短跑、跳高等体育项目可誉享全球。先天劣势在心“火”不足。“金无火不成器”，“金”旺而“火”衰，所以多有心、肺之病；所以保健贵养“心火”。“金肺”旺能制肝木，木为动，又为火之源，所以运动有益而又善于大运动量。“☰”乾卦之象，刚直易折，所以缺少耐力和灵巧，诸如长跑、羽毛球、棋类等是其弱项。

黑种人

黑种人，北方“水”，“火”极而生；“䷁”坎卦之象。“火”极而面部骨突，头顶发“焦”（髻发），鼻形粗扁而孔短大。黑属“水”，属肾，属志，所以先天优势在“水、火”即心肾。“水、火”两极而优，所以善耐力，善变化，善处险，诸如长跑、登山、探险等运动是其强项。其性，可吃苦耐劳，灵活善变；但善两极，且“䷁”坎象晦暗，有易走极端之嫌。

“水、火”心肾两极为优，“水火”皆动而沉稳（“土”性）不足，所以身体贵养脾胃。易患中医所言“水火之乱”或“阴阳不归中”等暴证。沉稳（“土”性）不足，所以诸如棋类、射击、体操等是其弱项。

黄种人

黄种人，中央“土”，“水”极而生；“䷁”坤卦之象。中央“土”主静，主思，主平衡，主全面，脏腑主脾胃。“土”、“水”之象，所以身体以脾、肾为先天之优势。其性，思前顾后而周到，柔顺、善忍耐而灵巧，善作战略或灵巧之想，诸如棋类、羽毛球、乒乓球、艺术体操等是其强项。

“土”、“水”之象，沉稳、柔顺有余，刚直、变动则不足，先天劣势在肝胆。或者肝“木”衰微而“土”、“水”泛滥（脾、胃病或肾病），或者肝胆有余而“木风”为患。也所以中国人多数地区有“吃香喝辣”的传统。身体贵养肝胆。

“木”为动，为怒。“木”不足，所以不善于运动量大或惊险的体育项目（手握横杆，脚踩钢绳，横跨山谷的最佳纪录由鼻子高直的新疆人所创，此非偶然）。

以上卦理分析，不在于笔者水平之高低，而在于说明《易经》确有其绝无仅有的独到的智慧；在于说明现代人去认识和学习绝非

丢脸之事！同时也不难看出，掌握了《易经》，中医也就容易理解了，而且也就得到真传了，这也是古人“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的意思。

我曾遇过这样的提问：“你把《易经》和中医说得这样好，那为什么不如中华文明先进的古代欧洲文明，无需弄懂和重复《易经》及中医而照样后来居上，使近二百年来欧洲社会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这恰恰说明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照样无需完全步欧洲后尘，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不也是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理性所在吗！”

所以撰写《易大传》，为注解和宣扬《易经》作出重大贡献的孔子，从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并且掷地有声地作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学宣言！

六 勇敢、宗教、死亡教育

如果我说：“中国人是最勇敢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在说空话。其实不然。我要说的是，中国文化是人学信仰的文化，中国文化没有造物主，所以中国人的勇敢是最有理性依据的。即使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和世界所有宗教不一样，是没有“造物主”的，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一部《易经》的分量。

《易经》把“天”物化了，认为“天人合一”、“天人同理”，把人和“天”看成为同一整体的物。认为客观世界由“天、地、人”三者组成，除了“天、地、

人”之外没有更高级的东西了。所以撰写《易大传》，为注解和宣扬《易经》作出重大贡献的孔子，从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掷地有声地作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学宣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畏生死的风范和做人的定力！

我们在民间偶尔能看到一些人家的门头挂个八卦，意在“驱邪”。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一种不可取的落后愚昧观念。但从文化溯源来看，八卦无非是“天、地、风、火、雷、泽、山、水”，无非是客观大自然，并没有“鬼神”之类的内容；如果把这一历史现象理解为“在客观自然以外无更高的东西和需要认识的东西”，这会更加符合《易经》的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卦能“驱邪”，能给人以不畏“鬼神”的胆量和定力，这是对的。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易经》八卦的背景寓意，实际上确实在界定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也就是说，《易经》八卦思想实际上在说：人在天地间，“天地人”以外再也没有值得人畏惧的东西，所以人类尽可信守“天人合一”和“天人同理”的宇宙观而珍惜人生。

前面已经说了《易经》的认识论价值、方法论价值、思维科学价值和八卦象数的中医直接应用价值；不仅如此，实际上《易经》还以物化了的宇宙观给人以做人的定力。这，就是“中国人最勇敢”的理性依据！

十分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后二十年的“气功热”和“易经热”，一些“气功迷”和“易经迷”却为“怪、力、乱、神”所迷惑。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说，不是文化和科学的追求问题，而是懦弱不敢面对生死的问题，是没有做人定力的问题。那些所谓的“大师”其实是玩弄人性弱点的高手。他们一个比一个“牛”，摆出一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架势，但就是不愿回到人学上来，不愿回到

理性上来。

有人说，现代文明可以给人以物质的满足，但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宗教的作用则与此相反。尚且不论这个说法对不对，我有兴趣的是，宗教又是怎样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的。根据我大量的考察，发现更多的宗教信徒并非对神灵保佑的作用最感兴趣，他们最关注的是诸如“天堂”、“地狱”、“来世”、“极乐世界”、“轮回”等等的内容，即是死后归宿的问题。这，实际上不就是“死亡教育”吗？

我们今天这教育，那教育，甚至要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但是，从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以至在职教育、新闻媒体教育等等，从来没有听说“死亡教育”的，然而“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个话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人不是怕死，而是很怕人死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很愿意相信人死后还有“东西”存在，希望“灵魂不死”，至于有什么理性依据这不重要。在这些人心里，活着是为了死后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或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来世”。

《易经》的人天观思想包含了人生立命的“天意”观，即人生是“天意”，就应当遵循“天意”而注重人生。因此得出的逻辑是：“前世”和“来世”都不是人生的“天意”，因而也就不是人生的真实命题。

我认为，上世纪末气功热和易经热的“出偏”，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涉及生死观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反时代的人性弱点的产物。在“出偏”的群体那里，用现代科学语言编织着“不死”的妄想，或者“白日见鬼”，大活人心怀死后安排的心态，妄想在“另一个世界”延续尘世的自私。

与时代不谐调的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反思。

“死亡教育”当然不好听，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主义。记得陈毅元帅临终最后一句话还说：“向前，向前，一直消灭敌人。”鲁迅先生病得只有 30 公斤体重，临终最后一句话是：“难道我的病真的如此严重吗？”疾病和死亡的来临并没有折磨他们的精神。这种英雄主义的风范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大可教育后人。健康的生死观来自理性的思维，理性的思维必须以客观规律为认识依据。新时代需要更为理性的英雄主义教育。

享有“中国群经之首”美誉的《易经》是非宗教文明的人学信仰的基石，一部《易经》决定了中华民族自强人生的定力。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安享“夕阳美”的老人们，如能结合《易经》对天文科学和自我生命的人文思考感兴趣，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自我完善是有益的。以人学信仰去正确地认识人的宇宙地位和宇宙价值，正确地认识宗教，提高对神灵迷信或邪教的“免疫力”，这应该是当今时代龙的传人的勇敢人生的特质。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把人的存在本质与宇宙时空的物质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七 “四柱八字”的哲学内涵

对一个民族的宗教视而不见，却说对这个民族很了解，这是违反常识的；对千百年来民间影响很大的文化现象或民风民俗视而不见，却说知晓这方人，这也不符合逻辑。神州大地，古往今来，各民族，各地方，曾经有过或至今还保留着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化或民风民俗。其内容大多与生产、吉庆、爱情、“红白”事等有关。我们今天去看待这些事，千万不要从文化到文化，因为在过去物质贫乏的历史时代，人们生存的环境艰难，能够成为传统或风俗的东西，都是

与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比如说，广东有夏、秋两季用竹叶裹粽和用荷叶包“糯米鸡”的风俗传统，而竹叶和荷叶在中药学上都具有清热消暑、防腻除滞之功，正好纠食品之偏。再有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地的客家人地区，都有产妇食用糯米酒加糖炒姜蛋的传统习惯，以防“产后风”和恢复“元气”，这正好符合中医“暖宫固下元”的原则。再有人们熟悉的民间舞狮，那身法、步法都是直接的武术基本功……

总之许多的传统风俗首先是具有直接的功利作用，并且还体现了“这一方人”的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今天看来确认为迷信或缺乏科学依据的民间文化和传统风俗，虽然有它落后或不科学的一面，但它确实闪耀着前人的理性光辉；而且它千百年来，甚至于今天，还在民间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对这类经常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历史文化现象，总不能熟视无睹或简单地否定，不深入了解后进行批判或分析。即使它是不可取的，但它毕竟历史久远，而且至今在民间有影响力，对此如果没有正面的分析和批判，那么你叫青少年怎么去看这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怎么去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全部？怎么去提高对迷信或伪科学的“免疫力”？再说，大多历史文化现象，有多少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时代要求的——难道都不要了吗？除了这片土地以外，我们还应当继承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京剧和大多地方戏曲都有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地方；我们的国画没多少青年人感兴趣……我们不是还在改造和继承吗？

更何况，有的历史文化现象，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或者确实应当否定其应用价值，但其核心内容或理性，却可能有值得我们继承或认识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大海捞针似的，艰难而细心地寻找宝贵的东西——特别是要感受古人的理性及其依据，这对我们反省理性和面向未来是十分有益的。或者说，即使为了教育后一代，也

值得我们认真去分析和批判。

我这里要特别谈谈“四柱八字”。

“八字”，又叫“四柱”。据说产生于宋代，是古代的一种“算命”方法。“八字”实际上是人出生之时的农历年、月、日、时的“甲子”排列。例如，公历 2002 年 12 月 1 日零时，列为：壬午、辛亥、癸卯、壬子。年、月、日、时有四，所以又叫“四柱”共有八个字，所以又叫“八字”。“八字”列出后，然后按照“天干”和“地支”的五行生克，以及五行的“刑、冲、害、合、化”等，再结合“流年”的“干支”（如 2002 年的流年“干支”是“壬午”）进行推算，得出某人某时的“吉凶”，以达到“算命”的目的。至今这一“算命”方法在民间还有相当影响；特别在我国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更是普遍和流行。据我了解，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小孩出生，是男孩的，就把小孩的“八字”写在红纸上，然后拿去贴在村里祠堂的墙壁上。农村有的年轻人找对象，还拿着男女双方的“八字”去找懂“八字”的人看“命”合不合。

那么，“八字算命”就真的那么可靠吗？

记得 1993 年国内有位“易学大师”写了一本《四柱预测学》，在国内及东南亚都影响不小。书中列举了作者大量“料事如神”的实例，其中有的“算”出有“凶”时作者还可帮其“化解”；同时还有不少道佛出家人的“八字”批例，以示出家人也心服口服……当然，“算”不准的例子没有。书中把“八字算命”说得滴水不漏。但是，当说到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人为什么命运不同时，书中解释道：因为相貌不同，出生地不同，或者环境不同等等，所以还要结合相貌、出生地、生活环境等，进行“推算”。细心的人会从这里看到百密而一疏。既然要兼顾其他要素，实际上等于这不是最

高规律。

我曾经与一些懂“八字”，在当地民间很有名气的人谈论过“八字”。我向他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无言以对。

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一下杀了30万中国人。这30万中国人中难道就没有人“八字”好的吗？

假如能用“八字”推算出所有人生内容，那为什么不能“推算”人的病情？又为什么易学味很浓的古代没有搞出医学“八字”推算法，而搞出可靠的“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断呢？

那位“易学大师”在“四柱八字”里，也一样取用《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有关人的身体先天优、劣势的论述，以证实“四柱八字”对“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推算的合理性。《黄帝内经》曰：“土形之人……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请问，凡是“八字”里土旺之人肯定都是“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吗？如果与事实相去甚远，又怎么能用“硬指标”的《黄帝内经》来证实“八字”算命呢？这是对中国文化负责任的行为吗？

试问：如果“八字”真注定了人的“命运”，那么“八字”早就注定了是不是找你算命，同时也注定了对他人的生命无所作为，更别说你能为他人“解化凶灾”。那位“易学大师”口口声声说为人消灾，难道你比“天”还更有能耐？

不错，我们承认不少古代“技术”已失传或濒临失传，这有待我们去挖掘和研究，但我们不能钻进“古代技术”堆里出不来；更不能根据某人一些例子去证明规律。试想，如果我们罗列一些不学无术之人飞黄腾达的例子，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不学无术才能走向成功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寻找到个别身患重病而不治而愈的例子，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有病无需医治呢？我们不能以“技术”去代

替理论和规律，不能把理论建立在某些人的仅仅是说法上。

科学昌明的当今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具有理论意识，应当更加注重理性思维以及理性依据。

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并不是具体技术问题；而首先要确立的是时代理性，即以正确的时代观为前提，这才有可能谈得上智慧。某“易学大师”的《四柱预测学》，先别说其理论方法有违常识，首先不可取的就是其时代观。即使我们谈中国古代文化，《易经》思想不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吗？不讲时代观就是不讲“天时”；不讲“天时”，又是哪来的东西！

但是，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再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现象，我们再也不能概念化了；再也不能好像自己学到的理论名词没地方放似的，简单而轻易地作出对人对己都无益的“定性”；或者“定性”之后好像再也无事可做似的。认为过去不如今天进步，所以今天以前的一切都不在话下，这种态度本身不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我们把过去的一切“定性”在“不在话下”，把今天的一切“定性”在“至高无上”，那么我们的后代也这样的话，一代复一代，这先别说对社会发展有无意义，恐怕在书面理论上也不免滑稽。更何况，这种思想态度无益于我们继承传统，无益于我们文化心态的健康，无益于我们远离“边缘人”！

应当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良莠掺杂，鱼目混珠。但我们为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了继承传统，思维健康，哪怕像“大海捞针”似的，也要去坚定地寻觅和挖掘。只为当今，面向世界，理性有价！

对于“四柱八字”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我不想以“公正”的名义，也不说“平心而论”。我个人意见是：其实从古至今在民间一

直影响很大的“四柱八字”，虽然是古代不成熟的“技术”，甚至自古以来使多少人迷惑；但它毕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光辉。

古代“四柱八字”，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天干”，配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配比齐备，总数为六十之数，所以古代又称“六十甲子”。“天干”和“地支”的起源似乎已无从考证，只见到《易经·蛊》和《易经·巽》中载有“甲前三日……甲后三日”和“庚前三日……庚后三日”。可见这种纪数方法历史久远。

“天干”与“地支”配数，为我国古代历法取用，延至当今农历。中医第一本经典《黄帝内经》就有以农历流年的“干支”推算当年的“五运六气”，得出当年普遍发病情况的结论。

古代“四柱八字”，用“干支”把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等四项排列出来，如2002年12月1日零时列为：“壬午、辛亥、癸卯、壬子。”然后试图从“八字”包含的“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力量对比，进行复杂的推算，以达到“算命”的目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大胆的设想。古人在思考，每一特定的时间，宇宙时空是不是处于由“五行之气”构成的特定的存在；这个特定“五行之气”格局的演变发展是不是就是人的“命运”的本身。应当说古人的思考是大胆的、有益的。这个设想和思考，反映了古人试图解答人的存在的本质。至于由“干支”组成的“八字”是不是能够反映宇宙的状态？宇宙的特定状态是不是就是这一时间人的命运状态？宇宙的特定状态的演变是不是能够计算或这样计算——更何况，即使能够这样计算，是不是就等于可以“算命”？这些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即“四柱八字”并没有完全或成功地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但是，我们又要看到，“四柱八字”确实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仅此，就已体现了古人的魄力和非凡的智慧。自古以

来，除中华民族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人的存在的本质与宇宙时空的物质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尽管“四柱八字”是半成品，更不可能滴水不漏，但我们有理由为这“半成品”而自豪！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作出这样的思考。

他认为，如果把物质表述为“能量”，那么“时间”和“空间”也具有“能量”。比如说植物不到一定的时间，它不会发芽，不会长大，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可见“时间”也具有能量，“时间”也应当具有物质性。“空间”必须比被容纳的物质更大才有可能容纳相应大小的物质，可见“空间”也有能量，也具有物质性。可见“时间”和“空间”也应当是物质。但是这样一来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我们知道特定的物质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之中，我们总不能说特定的物质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这一“物质”之中。可见我们不足以表述“时间”、“空间”的物质性，更不要说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作为物质的“时间”和“空间”。

再从自古以来的中国农历历法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真实性和中医“五运六气”的真实性来看，从逻辑上说，“四柱八字”是成立的。或者我们即使否认“四柱八字”的正确性，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古人早就已经认识到“时间”、“空间”具有物质性，而且还可以进行分类和运算，甚至我们的古人已经把宇宙时空的物质性表述为人的生存本质。起码的一点是，可以说我们的古人在“时间”、“空间”的物质性的探讨上比爱因斯坦的思考早了600年以上。

“去伪存真”和“继承传统”不是空话，也不是为了从理论到理论。“八字算命”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已长期影响民间，很有必要有时代理性的声音，总不能让后生觉得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落。

“气功”理所当然属于文化的范畴。然而在 20 世纪后二十年的气功热里，不少“气功师”不提“文化”二字，不愿讲文化，不愿讲历史，甚至不愿讲人学。

八 气功不能创造规律

如果天地间没有水杯能盛水这个“道理”，那么谁也不可能发明水杯。正是天地间有水杯能盛水这个“道理”，而且人类认识到了，所以就会有水杯，接着就有了木杯、瓷杯、瓦杯、铜杯、铝杯、玻璃杯等等各种各样的水杯。人类可以发明水杯，但不能发明水杯能盛水这个“道理”；各种各样的水杯都可打烂，但水杯可以盛水这个“道理”在天地间永远“打不烂”。

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一个常识的问题：人类只能发现规律，而不能发明规律或

创造规律；人类只能不折不扣地遵循规律，而不能违反规律。

上世纪后二十年，一些“出偏”的气功迷“鬼使神差”似地违反了这一常识。

气功，自古以来就留传民间，并在上世纪后二十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所以在此谈这一话题，无非是认为有益于时代理性的思考。

气功有两大类，一是多用于武术的“硬气功”；再一个就是身心休养的“静气功”。自古以来理论性较强的当属“静气功”。

“静气功”即打坐入静的功夫。古代有“吐纳”、“修炼”、“内功”、“龟息”、“炼丹”、“静坐”、“坐禅”等等名称。据我所知，自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贵珍在北戴河疗养院开设气功养生培训班起，“气功”这一名称说法才统一起来。说自古气功在民间，其实主要是在道、佛两家。中国古代第一本气功专著是汉代魏伯阳的《参同契》。这也是道教的经典之一。这本书以《易经》的“阴阳”、“八卦”、古代天文学语汇等去论述和解说气功。特别是自古气功术语中“降龙伏虎”、“坎离相交”、“周天”等等，就出自这本书。道家气功专论，除此之外古代还有《性命圭旨》、《悟真篇》、《导引录》、《导引养生图》等等。今人有北京白云观道长震阳子的《道学真言》。从历史文化上看，似乎道家比佛家更擅长气功。即使中医第一本经典《黄帝内经》，也有气功的影子：“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虽说自古以来气功功法多如牛毛，但大多或者滥竽充数，或者于道家气功中截一枝节而“以一代万”；或者类推而当“创编”。虽说古代气功专论深奥难懂，与气功有关的古代经典又玄乎其玄，但如果从养生或“修身”的角度看，总体上古代气功的思路不外有三：

一是“结丹”论。“丹”的说法出自汉代魏伯阳《参同契》。书中说的“周天”，指某种功态下的自身“阴阳”结合。虽说有大量的“铅、汞”、“炉鼎”、“黄庭”、“河车”、“坎、离”、“龙、虎”等等的离奇语汇，但无非试图用《易经》的思想和方法在人身上演绎天地生万物的“生道”。根据道家有关自身阴阳结合生“圣胎”的说法，不难看出道家气功有这样的思想：即用自身的生殖能力，不用男女结合“生人胎”，而用自身阴阳去“生殖”自己——即自身的生殖能力用于自身的生命的更新。据我所理解，自我修炼境界达到这种“自身生殖”状态或能力就叫做“丹”；而并非另有什么“非白非黑”的“丹”。

二是古代儒家的修身之道。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所说的养“气”，并非直接指狭义“气功”手段或方法，而是指儒家“君子”思想知识精深博大境界所派生的人生观和养生观。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儒家的养生之道并非“活命哲学”；而是“正人君子”的“正气”和朝气。《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以布衣淡饭为耻）者，未足与议也。”《论语·乡党》：“寝不尸”（睡姿不作仰面朝天如僵尸状）；《论语·述而》：“曲肱而枕之（睡姿应当侧身而曲），乐亦在其中矣。”《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康子馈药，拜而受之，丘未达（孔子在对这药性不熟悉之前），不敢尝”。当今名老中医干祖望对孔子这些言论的评价是：“证明孔子是懂医识药的，特别在养生摄生方面有

精辟的见解。”可见儒家的“养气”，主要指“君子”的人生观加上丰富而谨慎的生活规矩。

三是追求“本我”和“非本我”的合一。道家有“返璞归真”的说法；佛家有“明心见性”的说法。道家说的“真”，是一个特定内涵的概念，指的是“性”与“命”高度合一的境界。佛家说的“明心见性”，其实意思也大致相同。这类修炼注重“心法”。我认为，大致可以这样去认识：即古人发现正常情况下，“我”可以随意支配“我”的肢体怎样运动，但为什么某种病态的情况下却不能支配“我”的肢体随意运动；或者我为什么会有“恐高症”之类的“自我”恐惧，“我”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完全能够支配自己的躯体，并把所有自我恐惧之类的下意识都剔除。从这一类的“人之常情”里，可见有一个难以言状的矛盾，这就是存在一个“本我”和“非本我”。这个问题或矛盾，使那些较有思想的人困惑，以致认为这个问题或矛盾的解决，必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可见古人的这种修炼的目的并非都是为了健康长寿。

当然，古代确实有人，特别是有的信奉道教人士，妄想寻找一条“不死之路”，其中有的寻求“外丹”，不惜以身相试，服食“外丹”而丧命。例如，据宋朝陶谷《清异录》所载，众所周知的唐代大文豪韩愈，就是晚年服食以硫磺制成的“火灵鸡”而亡的。对于古代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大度地将其视为人类对生命的一种曾有过的探索（宋代窦材，善用“外丹”主药硫磺、雄黄等而成一代名医）；但是如果今天还有人重复古代这一“失败行为”，那就十分可笑了。

从总体上看，古代修炼气功的人大多是高知识的人，追求完美人生的人，而且这方面的理论决非文化低的人所能认识。

总之，从历史上看，气功是古代文化人的事，是我中国古代文

化的遗产；即“气功”理所当然属于文化的范畴。然而，在上世纪后二十年的“气功热”里，不少“气功师”不提文化二字，不愿讲文化，不愿讲历史，甚至不愿讲人学；其中有的人的目的在于“造神”，而这个“神”当然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才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的“神”。在他们那里，客观规律就像面团，要方就方，要扁就扁。这种所谓的“气功”，当然不是文化和学问的命题了，甚至也不是人学和人话了。

可悲的是，那些不慎“出偏”的气功迷，也不想一想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也不想一想人是不是能够创造规律。他们当中有的是市井的“阿婶”、“阿婆”，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却也在满口“宇宙”、“星球”、“灵魂”……有的甚至是有名堂的“文化人”，却也“鬼使神差”——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缺乏理性！

根据对中国社会气功情况的二十多年的考察，我发现还有一个不解之谜在困惑着许多的练功人。

不少长期患有慢性病的人是本着治病的目的去练气功的。不少人通过半年或一年的打坐练功确实有人把病练好了，这能不令人鼓舞吗？但继续练下去发现情况变化了，身体也随之出现另外一种不健康的问题。

练气功的人性情上的变化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开始练一段时间，觉得人静气清，甚至是心旷神怡；再继续练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性情上的变化：特别容易为一些小事而激动，特别容易付出同情心，特别容易激动得热泪盈眶，慢慢变为性格孤僻，喜欢独处，远离社会，自大自圣，甚至有的出现幻觉，而且还喜欢沉醉在幻觉之中；身体上出现肢体无力，心慌胸闷，忌食油腻，头额发白，眼睛发蓝，似睡非睡，食欲不振等等现象。以上现象普遍出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于性情方面的异常情况，其气功“师傅”大多解

释为好事，说是已与某神接近了；对于身体上出现的异常情况，其“师傅”大多从功理或功法上解释或指导。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认为练气功无非是锻炼身体，但是当性情出现非理性的极大变化之后，又听说是与某神接近了，自己又不可作出其他解释，他能不依据自己的感受而动摇自己原来的思想信念吗？

——那些通过练气功而治好长期慢性病的人，即使后来身体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异常状况他也很自然地根据自己曾获得的好处而相信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

事实上这些性情上和身体上出现的异常情况都不是好事，也不是能够在功法上解决的。

任何正宗而又正确的打坐静功都是有可能出现上述不良情况的。其原因不是功法问题，更不是功法上能解决的。从人的因素看问题，打坐静功不是能在普罗大众中普及的，而只能从相关的历史文化中去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而能够做这种事情的人是极少的。

还有一个现象令人费解，也令人担忧。

在上个世纪末，我所见到的“气功师”，大多更像传教士一样，把气功宗教化。这也罢了，更严重的是不少气功迷竟吃这一套。不少气功爱好者自大自圣，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中国气功的健康发展，所以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必要作彻底的剖析或思考。

很多气功师标新立异，但又漏洞百出。比如说，在古老的太极图的中间加上一个点，或者在太极图的圈外加个自撰的“花边”，因而解说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论”；比如说，有的自称超越佛、道，但其语言和内容都离不开佛、道，只不过七拼八凑罢了。

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首先问气功是不是人学？是不是人做的事？如果是的话，那就说人话，那就是文化，那就有历史可考，尽可以“对号入座”。历史文化没有你的“座位”，说你有创新，有发现，那就拿出来比较一下前人或古人，千万不要使用了古人的东西而又说自己是前无古人。说你是宗教，而不是人学，那你就跑到宗教那里去，不要用着宗教的东西而又说宗教不如你，这就叫捣乱了。

事实上，人学经典、宗教神学，甚至邪门歪道，在历史上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可能创造规律！

智慧篇

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的“法自然”是思想方法，那么就等于承认中医不是“古代经验”那么简单！对中医的排斥实际上是对一种哲学和智慧的排斥。

一 中国文化理性依据的最后 一个阵地

中国文化当然有很多的形式，如琴、棋、书、画、戏曲、武术、历法等等。但在当今世界科学昌明的时代，这些形式都不能很有力地反映和证实中国文化理性。

中国文化的理性是《易经》的“天人合一”和“天人同理”的思想。当今最能反映和证实《易经》这一思想的是中医。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吕炳奎曾说：“中国中医药学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瑰宝，她具有天、地、人为

一体的系统的整体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虽然说到目前为止，西方欧美对中医还认识不足，但中医的实践已在世界上获得认同，并且，包括欧美众多国家在内，每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不少人来中国学习中医针灸或中医学。中医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并且是治病救人的“硬工夫”；因此，说“当今中医是中国文化理性依据的最后一个阵地”一点也不过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界实际上还担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光荣使命！

虽然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但是，中医的命运却岌岌可危。

从2006年至2007年初我国对中医存亡的社会辩论来看，一些情况耐人寻味。我注意到反中医的一方不愿拿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原则来讨论问题。这是有道理的。要说事实证据，中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其临床价值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的；而西医的历史虽说远远不及，但在外科方面，在天花、肺结核、麻疹等等的预防上是有历史性贡献的。要说临床缺陷，当今中医疗效不尽人意，这是实际情况；那么西医以物待人，缺乏以人为本的观念和治疗的副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称其具有现代技术优势的诊断也令人不敢恭维。

据2006年9月9日《广州日报》一篇题为《先进仪器“误诊”患者》的报道，我国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为40%。可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来反中医，是底气不足的，是不足以反对中医的。从反对中医的人士口口声声不离“科学”二字来看，他们的思想原则明显是“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稍有哲学意识的人都会看出这已不是两种医学的比较和争论了，而是应当对两种不同的哲学和思想方法进

行确认和讨论了。

有一种说法在哲学认识上也站不住脚。有的反中医人士说，中医应当退出医疗体系，但中医可以在人们的饮食保健上发挥作用。这就怪了。一种哲学思想应用在饮食保健上可以是真实的、正确的，而应用在医学上就不真实、不正确。这本身也在说明一些自然科学家在哲学知识上的无知。我就曾对一个西医人士这样说过：“你不觉得这样很滑稽吗？上班的时候你使用西医，不信中医；下班回家吃饭时你吃的菜都在讲究哪个菜‘热’、哪个菜‘湿’、哪个菜‘燥’……”

正如于光远说的，“科学”和“技术”不能混为一谈。当科学某一研究达到普遍应用时，它就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了。“技术”是“技巧”，是具体的使用和操作，“技术”是科学的产物，但它不等同“科学”本身。“科学”是一种思想态度，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更是哲学思想上的事。据此，可以说以“技术”代替“科学”，这实际上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这是不科学的，也正是梁启超曾经批评过的，不懂“科学的性质”。从反中医人士的言论看，他们把西医技术等同于科学，这就把西医技术神圣化，这种做法是缺乏理性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不否认中医针灸和中医药的一些疗效，而且也承认西医现在解释不了，但是必须归到西医的范围，等待未来西医可以解释。面对这种无视哲学思想的态度，那就真没有讨论或争论的价值了。

当今时代的中医确实悲哀。即要以现代科学去证实自己，以另一种哲学来检验或证实自己的哲学。什么时候能看到中医不受“科学”的干扰，能回归到“法自然”的哲学轨道上去发展自己呢？

2006年至2007年初，中国反中医热争论得热闹非凡，结果反

中医的一方稍得胜势。但我对自然科学精英得势不以为然，我更关注的是哲学界怎么说。我在等待着严肃的哲学家们是不是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汉民族没有人学信仰”，“古代中国没有哲学”，“古代中国的‘法自然’不成其为思想方法”！我认为，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的“法自然”是思想方法，那么就应当等于中医不是“古代经验”那么简单！对中医的排斥实际上是对一种哲学和智慧的排斥。如果中医被反对者人为地消灭掉，但愿不会演出一幕荒诞的逻辑：中医倒了——《易经》就没事实理据而倒下了——中国文化人学信仰动摇了——最后所有中国人都跑到宗教那里去了。谁都可以认为我这样说是荒诞的，甚至要不要中医也不要紧；但是如果我说：“有思想的人都是或者信奉宗教，或者是信奉人学信仰；只有没思想的傻瓜才会说无所谓。”这又是不是荒诞呢？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会无所谓，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理性！



.....
 如果中医继续这么退化下去——
 即继续西医化的趋势，恐怕真有中国
 人要到日本学中医的那一天！

..... 二 中医求真难上难

在体现中国文化理性方面，当今中医起到了顶梁柱的重大作用。但是，一个民族是要有忧患意识的——中医更是如此。中医的忧患和遗憾虽不为众人所知，但可以说达到了发人深省的地步！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而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易经》底蕴远不如中国的日本，竟有人大喊：中医出自中国，但不久的将来，中国人要到日本学中医。这个说法不免狂妄，但确实不无几分道理。在当今西方微观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医其实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如果中医继续这么退化下去——即继续西医化的趋势，恐怕真有中国人要到日本学中医的那一天！

当今中医界人士普遍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权威经典的认识有许多空白；更让人忧虑的是，不从《易经》的认识论、方法论去认识中医思想，而仅仅追求行业技术，以致中医退化。如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不妨试问：

——《黄帝内经》里女人“七七四十九”，男人“八八六十四”，这“七”和“八”是怎么来的？

——中医的“五行”及其规律是怎么来的？在人的生命现象中，用什么直观指标来证实它？

——《黄帝内经》与《易经》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

——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都是“表面工夫”，有什么可靠的哲学依据？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里古方的药味及钱数分量是怎么来的？

——中医临床是不是可以仅仅根据症状轻重而判断病的轻重或大小？

因为存在许多的空白，因为人们对中医的一知半解，以至当今中医界常常毫无经典依据地误传、误解。比如说，什么“病重药重，病轻药轻”，“病大药大，病小药小”，“儿童药量为成人三分之一”等等，皆为缺乏经典考究而人云亦云。当今许多的中医院，诊断方法几乎以西医方法为主，对病名的表述也主要采用西医语言，而且还美其名为“中西医结合”。

请别误会，我并不反对“中西医结合”（事实也只能是“配合”），而是中医当务之急是要从哲学思想上搞清楚什么是中医，从而保持住中医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好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化理性是否

经得起现代文明的考验。

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问来似乎可笑，其实这个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一般来说会认为用西药治病的就是西医：用中草药治病的就是中医。其实不能这么概括。当今的西药有从中药中提取成分并且命名似中似西的“柴胡注射剂”、“鱼腥草注射剂”等；中药也有用现代科学方法提炼中药成分而改造成新的剂型，如麻黄素液等。实际上当今中西医都在“跨界”扩大自己的药源或治疗手段。这是应该的。但是，药物的使用和治疗方法是不足以区别中西医的。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在于医学观和思维方式上。喊了很久的“中西医结合”，称其为“中西医配合”会更恰当；即根本谈不上医学观或思维方式的本质的结合，所看到的仅仅是具体临床技术的配合，或者用西医去改造中医这一事实。

中医讲“辨证论治”，西医讲“对症下药”。中医讲的“证”指的是特定的综合分析结果；西医讲的“症”指的是直接的症状。全国著名老中医、中医耳鼻喉科创业人之一——干祖望，在《干祖望医话·西医容易中医难》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尖锐：

“‘西医容易中医难’，保证没有一个人会举起共鸣之手……即使中医本身，承认的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尤其是为数不少存心在中医队伍里想跳槽到西医那边的医师，更要掩口葫芦地笑发此言论之人，非白痴即疯子……不论中医或西医，由门外汉而成为高明的医家，必然通过四个层次：第一个‘懂’，就是学习，使外行者成为内行；第二个‘通’，懂了以后，能够搞得通，头头是道；第三个‘熟’，通了以后，多多使用（即临床），由生疏而熟练。熟了之后使用起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第四个‘精’，以西医来讲，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了。但在中医则仅仅是学到百分之五十……而一个完整的中医在这四个属于‘固定安排’的范围之外，还有

‘化’与‘神’两个层次……第五个‘化’……那就是辨证论治，这个辨，是有一定的章则而又没有范围的，甚至‘见痰不治痰’而能治好痰；‘见血不治血’而把大出血止住。例如《张聿青医案·泄泻》中章左一案，泄泻夹血。张氏用于术、陈皮、茯苓、川连、防风、米仁、炮姜、滑石、泽泻、薄荷十味没有止泻药的药方，竟然在复诊时已‘温脏清腑，注泻已止’……再如《吴鞠通医案》治疗一例肺脓疡，仅用苦桔梗、桃仁、冬瓜子、米仁、甘草、芦根六味药，而且没有消炎药。这就是中医绝对不同于西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思想，也就是‘治证不治病’的‘辨证论治’……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只能称之为‘用中药的人’，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医……因之，我敢说一个合格的中医要比合格的西医难……”

干祖望的这一段精彩言论不仅点明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中医的退化确实令人堪忧！

人们常常说“中医特色”，这个说法有问题，容易被人理解为使用中药就是中医的特色。为了振兴中医，应当把“中医特色”郑重表述为“中医思想特色”！

三 中医忧患是中国哲学忧患

中医是当今中国文化理性保存最完整、最可靠、最令人信服的依据。为此，我认为，振兴中医，关注中医的退化问题，这应该不仅仅是中医界的事——全社会都应当动员起来，关注我们的中医，讨论我们的中医思想！这不仅仅可以使中医界加强自身哲学意识，对保持我们的中医思想特色有利，而且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理性的认识。有助于中华民族人学信仰的修养。

不仅要救死扶伤，而且客观上还担负着弘扬中国文化历史使命的中医界，

实际上也太需要加强哲学意识了。

我曾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中医交谈时提问道：“请问手太阴肺经在哪里？”他用手指从胸部沿着手臂内侧一直到大拇指，说在那里。我又问：“你凭什么说在那里？”他说是中医经典这么说。我说：“你教孩童一加一等于二时可以扳指头——你行医大半辈子，却告诉我你的手太阴肺经在书里，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当今举世公认的中医人体经络，在西医的解剖学里是看不到的；而且死人的身上是没有经络的。即使当今现代科学如此发达，但西医对中医的人体经络还是莫名其妙。遗憾的是，中医界本身由于思想特色方面的退化，所以对那么几本古老经典的内容，也有许多最基础的东西不知出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其中之一是仅仅守着几本中医经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中医经典背后肯定还有“终极依据”。那么这个“终极依据”到底在哪里呢？早在1300年前的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就曾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这里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中医的“终极依据”——即中医的“终极依据”在《易经》那里！

比如说，《黄帝内经》里的女人“七七四十九”的“七”和男人“八八六十四”的“八”，就来自《易经》。湖北的全国名老中医李今庸先生在《读古医书随笔》中说，少阴之数为“八”，阴配阳数，阴数降，所以女人用“七”；少阳之数为“七”，阳配阴数，阳数升，所以男人用“八”。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但我认为，后天八卦里，表示少女的兑卦“☱”其数就为七；表示少男的艮卦“☶”之数就为八；所以，女人的“七”和男人的“八”，都直接来自于《易经》经卦的序数。

在古代中国，千百年来从不间断而且擅长研究《易经》的是信

奉道教人士，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他们与中医更有“缘分”。

全国名老中医干祖望在《干祖望医话·杏林园里道家多》说道：“打开《内经·素问》第一篇就是‘上古天真论’的道家语言……而且《内经》一书，也已被《道藏》所搜纳。黄帝本身就是道教的鼻祖，他与老子合称‘黄老之学’。因为历代中医界中道教人物及研究道教、崇拜道教者不乏其人。”

古代道教人士、信奉道教或研究道经之人，大多取用诸如“真人”、“子”、“道人”、“山人”等字号。中医史上有众多的名医出自这些人中。例如：

抱朴子：东晋·葛洪（284~364年），江苏丹阳人。代表作有《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

孙真人：唐代大医家孙思邈，传141岁。两部《千金方》的作者。

启玄子：唐，王冰（710~804年），除著有《玄珠密语》之外，在整理唐以前医籍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东瀛子：唐，杜光庭，代表作《玉函经》。

宗真子：金，刘完素（1120~1200年），河北省河间人。金元四大家之一。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命论方》等。

洞虚子：元，王圭，字均章。道士，著有《泰定养生主论》，是礞石滚痰丸的发明人。

原阳子：明，赵宜真，道士。著有《秘传外科》。

生生子：明，孙一奎（1522~1619年），命门学说创建人之一。代表作《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氏医案》等。

参黄子：明，吴昆（1552~1618年），代表作有《医方考》、《脉语》。

通一子：明，张介宾（1563~1640年），代表作有《景岳全书》、《质疑录》、《医家心法》等。

医巫闾子：明，赵献可（约1573~1644年），字养葵，命门学说的重要功臣。代表作《医贯》。

朱华子：清，陈士铎（1662~1722年），代表作有《百病辨证录》、《石室秘策》、《洞天奥旨外科秘录》等等。

玉楸子：清，黄元御（1705~1758年），代表作有，为《灵枢》、《素问》、《难经》、《伤寒》、《金匱》等经典而写的五部《悬解》和《周易县象》等。

梦觉道人：清，周学霆，代表作《医学百论》。

也痴道人：清，黄元裳，代表作《内经集注》。

.....

历史上除了众多取名“真人”、“道人”、“子”等名医之外，还有众多的古代名医都善于以《易经》解说中医。如：李杲、朱震亨、章楠、邵同珍、唐宗海、恽铁樵等等。北京针灸骨伤科学院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何少初所著《古代名医解周易》收集有这方面的内容。

古代道家最善于把人的生命与《易经》结合起来研究，如汉代魏伯阳所著的古代第一本气功专论《参同契》，就是用《易经》的方法和象数去指导和论述气功养生的；另外，作为“黄老之学”的《黄帝内经》，其思想及思想方法也来自《易经》，所以自古“杏林园里道家多”不是偶然的。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不能用《易经》思想及其象数去认识和指导中医，实际上就不能具有中医的生命观和医学观；对中医的医学观认识不足，就不能具有真正的中医思想特色。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所说的“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其中

的“太”有“高级”、“至上”、“源头”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以“易”去指导“医”，这个“医”是谈不上高水平的。我们今天用认识论、方法论特点去理解这名言，还可以理解为：不能用《易经》思想和方法去认识和指导中医，就不能具有中医的医学观，更谈不上高水平的中医，这样的“中医生”也仅仅是干祖望所说的“用中药的人”。

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中医要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就不成其为中医。而这个思想特色是有严格“规矩”的，正如中医针灸一样，扎穴位是不容搞错的！

从历史上看，中医更看重的是思想，与西医比，西医是完完全全的技术医学；而中医更像是“哲学医学”。金代张子和的医著《儒门事亲》，其书名不作医字，是想说明医学之事是富于思想的文化人的事。但是，如今中医界，据我看来，当务之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急需加强哲学意识！人们常常说“中医特色”，这个说法有问题，容易被人理解为使用中药就是中医的特色，以至那些“滥竽充数”的人不以为耻。为了振兴中医，应当把中医特色郑重表述为“中医思想特色”！

反中医的人把相信中医的人称之为中医“信徒”。“信徒”是哲学语汇，但反中医的人却又以“技术方法”去批判中医的哲学思想，这是“工具”不对等。对于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正确、有效的东西都不能承认，这决不会是科学的态度，更不是正确的哲学观。

从2006年至2007年初的反中医情况来看，反中医的一方也同样缺乏哲学意识和哲学理据。

中医为什么要进行现代意义的“量化”？这是中医思想特色发展临床技术的需要，还是特定医生群体的需要？

四 中医也有“边缘人”

有人以中医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来说明中医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我倒觉得这不足为凭。试想，马车、牛车作为主要的陆地交通工具不是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吗？今天不是照样被淘汰了吗？中医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在于其独特的思想特色，即独特的哲学和思想方法！但是，从当今中医的思想特色看，中医面临的情况是严峻的。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就曾在一篇序文中呼吁努力保持中医的思想特色。

在微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大背景影

响下，当今中医最大的问题是理论上不能理直气壮。

学的是中医，从事的职业是中医，但“阴阳”和“金、木、水、火、土”、“寒热”等理论，却没有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没有得到欧美西方的认同，甚至在语言上也很尴尬，不能不使用西医的诸如“胃炎”、“肾炎”、“三叉神经痛”等语汇；反而中医自己的诸如“太阳病大青龙汤证”、“阳明病大承气汤证”、“少阴病白通汤证”、“奔豚病桂枝加桂汤证”等等语汇，在临床上已淡化。说中医是“科学”，实际上不知把它放在当今科学的哪个位置上，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科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中医……往往说“中医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思想”——现代唯物主义者去干“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事，总觉得这话说不过去或不免滑稽。

临床上也往往不能理直气壮。首先是诊断。你中医说“肾亏，水无以济火”，西医却能拿出微观可测证据，往往证实是心脏病症；你中医说“肝脾不和”，西医往往有可测证据说明是胃溃疡；你中医说“肝经有热，偕湿下注，引发睾丸肿痛”，西医却有可测证据说是“睾丸炎”；你中医说“命门火衰，肾虚脑空”，西医却有可测证据说是“老年痴呆症”等等。你中医的诊断“望、闻、问、切”都是“表面功夫”，所说的词语都是“虚无”的；而西医的诊断方法都是直接证实的、“深入内部”的、客观的，所下的结论都是真实可测的。对比之下，你中医怎么办？

西药讲的是可测的化学成分，而中药却讲“温、热、寒、凉、平”、“药味”、“入经”、“升、降、沉、浮”等等，这些说法不能直观可测，不符合现代科学方法。

……诸如此类的情况，使中医不仅处境尴尬，而且“语言功能”也在萎缩！也许是这些原因，使一些中医生对中医本身信心不足；也许是这些原因，使中医的临床诊断越来越西医化；也许是这

些原因，使一些事业心较强的中医生，对中医药的研究越来越趋于“量化”，不知是淡化了中医的思想特色，反而认为这是在搞“中医现代化”。这些现象都在说明：中医也有“边缘人”！

我手上有一本2000年出版的《中医主症鉴别诊疗学》，由十几位中医学者联合编写。这本书态度严肃，操作性强，精神可嘉。编者在《前言》写道：“中医学应当建立起完整的病证症诊疗体系……应当说中医学尚无真正以“症”为纲，进行“病”、“证”（尤其是病）鉴别诊疗的专著……以症状为纲，“病”、“证”、“症”、“理”、“法”、“方”、“药”等俱备，病与证纵横结合，诊断与治疗并举，因而具有创新性、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这本书实际上是想把中医“量化”，以适应现代的思维方法，就其内容和数据当然是有益的。但书中对所有病、证、症鉴别及其“机理分析”等内容却不能反映《黄帝内经》的“天时观”和“先天观”。比如说：同一“病、症、证”发生在老、中、青等不同年龄段，其年龄有无区别意义？同一“病、症、证”发生在不同的季节，这季节“天时”有无区别意义？同一“病、症、证”发生在《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中的不同先天体质有无区别意义？

这本严肃的技术书，似乎对各“病、症、证”说得很清楚，很“量化”；但怎么看都不能给人感受到《黄帝内经》生命观的“人天”关系。从技术上说，也没有体现《黄帝内经》的生命衰老过程和特定“先天”因素的思想内容。我们是不是应当郑重思考这么几个问题：中医为什么要进行现代意义的“量化”，这是中医思想特色发展临床技术的需要还是特定医生群体的需要？《黄帝内经》现成的不同“人种”先、后天优劣势区别技术你不用，面对当今人类基因研究可能给未来西医带来的飞跃发展，中医对此还有什么说话的余地？！

我曾碰到有人这样提问：“中医的诊断‘望、闻、问、切’都是外部功夫，它能诊断出内部的胃溃疡吗？”我这样回答说：“千万注意！你这里所说的‘内部’绝不是哲学语言；绝不能与‘本质’等同——西医用现代技术的手段诊断出内部的‘胃溃疡’，那也只是现象而已，远远不是病的本质。再说中医的‘望、闻、问、切’虽是‘外部功夫’，但却往往抓住病的‘内部本质’，就好比小偷把手伸进你的口袋之时给你抓住，你还需要考究他有没有偷窃的动机吗？”

我无意就中、西医作无聊之争，而是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好作宏观之想的人喜欢说这‘主义’那‘主义’，但在医学问题上却难以见到哲学思考？！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哲学意识的淡薄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中医界就有一种哲学骗子。这种人自称中医，而又采用现代西医的科学方法和语言，提出似是而非的标新立异的理论来招摇撞骗。面对中医的责问，这种人会说他在进行中医现代化研究，古老的中医靠边站；面对西医界的责问，这种人会说他在做中医研究，与西医说不到一块。这样，中医就由他任意解说，任意“创新”。南方某省有个中医教授就是这么干的。这位教授说一切病症的信息都由大脑发出，大脑的信息调理可治疗一切病症。为此，他发明了“新针灸”。他用西医的方法研究大脑，而用中医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他明知中西医对大脑的认识不同，也无力批判古代中医的理论，但却大言不惭地说他要改写中医的基本理论。这位教授凭着自己的名气和权位，在中西医的边缘地带自大自圣，任何学术责问都着不了他的边，只是唯有一点，临床无建树。这是中医界不怀好意的“边缘人”，是“中西医结合”的怪胎。这个现象说明，丢开哲学不谈而一味地追求医术功利，这会招引居心不良的人在两种哲学的夹缝中行骗。这应当引起包括西医在内的整个医学界的警惕！

抗衰老的研究和实践也决非一元论事——客观上更是多元论事。未来的人类基因研究成果，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看也绝不会是万能的。

五 对人类基因研究和抗衰老话题的易理思考

当今，人类基因的研究是一个热门话题。

由于人类基因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为未来人类医学水平的提高起极大的作用，所以不少人对此期望值很高，甚至指望它能使人的寿命延长一两百岁。有期望，无可厚非；有奇迹出现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期望值到底有多高才符合事实呢？这恐怕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人的理性或思维健康，否则一不小心，又会跑出什么“科学鸡”或“科学神”

出来。

有人说，当人类基因技术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或其他器官造出来，这样就能使人的内脏不衰老……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而且这个期望值确实有道理和相当吸引人。我们不妨“玩一玩”这个问题。

2002年12月间《广州日报》有一报道，题为《19遗体献出只一具成功移植角膜》，副题是：心跳呼吸停止时有用器官也宣告“死亡”，有关方面呼吁尽快出台《脑死亡法》。报道说：“……在签字献出遗体的人当中，大部分人还希望死后自己的有用器官能为其他需要人士所用，认为这样发挥的价值更大，但他们的愿望基本难以达成……我国现行对死亡的界定是心跳及呼吸停止，然而到了那时，人体的器官除眼角膜之外都宣告‘死亡’，不可能进行移植。”

为什么人的心跳呼吸停止后几乎所有器官都“死亡”呢？《易经》能解释这个问题。《易经》思想是整体观思想。“卦”有八个，但任何一“卦”都不能单独成其为“卦”——任何一“卦”都在“八卦”之中。《易经》的这一思想及其方法最能说明生命器官的“工作态”；这一报道的客观现象也证实了《易经》的整体观思想及其优势。

同样道理，我们设想，即使把基因技术造出来的人的器官替代原已“坏”了的器官，那么请问这一“新”的器官是多少岁的器官？假如这一“新”的器官是一岁的话，那么这个“一”数怎么去和中、老年“主人”的岁数对接？或者说，难道换了“新”器官就等于换了生命吗？换句话说，换“新”器官能治病，难道就等于可以把“衰老”换成“年轻”吗？再说，即使“最好”的基因，难道能解决“喜、怒、恐、思、忧”等情志过极致病问题？难道能解决不良生活方式致病的问题？难道能解决各种外感病毒致病的问题？

作为当今尖端科学的人类基因研究，必然会给未来西医临床带来“个性化”的理论和技術。那么我们的古人有没有对生命“个性化”作过思考或作过什么样的思考？令人自豪的是，早在约两千年前的中医第一本经典《黄帝内经》里就已经有各种“先天”的内容，即生命“个性化”理论；并且，千百年来就已经指导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

《黄帝内经·灵枢》里说，人有“金、木、水、火、土”等五类人，每一类中又包含着五种人，即五五二十五种人，每一种人的“先天”优劣势都不一样，发病时间和机理都各有不同。文中说：“木形之人……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有才，好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然”；“火形之人……其为人赤色，广胠，锐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摇，肩背肉满……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阴核核然”；“土形之人……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阴敦敦然”；“金形之人……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阴敦敦然”；“水形之人……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广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阴汗汗然”。

《黄帝内经·灵枢》根据不同长相来判断五脏六腑的不同“先天”情况：“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倾；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恶，或吉或凶……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唇上

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脾小则脏安，难伤于邪也；脾大则苦凑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眇引季肋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脏苦受邪。脾坚则脏安难伤；脾脆则善病消瘵易伤。脾端正则和利难伤；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

《黄帝内经·灵枢》里对具体病证论及了“先天”差异的临床问题：“黄帝曰：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黄帝问道：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外感了邪“风”而同时得病，为什么得病的情况会不同呢？希望你能为我解答）……少俞答曰：“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黄帝曰：何以腠肉之不坚也？少俞曰：腠肉不坚，而无分理者，肉不坚，肤粗而皮不致者，腠理疏……”

中医所说的不同“先天”差异，就是中医的生命“个性化”，其性质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人类基因；或者这个说法难免牵强，干脆用俗语说，各人的“种不同”。

还是回到人类基因的话题。

中国著名人类基因研究学者杨焕明曾在一个演讲中这样说：基因无所谓好坏——虽然许多疾病和基因有关，但没有得某种病的基因在另外某种情况下却会得相同的病。杨焕明的这一说法说明了对基因研究成果的慎重，也同时说明了“基因无所谓好坏”与《黄帝内经》的各生命个体之间“先天”优劣势各异类似。

我在这里用了“有”和“类似”，并非是为了说明中华文明有对应现代文明“高级”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要说明的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性和智慧与人有不同之处。

“基因无所谓好坏”，这说明每一个基因都有其“立足之地”和存在价值。这给医学上的思考，只能是每一个人类基因怎样才能达到“物尽其用”的问题。用第一军医大学罗仁教授的说法：“任何

疾病、任何证候，归根到底都与基因表达有关。”用北京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高益发教授的说法：“基因调控失常是引起机体生理状态失衡进而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因此，基因调控被认为是基因组学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即从调节阴阳入手，达到基因调控的效果。”

这无非是说，每一个人生命的现象和过程，实际上都是“基因表达”的特定状况。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当然有益于认识的过程，似乎也很新鲜，甚至好像给中医带来了“新思路”；但实际上难免文字游戏之嫌。用通俗的说法，无非是医学不能给既成的生命“先天”带来新的东西，而只能使“先天”尽量顺利表达，也就是说只能使人无疾或少疾而终；延年益寿，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就是“一元论”的问题。

许多人所以对人类基因研究话题这样有兴趣，其中一大原因是涉及抗衰老和延年益寿问题。

说到抗衰老，当然应该首先有个“寿命极限”数的标志，否则如何界定“衰老”。说到这一问题，欧洲有学者认为人的寿命极限可达 300 多岁；有的说可达 800 多岁；甚至有的说可达 1000 多岁。再看看根据《易经》和《黄帝内经》的有关计算方法对寿命极限怎样计算。《易经》三爻经卦有八个卦，周文王穷尽八个卦之间的关系而复卦为八八六十四卦。《黄帝内经》模仿《易经》这一计算方法，以“八”为“天癸”计算基数，“八八六十四”岁为“天癸”衰竭之数。我们但且以《黄帝内经》“二八一十六”岁天癸足之数为基数（发育过程的每一岁皆为不可替代的“生数”），模仿其方法计算，穷尽其每一“生数”的发展意义，即十六的平方为 256 岁。不管按欧洲学者的说法也好，或按《黄帝内经》的计算方法也好，或从当今寿命现实来看也好，人类“抗衰老”研究确实大有可

为。如按 256 岁看，假如当今人类平均寿命为 85 岁（当今人类平均寿命远未达到这个数），那么几乎每人每长一岁即平均“未老先衰”了两年——可享用寿命仅占极限的 1/3。据此，再假如生命 70 岁时，即已“浪费”140 岁。“老”，应该是享尽天年的“残”。即使以上推算不可成立，那么现实中的“老”为浪费天年的“未老先衰”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抗衰老不仅对老年人有意义，而且对中青年也照样有意义。按照高益发教授的说法，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与“基因调控失常有关”（即与寿命极限意义的衰老无关），这说明人的年岁越大，导致“基因调控失常”的问题积累得越多；反过来说，因为“老”不是天年的老，而是未老先衰的“老”，所以，年岁越大，问题越多，短时间内明显使衰老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好比室内的垃圾越多，短时间内扫出去的垃圾就越多；同样道理，室内垃圾越少，同一时间内扫出去的垃圾就越少。这个逻辑是可以成立的，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未老先衰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唐代名医孙思邈寿命高达 141 岁来看，抗衰老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但是，现实中的“老”（即以上“未老先衰”的老），核心问题在哪里呢？现代西医普遍解释为：人老，老在脑细胞，而脑细胞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中医的说法是“肾主一身之本”；《黄帝内经》说“先天”阳气最后衰竭的是肾，并说肾通脑，把髓海（脑髓）归于肾的系统。这个问题是个很专业、很学术的问题……似乎无从下手。但我们跳出具体的问题，去观察现实生活的情况也许会有启示。

我对现实生活的大量考查，得出健康的三个层次的“标准”（将在本丛书之二详述）。

其中健康的最低层次标准是大小便的正常。年老体弱之人大多

大小便不利。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大多有小便不利，其表现为：尿频、夜尿多、线性小便、小便开叉、小便垂直淋下、小便间断难出等等。老年女性多有大便不利，其表现为：长期便秘或大便不成形。

健康标准是共同的，但各人达不到标准的原因或如何达到标准的方法却是因人而异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医学对不少司空见惯的生命现象还不能解释或解释得不尽如人意。

例如，为什么男性老年多有小便不利；女性老年多有大便不利，对此，虽然当今中西医都有病因解释，但却没有作出性别解释。

例如中年发胖显然与衰老有关，但为什么男性大多从上身发胖开始，而女性大多从下身发胖开始。

诸如此类的平常现象，现代医学都没有作出直接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男女两性生命兴衰征象有明显的不同，而又不能作出性别解释，特定个人没有不男不女，这实际上是在抗衰老研究或操作上缺乏针对性。性别都无以区分，那么是不是距离临床操作的“个性化”还很远？反过来说，如果对性别解释清楚明了，那么对抗衰老临床“个性化”就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古代中医对男女有别的问题反而有清楚的论述。如清代名医唐宗海《医易通说》所述：“男女天癸，路道不同。女子天癸至，是从前面交于心，合于离卦，故《内经》原文先言‘任脉通’；男子天癸至，是从背后下交于肾，合于坎卦，故《内经》先言‘肾气盛’。”甚至古代中医还以“坎”、“离”两卦的性质作为终极依据，去说明男、女性别的体形不同和性器官不同的本质内涵。我们古人对生命“个性化”的认识和理论，指导了千百年的临床“个性化”；

我们的古人在延年益寿抗衰老方面，事实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认识生命“个性化”，是不是有必要从思维科学的角度去考察，看看古代中医的理性和智慧与现代人的理性和智慧有什么不同。

按照前面两个教授的说法，延年益寿，无非是正常的“基因表达”；未老先衰，无非是“基因调控失常”所致，所以，抗衰老的方法，当然是要排除阻碍“基因表达”的因素。但是，现实中的特定个人不仅仅是自然人，更是现实中的社会人。阻碍“基因表达”的因素，事实上大多来自外部现实生活，例如饮食、生活方式、情志等方面的过极。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健康的因素，从逻辑上说，并不是基因本身的问题；但其恶果又确实导致“基因调控失常”。综合起来看，导致未老先衰的原因客观上大多与基因无关（否则抗衰老话题也无意义）；抗衰老的研究和实践也决非一元论事——客观上更是多元论事！未来的人类基因研究成果，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看也绝不会是万能的。这好比流行性病毒感染，这当然导致“基因调控失常”，但临床上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想办法把病毒消灭掉。再正常的“基因表达”，再强壮的身体，总不至于“刀枪不入”吧！在哲学上，这里有一个对“一元论”的认识问题。

人类基因研究热门话题的思考也有一个思维健康的问题。即我们是不是往往以“好奇”当作上进？我们是不是总是以极限数学去面对无穷数学的命题？试想：即使我们对客观世界“无限地”认识了，实际上那也只是客观世界“本原”的事实，我们根本没有给世界的“本原”增加了什么。请别误会，我并非在宣扬一种消极思想，而是认为我们应当具有更高境界的理性和定力。人类历史证明了这样的逻辑：更高一级的客观规律掌握在更高素质的人那里！

.....
难道人类今后都要按照这个逻辑
模式去面对瘟疫“新病”。
.....

六 对 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历史文化思考

正值本书第一版将要脱稿之时，“非典型肺炎”这场人类灾难不期而至。我认为，对这场灾难也有一个历史文化方面的思考问题。

2003 年的春节刚过，我国广东出现致命性传染病非典型肺炎的流行。据当年 2 月底媒体公布，说有 300 多人感染，几十人死亡。虽然报道说疫情已“有效控制”，但却引起一阵恐慌，据说有预防作用的食醋，由原价的 1 元多钱一瓶抢购至 100 多元钱一瓶。更甚的是，接着

我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美国、意大利等约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现病例或引起恐慌。

当今文明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恐慌？有关专家说，这种致命性传染病是一种“新病”，由于病毒原菌不明，所以还没有针对性治疗方法，更没有特效药。

当今文明社会不是科学很发达了吗，为什么还会有如此被动的事？我不禁联想到曾在香港亚洲电视看到的一部英语电视片《突变危机》。

这个电视片说，早在1996年，在一个世界性的卫生学术会议上就有学者呼吁，不要以为人类对流行传染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人类可能会面临不知所措的新的流行传染病疫情。美国纽约有一呼吸道传染病临床30年经验的老专家说，有这样的病菌，抗生素对它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可以使它几个小时里出现变异。他说，我们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进化才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有的病菌在几小时内就可变异，并且抗生素对它不起作用。这个电视片对这种情况的原因分析说，原因可能在于我们今天食用的禽畜肉类。当今禽畜的生产都是商业性规模的，为了禽畜生产的高效性，几乎都给以禽畜喂食抗生素，而这些抗生素也正是人类医用抗生素。当这些经喂食抗生素长大的禽畜的病菌一旦传染到人类，临床使用抗生素就往往无效。可悲的是，当今禽畜的生产还在继续喂食抗生素。丹麦一家生产禽畜的企业，尝试不喂食抗生素，结果生猪不仅长得皮包骨，而且还得了一身的病。为此企业主表示，如果不喂食抗生素，根本就无以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所以今后还将继续给生猪喂食抗生素。

有媒体报道，据权威分析，非典型肺炎病原来自动物。如果《突变危机》说的是对的，而且非典型肺炎也与此有关的话，那么

人类要在根本上战胜疫情，恐怕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这次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问题。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对当今文明的反省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恐慌？因为现代医学对这个具有致命性传染性特点的非典型肺炎的病毒病原还不明确。为什么病原不明就恐慌？因为西医如果不能发现是什么病毒原体，那么就不可能寻找到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或方法；而且，西医即使确认了病毒原体，最快也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研究出“针对性治疗药物或方法”。可见人们所以恐慌，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人们对现代医学逻辑模式的了解。

对此我们不能不作严肃的思考。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古人有没有碰到过致命性传染病？难道古人就没有碰到过“新病”？古人是怎么过来的？为此，古人有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应当怎样作出相应的思考？

毕竟还有另一个声音。

2003年2月14日《广州日报》有一报道：《中医治愈18例患者——邓铁涛解释非典型肺炎是风温》。文章说：“虽然西医至今尚未找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原因，但中医对该病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昨天上午，全国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接受采访时说，非典型肺炎在中医看来就是‘风温’，多发于季节变化时，正所谓‘温邪上岁，首先犯肺’……全国名老中医、著名温病学家……合拟出预防非典型肺炎的中药方……给18名患者服用，并予以其他中药治疗，现在患者全部治愈。”按照这一报道的情况看，虽然18名患者不为多，但至少说明中医不仅可以医治这种病，而且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医来说这不是什么“新病”！

2003年4月3日，卫生部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广东这次医治非典型肺炎的经验说明中西医结合有最好的效果。

2003年4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在广东考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广东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值得世界其他地方借鉴。

对非典型肺炎的医学技术问题有医学界的专家们讨论，我更有兴趣的是医学观的哲学思考问题及历史文化的思考。

前面所说的全国名老中医邓铁涛将非典型肺炎归纳于中医的“风温”类，即中医的一种“外感”热性病毒性疾病。对于病毒感染问题的中西医比较，我国另一位著名温病学家孟澍江有更具体的论述（见张文康主编，2001年1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孟澍江》）：“……据统计，每个人一生中要有200次以上的病毒感染。虽然许多传染病的发病率在显著下降，但仍有许多病毒性传染病的发病率是相当高的，如我国的肝炎病毒携带者达1亿以上，流行性出血热每年的患者也有6万~10万人，至于每年患病毒性感冒的病更是无法统计。然而，对病毒感染，目前现代医学还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大多数病毒性疾病还没有确切疗效的药物。相比之下，在中医药里治疗病毒性疾病的方药是非常多的，而且其中有许多已被证实具有可靠的治疗作用……不是中医药在治疗热性病方面没有优势，而是这种优势没有能充分显示出来……与西医相比，目前对热性病的治疗上，中医对病毒性病的治疗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孟澍江这里所说的优势，事实上是与西医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思想方法的优势，也是历史文化底蕴的优势。正如前面所说《广州日报》报道的那中医治愈的18例非典型肺炎案例，用西医的医学观思想及医学理论是不可解释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上世纪70年代全社会关注乙型肝炎问题，至今对慢性乙型肝炎带菌者问题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上世纪80年代起全社会关注艾滋病，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却又出了个“埃博拉”；前

几年香港的“禽流感”闹得沸沸扬扬，还没拿出很好的医学办法，如今又出了个“新病”非典型肺炎……“被动和恐慌——非针对性治疗和病原体研究——明确病原体和针对性治疗及疫苗研究——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当今西医解决瘟疫“新病”过程的逻辑模式。这难道就是人类智慧的极限？难道人类今后都要按照这个逻辑模式去面对瘟疫“新病”？难道人类不能拿出更高的智慧去打破这一逻辑模式？

好在人类历史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地球也不是现在才开始转动。看看我们的古人面对瘟疫“新病”的智慧，也许会对我们大有益处。

中华民族与外感病毒的斗争历史最悠久，并且自古就有系统的理论。千百年来，古代中医就以《伤寒论》、《温病条辨》等外感临床经典为功底前提，古代一个内科中医生，如在临床上不善于医治“伤寒”、“温病”、小儿麻疹等外感病，简直就难有生存空间。

古代中医把瘟疫归到“温病”类。早在约 2000 年前的《黄帝内经》和 1800 年前的《伤寒论》就有温病的内容。瘟疫，俗语又称“发人瘟”。在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曾有过许多次的瘟疫大流行。据《明史》记载，仅从永乐六年至崇祯十六年（1408~1643）的 200 多年间，发生大范围瘟疫流行十九次。明末著名医学家、温病学家吴有性在《温疫论》里记有“大头瘟”、“虾蟆瘟”、“疙瘩瘟”、“探头瘟”等疫名，并有“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的可怕的记述（假如这些古代疫病在今天重新出现，不知会不会被确认为“新病”）。

自古以来，中医认为一年四季有“风、寒、暑、湿、燥、火”等“六邪伤人；而明代温病学家吴有性在《温疫论》里，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六邪”以外还有一种“戾气”之毒，为温病学理论增加

了温疫的内容。《温疫论》指出了病毒性传染病的致病因素的多样性及种属性易感性：“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畜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并提出了攻邪驱疫、“急证急攻”的温疫治则。

当今人们普遍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使病人感到一天比一天症状减轻或舒服，即使当今医生也不免持以这样的临床观。但从《温疫论》看，医治温疫的过程往往相反。不妨让我们欣赏《温疫论》中有如大将风度的精彩一段：

“温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药方名）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达原饮加大黄下之（以药泻下大便）。烦渴少减，热去六七，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药方名）。傍晚大下（大便泄泻猛烈），至夜半热退，次早鼻黑、苔刺如矢（患者已脱险）。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用药不得不猛。设此证不服药，或投以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常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此类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医根本没有现代病毒学的概念，所说的“毒”、“邪”也指的是病毒的性质，而不是西医的微观病毒原菌，更不需要根据西医的微观病原菌来寻找“针对性治疗方法”。古代中医就有这么一手：认识到什么性质的病毒必然从什么生理部位而入（如伤寒从毛孔而入，温病毒从口鼻而入）——必然依次到什么生理部位——必然出现什么系列症状——最后必然是什么生理机能败坏而致死亡；或者说，根据特定系列症状，可以判断是什么性质的病毒，而且病毒正在什么部位，病的程度如何，以及应当用

什么方法医治。对于古代中医无需病菌概念而能“驱邪”医治，这有什么逻辑依据？且看《温疫论》一段精彩之论：“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当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能知物乎？”根据古代中医所奉行的《易经》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温疫论》驱除病毒的思想依据：即对病毒“形”的认识不要太执著，天然之病毒既有天然之窍而入，就必有天然之窍而出（口、鼻、毛孔、大小便等即为天然之窍）。这就好比误吞下一个铁珠，无需去分析那是什么铁，上有口而入，就必然可从大便而出。

古代中医甚至还有温疫变异的理论。其理论认为温疫可以因人而变，因宇宙时空而变。《温疫论》有这样一段：“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有岁气稍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200年前的清代温病大家杨栗山，根据自己近四十年的温病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发现温病与古代每十年一句的“甲子大运”有关，并写在他的《伤寒瘟疫条辨》里以传后人：“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泻者，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验矣，势必荡涤而元泉之势始杀。至甲申乙酉，荡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历年已来，居然成一定局。”按照杨栗山这一说法，2003年癸未流年，正是温毒炽盛的“甲戌大运”里的温毒炽盛之年……

对于温疫的传染流行这个敏感问题，古代中医有自己的独特经验。《瘟疫论》说：“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疫气者，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其年疫气衰少，里闾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清代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特别提到：“甚有无外感而郁热自发者，不知凡几。”以上意思是说，温疫病案每年都有，但一般年份不传染，只是极少的“疫气盛行”之

年会传染流行；特别是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根本不需“外感”或传染却会“郁热自发”（这是不是能解释非典型肺炎流行的一个情况：即为什么平常所认为抵抗力差的儿童和老年人感染者奇少，反而抵抗力强的中壮年感染者众）。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这恐怕会给当今文明社会莫大讽刺：即如果疫区里今后每年都检测出同一疫病个案，哪怕是只有一例，那么这一地方是不是还是“疫区”？人们是不是还要恐慌？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证明，《易经》
阴阳思想、象数思维和中医五行生克
规律，事实上在起着定理性和原则性
的思想指导作用。

七 杨振宁先生的“归纳法” 质疑

现代逻辑学不仅不够分量去否定一种哲学；即使是一种哲学去直接否定另一种哲学，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成功先例，而且也是十分可笑的！

美籍华裔杨振宁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 2004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2004 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他说近代科学所以没能在中国发生，是因为古代中国从来就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演绎法”，他还说他注意到从《易经》开始就没有“演绎

法”，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归纳法”是唯一的思想方法。

杨振宁先生的这一说法未免太武断。

“归纳法”是逻辑学里思维方法的一种。顾名思义，“归纳法”是根据事物及其发展的状况、性质、数据等等进行分类和概括的思维方法。“归纳法”没有定理作思维条件。但是从中医里大量的情况来看，并非能用“归纳法”去解释。

——《易经》里的阴、阳类象各有不同的性质。“阳”主升（从下至上）、主外（从外至内）；“阴”主降（从上至下），主内（从内至外）。这一思想原则体现在中医经络学里。人体十二经络里，手三阴、足三阴，这六条阴经走向全部都是从内往外或从上往下，而且都在人体阴的部位；手三阳、足三阳，这六条阳经走向全部是从外往内或从下往上，而且都在人体阳的部位。这个情况很明显体现了“阴”、“阳”类象思想原则，即很明显存在思维的“定理”。这总不能用“归纳法”去说明吧。

——汉代张仲景的《金匱要略》有这样的论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脾能伤肾，肾先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

这段论述是中医实践了近两千年的理论，它来自“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思想原理。在中医理论那里，用五行相生相克去认识和说明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关系，是作为一种思想原理或“思维逻辑”来使用的，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思维“定理”来使用的。《金匱要略》这段论述总不能用“归纳法”解释吧。

——明代医学家孙一奎和赵养葵创造性地研究出“命门”之学，而成为一代大名医，为后世中医作出重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创“命门”之学理论，是通过研究坎“☵”卦的卦象卦

理的方法进行的，这里使用的思想方法是来自《易经》的类象法，这根本就与现代逻辑学的“归纳法”不相干。

阴阳和“五行生克”，不仅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同时也是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有“定理”或“演绎”的逻辑意义，也有直接的规律性意义，这都不是归纳法要求具备的；更不是能以“归纳法”解释的。

再就是中国武术的情况也在体现着《易经》的阴阳规律思想和中医五行规律思想，其内涵和方法也是不能以“归纳法”解释的。

中国武术的正宗太极拳、八卦掌、大成拳、武当拳等内家拳，每一举手一投足，每一呼一吸，都有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医学内涵，都必须与生命的健康规律高度统一。这样才能顺其自然，才能使人的能量极限最大化。

比如说，阳主出，阳主呼气，主外，当拳头由内往前使用阳面力量而发劲打出时为阳，要配合呼气。相反，把手放在前方，拳心向上，力往内发时为阴，阴主入，要配合吸气。这两种情况不能相反，否则不仅不能发劲，而且还会伤身。

仅仅从这样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中国武术哲学内涵的丰富和中医原理的深厚。以上举例的动作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验证。或者有人会说这样简单的动作的合理性正是可以使用“归纳法”，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西方人还不能用“归纳法”解释或认识太极拳。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易经》阴阳思想、象数思维和中医五行理论，事实上在起着定理性或原则性的思想方法作用。虽然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逻辑学，但不等于古代中国没有逻辑思维，而且从中医、中国武术、天文历法、气功理论等等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再从哲学思想的高度看问题，只要承认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和智慧，那么对于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探讨，其方法和结论都不是现代逻辑学可以概括和胜任的。

当然，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符合狭义科学的方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杨振宁先生在“文化高峰论坛”上总不会谈狭义科学吧——如果说，因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所以近代中国落后；那么近代科学不是也没在日本发生吗？又为什么日本不落后——用狭义科学去概括民族文化，去研究或阐述历史，对此，不妨看看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怎么说！

中医不仅有自学自助的历史传统，
而且自古就不乏自学成才的范例。

八 自学中医的价值和捷径

中国有句古训：“谈道不离身，离身不为道。”

我们的古人把自我生命看作是自然客观规律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反过来说，认识了自我生命，也就可以“类象”认识自然客观规律了。所以我们的古人是以自我生命为“工具”去认识和掌握自然客观规律，去学习和证实《易经》思想的。自我生命的认识领域有武术、内功和中医。也就是说，学习和掌握中医，不仅具有自我保健的价值；而且还是汉民族人学信仰修养的非常重要

的手段。

再说，如果人们普遍进行中医自学自助，那么中医的文化得到普及，中医的实惠得到体现，这样中医就会长期具有普遍而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医自古就是这样生存的。我更相信民间的原动力。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这么做过。当时有这样一个提法，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提倡让中医的医术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即提倡民间群众自学中医，能使用中草药医治自己的常见病。那时候的民间社会气氛确实很活跃，中草药知识普及面很广，不少的人还乐意将自己宝贵的偏方、秘方贡献出来，现在大书店里的各类地方中草药图册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贡献。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中医自学自助具有悠久的历史。即使是当今民间，跌打、蛇伤、皮肤病、风湿病、烧烫伤等等方面的医术还相当普遍。

中医不仅有自学自助的历史传统，而且自古就不乏自学成才的范例。远的不说，广东东莞就有一个叫何炎燊的全国名老中医，“既乏祖传，又无师授，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典型范例。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中医自学自助是完全可能的。

据我了解，当今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就有大量的人在“中医自学自助”，或者说是中医爱好者。他们中有很大部分也是“既乏祖传、又无师授”。他们自学中医是为了掌握自己的防病、治病方法。

但是，自学中医无异于“大海捞针”，是非常艰难的。自古以来医书数不胜数，多如牛毛，你选读什么医书？中医的临床很重要，你怎么解决自己的临床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再难，无非古人也是这么面对和这么过来的，有了成功的可能性，也应当有成功的办法。我认为中医自学自助是

有好办法，甚至是有捷径的。

我认为首先不要把中医当作一门技术来学习，而应当作为中医文化来学习。这就要求你的哲学、历史学、逻辑学、古汉语等学科的基础要雄厚。

第一阶段很重要，但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就是首先学习中医的哲学观和思想方法。这需要认真学习《易经》、《黄帝内经》、《伤寒论》（暂不作医术来学）等等；与此同时要研究中医历史，对中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要十分熟悉和要有自己的总结和观点。这一学习阶段的目的在于掌握中医的生命观、医学观和思想方法，这样你就会在思想上建立起自己的识别标准和鉴别能力，这样就可以使你选择看什么书和怎样看书的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医的思想、观点、方法你都掌握了，那么你在医学观上就不会迷惑，在下一阶段医术的学习上你就不会有大海捞针的感觉。

第二阶段是学习中医的临床技术，这更是有捷径。由于中医自学自助的特点是对自己服务的，所以在量上不需要“漫无边际”。比如说，虽然中医的临床观是最讲究生命的“个性”的，对于茫茫人海，经常是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不知何去何从；但你细心观察自己或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虽然人与人之间比较，感冒症状各有不同，但每个人一年来甚至长期的多次感冒的症状是基本相同的。更何况自己的情况自己最知道，不过，千万要注意，学习的方法和技术知识的结构不能走上世纪主流教育的路子。这首先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要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五行”体质的先天类型。当然，诸如《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等临床经典要认真学习。在临床学习上如何着手？自学成才的全国名老中医何炎燊的经历很有启发意义。他说他首先“从无病人中去知其常”。这个道理很重要，你看《黄帝内经》的大

半内容其实是讲人无病的时候是怎样，整个中医临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知常达变”。何炎燊还有一招就是“用症来测脉，以识其变”。这就是病人已被医生确诊后，自己再按自己的方法去练习“识变”的功夫。

中医和西医不一样。西医是以知识和机器对待人，比如说发明核磁共振和CT的不是医学家，或者临床医生只按医学家制定的“常规疗法”去操作，而医生自己却不需要研究生命。中医不一样，每一个真正的中医生都必须自己去研究生命，去感受，去认识医学和使用医学，就好比用自我生命这个“机器”去感受或作用于他人生命，就此古人有“以我之神审彼之神”之说。学习中医的人要确信这一点，要确信自己通过不断加强自我生命的感受就完全能够达到对他人生命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学习中医要充分重视对人的研究。要以《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方法去多练习，对各种不同的人的相貌、身材、毛发、动态、声音等以及相应的性格、饮食特点、行为特长等联系起来去认识和研究。

中医是以一个生命对待另一个生命，“工具”对等，这不仅是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当今西医的微观科学何其发达，却因为解剖学的限制解释不了中医“奔豚”病患者自觉下腹一股气往上冲的现象，也代替不了心里障碍病患的医治，更不能像中医那样，把生理病症与心理病态结合起来认识和理解，从而进行有效的医治。再说我们能够感受梨子是什么滋味，而科学机器不能代替我们这个感受。如果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感受，对自己人生的感受，对世界的感受都质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确认的？

有人说，中医的临床不能像现代科学那样经得起重复验证。学习中医的人不要因此而迷惑。看看那《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中华民族重复研读和使用了两千年

之久，这还不算“重复验证”？！再看中医理论不仅将生理病症与心理特征一同解释，而且从“五运六气”看，古代中医已经将人的生命现象与宇宙时空的物质性结合起来看待了；而西医的生理学还不能跨系统解释心理学，可见中西医在哲学上的接近还遥不可及，更别说西医可以代替中医了！

对中西医哲学思想的区别认识越深刻，那么就越是能够认识到中医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客观真实性，也就越能坚定我们汉民族的人学文化信仰！

在此我与广大中医文化爱好者共勉：

经伦本为英雄事
不迷叱咤迷岐黄
溯源河洛万归壹
敢仿大道演时空